

南 華 大 學
(亞太所)
碩士論文

日本外交政策之分析

Analysis Japan Foreign Policy



研 究 生：戴芸樺

指 導 教 授：孫國祥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六 年 一 月 十 日

南 華 大 學

亞太研究所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日本外交政策演變之分析

研究生：戴 芳 樺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江國平

董立文

張子慈

指導教授：江國平

系主任(所長)：江國平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九十五年 十二月 十九 日

謝 誌

首先要感謝個人服務學校的軍訓室主任徐子凡鼓勵我進修，以及李文峰少校引領我進入南華就讀，同時也要感謝辦公室的學長姐們，他們在我求學受挫時給予我加油打氣以及工作上的照應，使我能專心求學。

對於我的授業老師謹此致上最誠摯的敬意與謝意：孫國祥所長的「國際關係專題研究」、「亞太經濟學專題研究」，從政治、經濟的觀點出發，以多方的思維以及精闢的分析，不但釐清我對於國際關係的困惑，更點出我過去對於這一方面在解讀上渾沌不明之處。邱淑雯教授的「亞太後殖民研究」、「日本與亞太地區」，她嚴謹的教學態度，不但增進我對日本的認識，更激起我對於後殖民的興趣。董立文教授「東北亞政治與文化」，對於每個問題都從多方角度深入分析，開拓我對於東北亞的新思維，其精闢的課程使我受益匪淺。蔡東杰教授「東亞政經制度與政經發展」，經常以幽默的言語以及風趣的說書方式來引導我認識東亞的政經發展，更開啓我對於研究日本的濃厚興趣。

在求學的過程中，我經常在母親、工作、研究生三者的角色中掙扎，雖然有時也不免陷入低潮，但是在老師、家人尤其女兒的鼓勵下，終於完成我重回校園繼續進修的夢想。

摘 要

日本的外交政策正處於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因戰敗而被美國占領，因此不得不選擇加入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安全與經濟體制中。冷戰結束後迄今，國際安全出現重大的變化，日本也積極調整其外交政策，以發揮國際影響力，並追求與它經濟力量相稱的政治領導。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日本配合美國全球反恐，強化日美同盟與自衛隊的角色，朝普通國家的方向前進。

關鍵詞：美日關係、美日同盟、日本防衛政策、吉田主義、
外交政策

Analysis Japan Foreign Policy

Abstract

Japan's foreign policy is at a turning point. Since its defeat and US occupation after World War II, Japan could not but to be part of the US predominates security and economic regimes. Up to now,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after the Cold War. Japan has started adjusting its foreign policy aimed at playing a key role onto the global stage, and seeks for political leadership which is proportioned to its economical power. After 911, Japan realigns force to the US anti-terrorism operations, and strengthens the relations of US-Japan alliance and Self-Defense Army's role, and to go a step further to be a normal nation.

Keywords : U.S.-Japan relations, U.S.-Japan alliance, Japan's defense policy, self defense forces, Foreign policy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2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7
第四節 文獻探討·····	7
第五節 理論分析 ·····	9

第二章 個人層次分析

第一節 理論層面 ·····	15
第二節 美國的佔領政策 ·····	19
第三節 吉田戰略三原則 ·····	25
第四節 吉田路線的演變與挑戰 ·····	29
第五節 小結 ·····	40

第三章 國家層次分析

第一節 理論層面·····	44
第二節 政治上：政治體制的發展與改革·····	51
第三節 經濟上：經濟體制的發展與改革·····	56

第四節 軍事上：自衛隊的發展與演變.....	65
第五節 小結	75

第四章 國際層次分析

第一節 理論層面	81
第二節 政治上：政治大國與聯合國外交.....	94
第三節 經濟上：政治大國的戰略手段.....	99
第四節 軍事上：日美安保體系的發展與變遷	108
第五節 小結.....	119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日本外交政策的傾向.....	123
第二節 研究結論.....	126
第三節 後續研議.....	129

附 錄

附錄一	130
-----------	-----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132
-----------	-----

英文部分.....	140
-----------	-----

表目錄

表 2-1	韓戰特需的契約額	23
表 3-1	保守與革新對立	47
表 3-2	泡沫經濟後日本政府的對策	62
表 3-3	日本經濟成長率	65
表 3-4	日本安保政策之爭議	66
表 3-5	日本重整軍備過	67
表 3-6	自主防衛建軍畫	69
表 3-7	冷戰迄後冷戰時期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	74
表 4-1	美國與亞太國家的防衛關係	89
表 4-2	日本 ODA 政策的發展	103
表 4-3	1990 年代日本海外直接投資	105
表 4-4	日本海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地區	106
表 5-1	日本外交政策的綜合分析	129

圖目錄

圖 1-1	本論文研究架構圖	6
圖 1-2	分析層次與國際關係研究的關係	10
圖 1-3	影響外交政策過程中的個人因素	11
圖 2-1	外交決策運作圖	17
圖 2-2	決策者認知影響政策之決定與執行	18
圖 3-1	政治體制與外交政策的關係	43
圖 3-2	外交決策過程中的國內因素	44
圖 3-3	細谷三角柱系統模型	46
圖 4-1	單極為主多元體系	85
圖 4-2	美國「扇形」亞太戰略示意圖	91
圖 4-3	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理念之演變	101
圖 4-5	日本一千哩海運線防衛範圍圖	114
圖 5-1	日本政府主導模式的演變圖	125

第一章 緒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因戰敗被美國單獨占領，不得不加入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安全及經濟體制中。冷戰後束迄今，對日本影響最大的國家仍是美國，日美關係也一直是日本外交發展的基石，這種局面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很難會改變，因此日本未來外交政策的發展，仍深受美國的影響。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冷戰的終結大大改變了世界的局勢，美國成為後冷戰時期唯一的超級強權，為了適應冷戰結束後的世界新局，美國積極地調整其戰略佈局，以確保其全球戰略利益。911 恐怖攻擊事件的發生，無疑對美國的全球安全戰略形成重大的影響。為因應全球反恐戰爭，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也展開以全球安全為主軸的思維，進行全球軍力的調整。身為美國堅定盟友的日本，在美國展開亞太地區軍力的重新部署之際，日本除基於本身的安全需求，同時為了「轉換」成一正常國家，日本也積極地配合美國的安全戰略部署，調整自身的防衛政策。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Junichiro Koizumi）更透過參與美國周邊地區與全球範圍的軍事行動，使其得以積極地參與地區性與全球性的安全和政治事務，並進一步爭取聯合國安會常任理事國的席次，不過日本這一連串的舉動卻再度引發亞洲各國的疑慮。

2005 年 11 月，日本自民黨在建黨五十週年紀念大會上正式公布了「憲法修改草案」，將自衛隊升級為自衛軍，這象徵著日本朝修改「和平憲法」以及走向「軍事大國」的路上，又向前邁出實質性的一步，此舉再度引發國內的爭議以及各國的關注，同時也衝擊東亞的區域安全。¹冷戰結束後日本一連串的作為，引發筆者想要深入分析並探討，日本由「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蛻變的過程中，其戰略意涵、外交決策的演變對日本外交政策未來發展的影響。

然而在探討戰後日本外交政策的演變，如國際角色的轉換、日本的國際貢獻、

¹ 陳娜，〈自隊衛升級自衛軍的意涵〉《中國評論》，2006 年 1 月，頁 85。

日美聯盟的存續等問題時，多數的研究都將重心置於經濟戰略、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發展等單一層次上作探究。雖然有較高的制高點，卻往往因為太過宏觀，而有見林不見樹林之憾。因此，筆者認為要探究戰後日本外交政策的演變，不能從單一面向來觀察和思考，而須綜合個人、國家、國際等層次，對日本外交政策的演變作綜合性的觀察與分析，方能掌握其外交政策演變的真正意涵。

本文試圖以層次分析的架構作基礎，將戰後日本外交政策的變化作一總的爬梳，以釐清下列幾個問題：

第一、就個人層次上，日本吉田路線發生質變的原因何在？其影響為何？

第二、就國家層次上，日本決策機構角色的演變，對日本外交政策造成何種影響？

第三、就國際層次上，國際體系的變遷對日本外交政策造成何種影響？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外交政策，乃是一國在處理對外關係時所運用的官方策略，同時也是國家對全球體系的投入，屬於國際關係領域。大部分外交政策分析所關注的焦點，正是意圖與行動及其後果之間的聯繫。因此，不論是系統層次或國家層次，國際關係主要關心的是政治實體或是民族國家間的行動、反應與互動的問題。國家的對外行為就是一種計劃性的產物，不但嘗試去達成國家某些特定的目標，同時也在防止或降低其他國家對抗或威脅的行動，這正能夠說明一個國家的外交決策作為的內涵。²因此，外交決策分析可以視為是對一個國家「行為－反應－互動」過程模式的研究，這不單純只是研究兩個國家間行為反應的關係，更可能牽涉到第三個

² Richard C. Snyder, H. 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The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a reader in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pp.199-206.

或其他更多國家而成為一個多方面互動的關係。

一、研究方法：

日本的外交目標有其多樣性，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的變化。冷戰結束以來，日本新一代政治人物對外交戰略展開了各種的辯論，將日本的外交帶入一個嶄新的方向。戰後日本的憲政架構與民主制度是由美國所移植的，但是日本的政治風土卻不同於美國，以致於許多的研究者與專家困惑於日本政治的特殊性，不明白日本政治的運作，日本政策決策的過程為何？日本政治運作有何特殊性？為了要能釐清並探究日本外交演變過程的動機與影響，本文將採用文獻分析法、歷史研究法、比較研究法進行綜合性的推論。

（一）文獻分析法

透過分門別類地蒐集國內外官方文件資料、新聞聲明、出版刊物、發表講話、學術期刊暨研究論文，以及各項相關的統計數據等均為本文資料的蒐整範圍。從中擷取有助於研究日本戰後外交的資料來進行分析、比較、歸納和推論。

（二）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要求在認識事務時，要把對歷史過程的考察與對事務內部邏輯的分析結合起來，以揭示事務的本質及其規律的目的。³透過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演進的歷史邏輯、承遞關係和發展趨勢中加以考慮及說明。而學者也指出這類方法在解讀時，對於內容必須進行客觀及理性的分析，避免有偏頗之情形出現。

（三）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是尋求和確定兩種或兩種以上相關事物的共同點和差異點的比

³ 王長河，《當代中共空軍戰略演變及其對台海地緣政治之影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戰略與國際事務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3年），頁5。

較。惟須特別注意資料的信度與效度，避免因研究結果與實際之間產生過大的差異而失去參考價值。

二、研究構架與章節安排

本文主要的分析架構，主要以層次分析來探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外交政策的演變。利用層次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不同層次的解釋和理解。從不同層次上的角度來分析，可以使我們得到不同的解釋和理解。大多數國際關係的研究者，多半只從單一層次進行研究，難免會產生掛一漏萬的困擾。應該選擇哪個層次回答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但運用層次分析法的目的在於讓研究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問題，以便使研究者能夠跳脫膚淺的表象，尋找更深一層的解釋⁴。根據分析的方法來劃分及歸類，可以使問題簡單化，並根據分析方法的劃分，把找到的數據及證據套用上去，如此一來就可以順利地替我們的假設找出解答。⁵

本文主要分成五章，第一章是緒論，主要在將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架構、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文獻探討與理論分析。

第二章係從個人層次出發，探究決策者如何影響涉外決策的形成，並且分析決策者在面對國家內部變遷或國際事件時的行為。透過對決策者認知上的探究，分析戰後美國的占領政策、吉田茂(Shigeru Yoshida)首相所制訂的國家發展戰略，以及冷戰結束後吉田路線的質變，對日本外交政策演變所形成的影響。

第三章國家層次方面，從制度面（如國家政體形式、決策過程）及其行為者

⁴ Johuas S. Goldstein 著，歐信宏、胡祖慶合譯，《國際關係》（台北：雙葉，2003年），頁16。

⁵ 層次分析的理論可以參見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及 David Singe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re levels of Analysis", *World politics* 12, April, 1960, pp 453-46 及 "The level-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14 October, 1961, pp.75-93. 其實以層次分析的層面並非固定限定於哪些層次而是根據分析的目的去決定屬於哪些層次。學者 Waltz 提出用三種分析層次去討論，J. David Singer 提出運用國際及國內兩種分析層次，Arnold Wolfers 則提出個人層次，Robert Jervis 提出第四種 bureaucratic process。

（如政黨、官僚、利益團體、各種社會勢力）之間的權力消長與演變，逐一分析對日本外交決策產生何種影響。

第四章則從國際層次的角度，擬從冷戰時期、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從兩極過渡到單極並進入多極的格中，對於日本的外交戰略產生何種思維上的變化。另外，對日本影響甚巨的美日同盟，其發展歷程對於日本安保政策造成何種影響，並逐一分析日本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前進的戰略意涵，將對今後日本外交政策帶來何種影響。

第五章為結論，將綜合個人層次、國家層次、國際層次，以掌握日本外交政策的全貌。本文之研究架構詳如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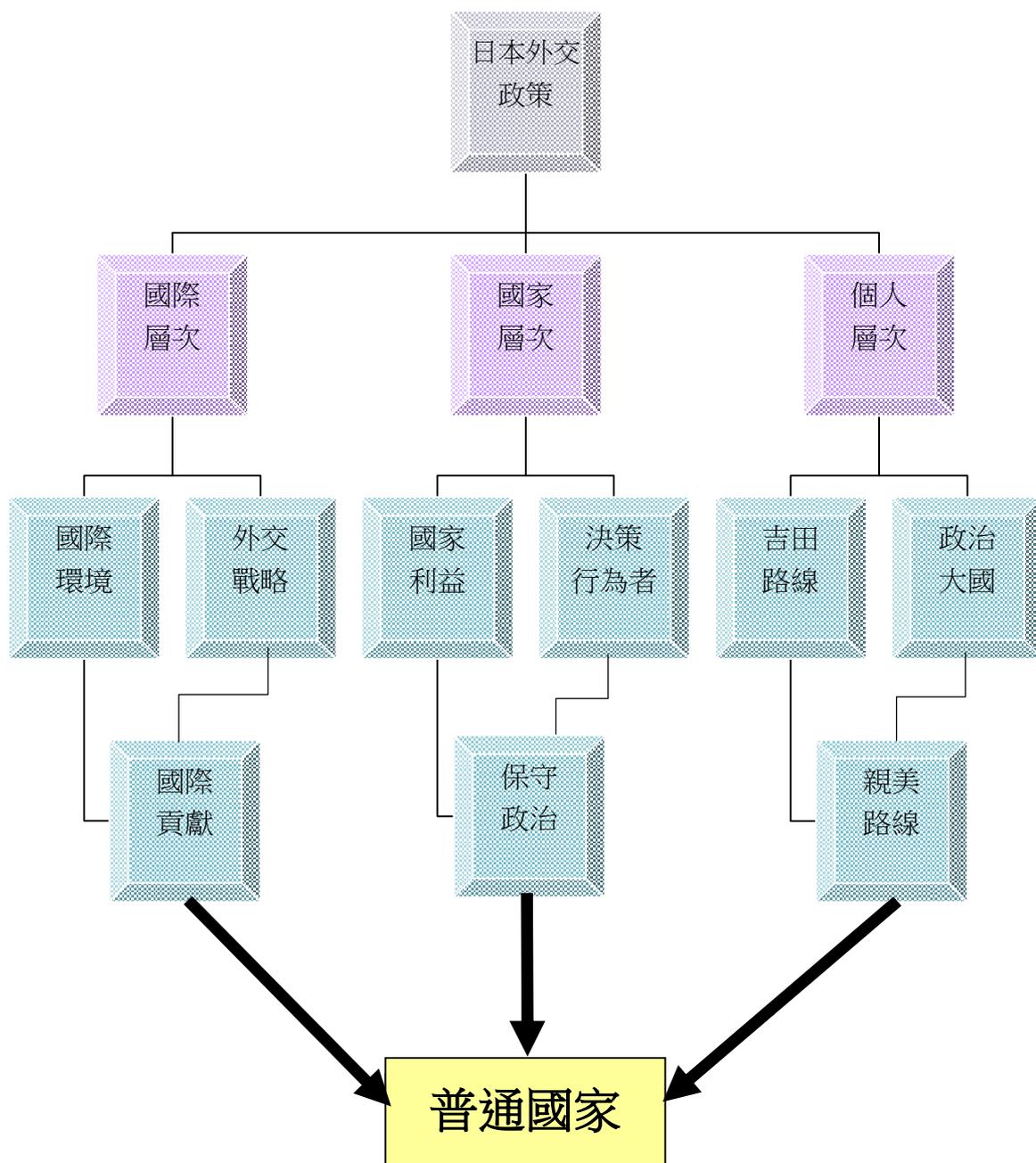


圖 1-1 論文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論文旨在研究戰後日本外交政策的演變，本論之研究範圍以時間作一橫軸（1945年－2005年），以層次作一縱軸（個人層次、國家層次、國際層次），將各個時期日本的外交政策的演變作一綜合性分析。

二、研究限制

本文僅就個人層次、國家層次及國際層次作一分析，對於其他研究內容如文化、意識型態、軍國主義等面向，限於本文主題故不列入本文的研究範疇。另外，本論文並沒有針對特定專業人士進行訪談，亦沒有採問卷調查的方式採擷問卷形式的資料。因為論文題目本身所探討的問題，特定的專業人士及一般大眾的觀點可能與日本政府的決策大異其趣，故本論文將不進行問卷或訪談。

第四節 文獻探討

本文以戰後日本外交政策的演變為中心，1993年之前有關於日本外交政策的文獻探討，大多從日本安全保障政策、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政策、日美經貿摩擦、自衛隊海外派兵等方面來探討日本的對外政策。從層次分析出發的文獻篇數較少，且多以論述兩國之間的互動：如日本的對華政策、日本的美國政策、日本的東南亞政策為主而兼論之。因此，除了本國專書、期刊及外國的專書、期刊文獻資料外，並瀏覽各種官方學術性網站。以下筆者儘就與本文有關的文獻中的主要觀點加以分類探討，分述如后：

一、個人層次

小澤一郎（Ichiro Ozawa）於其所著的《日本改造計畫》一書中，他認為日本要擺脫「經濟大國、政治侏儒」的印象，就必須確立「普通國家」的體制。⁶沈仕晏對於吉田茂（Shigeru Yoshida）所提出的吉田戰略有詳細的介紹，⁷金榮勇則就冷戰結束後宮澤喜一（Miyazawa Kiichi）所提出的「宮澤主義」（Miyazawa Doctrine）作一分析。⁸

二、國家層次

日本的政經體制深深地影響日本外交政策的發展，詹森教授（Chalmers Johnson）、弗德曼（David Friedman）等人從日本的政經濟體制，來探討日本的經濟發展日本對外的經濟戰略，⁹而蔣立峰、高洪、卓南生等人對於日本政府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也有詳細的介紹。¹⁰日本學者豬口孝（Takashi Inoguchi）則從歷史與比較的觀點來探討日本政治體制論，¹¹劉冠效認為有關日本安保政策，在五五體制時代，日本朝野政黨對於安保政策的主張，可謂是壁壘分明立場對立；可是當前的安保議論，在歷經波灣戰爭的痛苦教訓後，朝野的歧見縮小共識增加，議論較前成熟。美國的911恐怖攻擊事件，成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轉變的契機，日本自衛隊得於戰時的狀態下，前往海外執行任務，因此有學者指出此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

⁶ 小澤一郎著、陳世昌譯，《日本的改造計畫》（台北：聯經，1994年），頁93-99。

⁷ 沈仕晏，《日本國家戰略》（台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1999年），頁61。

⁸ 金榮勇，〈日本「橋本主義」下的東亞情勢與互動〉，《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9期，1997年9月，頁6。

⁹ Chalmers Johnson, *MIT and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David Friedman, *The Misunderstood Mirac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Japa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¹⁰ 蔣立峰、高洪著，《日本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2002年）。卓南生，《大國夢與盟主論》（台北：聯經，1995年）。

¹¹ 豬口孝著，賴郁君譯，《日本：經濟大國的政治運作》（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年），頁19-27。

的一大轉捩點。¹²

三、國際層次

盛仰正研究提到冷戰後國際局勢的變化，對日本外交政策產生重大的影響，¹³楊永明、楊鈞池、曹異美等人對於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發展也有詳盡的介紹。¹⁴柯提斯 (Gerald L. Curtis) 等人認為日本ODA政策，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日本得以藉ODA 為國際貢獻之機以增進日本的國際影響力，進而維持國際政治經濟秩序。¹⁵另外大陸學者金熙德¹⁶、包霞琴、臧志軍¹⁷等人從日本的防衛政策以及外交戰略上的變化，深入研究政策的演變與影響。

第五節 理論分析

國際關係研究者面對紛雜的素材，最常使用的框架乃是「層次分析」的架構。從不同層次中的各類變項，以及各變項間的相互影響，並透過層次的分析，方能有助於我們理解複雜而多面的國際關係議題。層次分析的目的，最主要在「認定及勾勒不同的分析層次」，使得所觀察的現象得到解釋，也就是說層次分析的過

¹² 劉冠效，〈轉變中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反恐特別措施法的探討〉《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2002 年 2 月，頁 41-43。

¹³ 盛仰正，〈從九一一事件前後來看日本的亞太安全戰略〉〈嘉義：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¹⁴ 楊永明〈冷戰時期日本之防衛與安全保障政策：1945—1990〉《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頁 13-15。楊鈞池〈美日同盟關係的演變—美日安保條約為例〉《復興崗學報》，2005 年 9 月，頁 165-184。曹異美，〈日本與聯合國安全保障體制〉《問題與研究》，第 32 卷第 9 期，1993 年 9 月，頁 30。

¹⁵ Gerald L. Curtis, Ed., *Japan'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Coping with Change*, M. E. Sharpe, New York, 1993; Kathleen Newland,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Japan*, Macmillan, London, 1990; John Sewell and W. Patrick Murp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Southeast Asia: Is a Shared Development Agenda Possible?*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Washington, D.C., 1991.

¹⁶ 金熙德《日美基軸與經濟外交—日本外交的轉型》(北京：中國社科院，1998 年)，頁 19-23。

¹⁷ 包霞琴，臧志軍主編，《變革中的日本政治與外交》(北京：時事，2004)，頁 194-263。

程，屬於針對「解釋方向」上的探尋（如圖 1-2）。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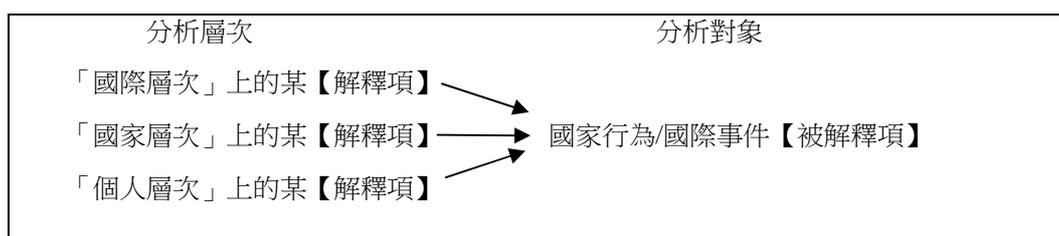


圖 1-2 分析層次與國際關係研究的關係

資料來源：耿曙，〈分析層次與國際體系〉，《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2003），頁 41。

華茲（Kenneth N. Waltz）的經典之作《人、國家與戰爭》（Man, the State and War），他首次以三個層次的論證來檢驗戰爭的起源。華茲有關「層次分析」的分類架構，對於後來國際關係的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他認為在國際關係中，其中一種便是將行為者、過程和影響分類為不同的層次。這種層次分析提供了不同的方法來解釋國際上所發生的事件。他認為國際關係是複雜的，並無法以單一簡單的分析方法來解釋完全，能做的只是盡量從多變複雜的事件中找出一些規律和成因。

有關層次分析的討論乃自辛格（J. David Singer）開始，他首先在 1960 年的書評中，將華茲的架構，發表在以《國際關係的層次分析問題》（The Level of Analysis is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為題的論文中。他不但成功論證了「層次分析」間的關係（互為因果，不可偏廢），更從相對效益的角度，分別評估立基不同「層次」對研究者而言的相對優劣，其切入分析「層次問題」的角度至今未被取代，並且成為日後學者在選擇研究層次時，提供了最有用的指南。¹⁹他認為國際體系是最廣泛的分析層次，他使觀察者可以將國際關係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也就是說可以藉此觀察各國總體的全球性行為模式，以及國家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

¹⁸ 耿曙〈分析層次與國際體系〉，《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出版社，2003 年），頁 42-43。

¹⁹ J. David Singer,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pp.20-29.

一、個人層次

政治學家史奈德 (Richard C. Snyder) 認為：「決策是一種過程，即指決策者為達到想像中未來事務的狀態，從社會所限制的各種途徑中選擇一個行動計畫的過程。」²⁰所以，在經驗的世界中，一個可能想像的決策場合，必發生於一種特定的時空中，此一場合由三個部分所構成：第一是決策者（個人或個人所組成的團體），第二是圍繞決策者的特殊環境（包括自然的、文化的以及行為交互影響所形成的狀況），第三是決策者懷有一個主觀的目的，並企圖從克服環境和利用環境而加以實現。研究外交政策決策者持有的意象，涉及決策者的心理環境、信仰體系、以及他們形勢的種種意象，均影響決策者的決定和行為。²¹個人是外交事務和歷史事件的重要決策因素，同時個人能對外交政策的制定產生影響，並且影響國家之間的關係甚至影響國際體系的結構（圖 1-3）。²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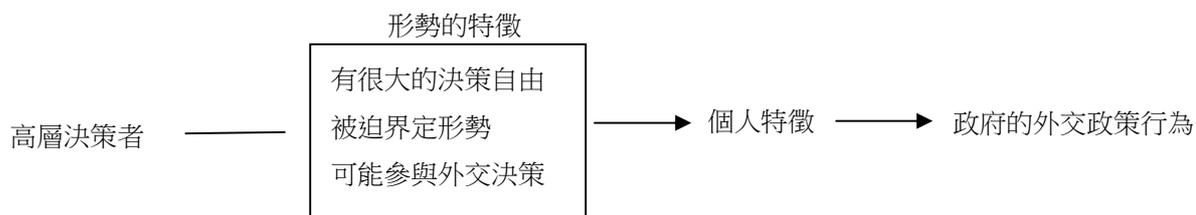


圖 1-3 影響外交政策過程中的個人因素

資料來源：轉引自 Bruce Russett & Harvey Starr 著、王玉珍譯，《世界政治》（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年），頁 239。

正如霍利斯 (Martin Hollis) 和史密斯 (Steve Smith) 所論述，任何一個決策者都會受到內部或外部環境的影響。換句話說，我們所關心的是決策者所面臨的可能性和限制（機會），以及決策者根據這些可能性和限制所做出的選擇（願望）。

²⁰ Richard C. Snyder, "A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henomena", in R. Young, ed.,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s*, Northwestern, 1958, p.19 轉引自：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84 年），頁 87。

²¹ Ole R. Holsti, "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 (1962), pp.244-252.

²² 引自 Hugh Sidey, "An International Natural Resource," *Time* (February 4, 1974), p.24.

²³決策者做出某些選擇的願望受到諸多的限制，如他自己的個性和決策者在政府結構中的地位（角色）；決策者和政府置身其中的社會資源、結構和政治狀況；決策者所在國家與其他國際行為者相互影響的關係，以及其所處的體系結構。每個層次都影響決策者可以利用的機會，每個層次也都影響決策者所持的意象和選擇。

外交政策原本就應是首相發揮強大影響力的政策領域，從以往的對美一面倒的外交路線，到參與七大工業國（Group of Seven）²⁴、亞太經濟合作（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²⁵、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²⁶，我們觀察到日本的「政治議題外交」逐漸被突顯出來。另外，首相對於外交懸案的處理態度，也從以往的被動轉為積極。日本試圖透過多國間的微妙變化，來經營其對外關係，日本的外交政策隨著日本國際地位的提升，首相的角色也愈形重要。

二、國家層次

國家層次所涵蓋的範圍最廣，凡是不屬於個人或國際層次，皆可納入國家層次之內。不過，就其本意而言，國家層次主要還是針對國家內政層面的各項因素：包括國家政體形式、政府決策過程、官僚機構互動、執政政黨政綱等，以及國內政治局勢、政經團體需求、社會勢力消長以及整體政經結構等進行探討。除了內外環境的架構外，亦可透過制度、行為者的角度來觀察，關於影響國家層次的各項因素。國家層次的分析焦點在於，不同利益或不同立場的政社團體，如何在制

²³ Bruce Russett & Harvey Starr 著、王玉珍譯，《世界政治》（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年），頁17。

²⁴ 指加拿大、法國、德國、英國、義大利、日本、美國。

²⁵ 係亞太地區各經濟體高階代表間之非正式諮商論壇，由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Robert Hawke)於1989年元月倡議組成，旨在加強亞太地區之區域經濟合作，主要目標在促進亞太地區經濟成長與發展。

²⁶ 有關WTO的架構與組織，請參閱國際貿易局WTO入口網站。〈網址〉<http://cwto.trade.gov.tw>。

度及規範下互動，並依照既定的決策程序，參與國家對外政策的形成。²⁷

三、國際層次

國際層次是最廣泛的分析層次，他使觀察者可以將國際關係視為一個整體來研究；也就是說，觀察各國總體的全球性行為模式，以及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國際層次所關注的是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這包括政治能力、資源、地位等的狀況。因此，國際層次的分析，主要的將焦點置於「體系結構」或「國家身分」如何影響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互動所造成的國際事件。²⁸從國際體系角度來看，一方面由於國際體系在後冷戰時期發生了結構性的轉變，經濟力量取代了軍事力量成為界定國家實力最重要的標準，國際組織也較過去擁有更大的權力，因而導致體系當中的權力分配和聯盟模式也都產生了變化。另一方面，在以經濟力量為主軸的新體系當中，隨著美國霸權地位的下降，美日同盟關係也被迫作出調整，這也顯示日本的外交自主性正逐漸升高。

綜歸上述分析，我們發現透過各個不同層次的分析，可以使我們得到不同的解釋和理解，然而大多數國際關係的研究者，多半僅從單一層次上進行研究，難免有掛一漏萬的困擾。應該選擇哪個層次回答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運用層次分析的目的在于讓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看待問題，以便能夠跳脫膚淺的表象，尋找更深一層的解釋。²⁹

²⁷ 耿曙〈分析層次與國際體系〉，《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2003年），頁42。

²⁸ 耿曙，前引書，頁43。

²⁹ Johuas S. Goldstein 著，歐信宏、胡祖慶合譯，前引書，頁16。

第二章 個人層次分析

1954年，史奈德（Richard C. Snyder）等人發表《外交決策：國際政治的研究途徑》（*A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Phenomena*），進一步說明了以個人層次研究外交決策的途徑，渠等把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和組織行為理論運用於國際政治研究，提出國家對外政策行為不是抽象的，而是決策者在一個複雜的環境中的認知與行為的結果。參與決策的機構或單位的特性、各組織內部的溝通與資訊交往、決策者的個人特質、價值體系決定了決策行為的結果。史奈德的研究客體由原本極為抽象的國家，轉變為具體地研究代表決策的決策者個人，認為決策是需要被解釋的行為活動，因而其特別強調決策者的主觀認知。³⁰

在傳統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外交決策關注的重心是，國家或是比國家層次更高的研究概念上，並且將國家在國際環境中的行動當作是一個整體，而不是單一的行為者來探討。但是這種研究向度似乎忽略了作為決策核心的要素，即決策者的行為。³¹艾理森（Graham Allison）在《決策的真義》（*Essence of Decision*）一書中，他認為理性模式、傳統模式其基本的分析單位是國家，外交被視作是國家或政府理性而單一的決策者；而領導者的偏好與特質則被為是變異的因素。艾里森則認為與傳統的分析模式相比，他認為在外交決策的領域中，不應只有單一行為者，而應是存在諸多的行為者，因此需要依據不同國家的目標、組織的目標以及個人的目標來進行決策，這開啓了個人層次研究的可能性。³²

第一節 理論層面

³⁰ 林碧韶，《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1999年），頁53。

³¹ 張志孝，《毛澤東對中共與美國關係認知轉變之研究：1969—1972》（台北：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頁27。

³² Graham T. Allison, "Conceptual Model and Cuban Missile Crisis" in Phil Williams, et al. ed. *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131-136.

外交決策分析研究途徑所重視的焦點，毋寧是一個國家如何面對他眼前的情勢，而國家的行為則必須倚賴決策者來定義或解釋所面對的國際情勢，這種對情勢的釋義（*definition of the situation*）其目的當然就是要設計一套有意義的行動方針，從而我們得知分析或研究決策者決定政策過程的必要性。³³換句話說，外交決策分析基本上就是觀察影響國家行為變項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決策者如何去認知關於他所接受到的訊息及情勢。

一、外交決策的研究途徑

外交決策研究途徑，旨在分析外交政策者的行為。³⁴每個外交政策的決策者都處在多層面的環境中，各種環境因素相互交織在一起，大大限制了決策者的行為。因此，要觀察個體的行為，我們必須要脫離大環境，即整體的或全球的體系，進入到最小的環境，亦即參與外交制定過程的個體。換句話說，要觀察個人與環境發生關聯最佳途徑，乃是透過個人對環境的認知。決策者對世界的認知與看法將對決策產生影響。因此，任何一個國家對外政策選擇範圍的諸多限制，皆與該政府內決策領導者個人的意識型態與認知有關。這種對於個人的影響或限制，則來自於個人內部所產生的壓力使他以某種方式觀察世界。³⁵

史普羅特（*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夫婦認為決策者的因素，是研究決策過程中的必要條件，惟有加入決策者的因子，整個分析外交政策產出與過程的模型才算完整。因此，從認知行為主義（*cognitive behaviorism*）的觀點來看，他們認為政策的運作過程中，除了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以及運作過程外，同時也需要加入決策者的心理環境（*psychological environment*），即決策者本身在運作環境的限

³³ 張志孝，前引書，頁 23。

³⁴ B. P. White, "Decision-Making Analysis" in Phil Williams, et al. ed. *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07.

³⁵ Bruce Russett & Harvey Starr 著，王玉珍譯，《世界政治》（北京：華夏，2001年），頁213-214。

制下所意識與認知的環境³⁶（圖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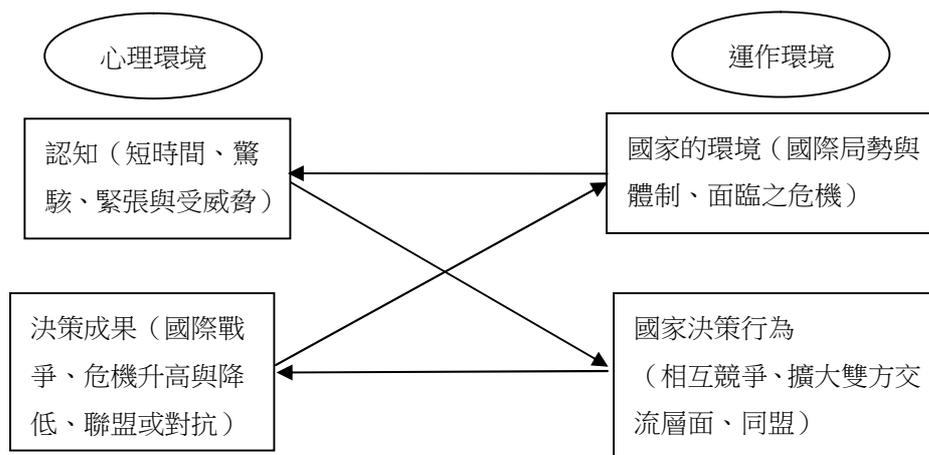


圖 2-1 外交決策運作圖

資料來源：轉引自施閔豪，《美國對中共戰略之轉變－從國家戰略觀點分析》（淡水：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頁29。

歸結來說，從國家戰略制定過程觀點看來，必須將決策者行為模式及內部構造納入解析，並且將這些因素聯繫起來，才能完整地解析國際環境、國內機構和社會環境對於國家戰略政策之間的關聯性；以釐清這些因素究竟是透過何種機制與作為形成政策；以及因素間的交互作用是如何影響政策的制定。

二、認知在外交決策分析中的意義

在決策理論中，認知的概念具有關鍵性的角色。一般來說，決策者心中對於外在環境主觀的認知，遠比客觀實存的世界更有影響力。雖然也不能否認客觀環境對於決策結果的影響，但實際上，決策者總是自然而然地認為他所認知到的就是客觀的環境。³⁷決策者在進行決策時，其必然處於一種為其本人所能清楚認知到的國內、國際政治體系當中，從這個角度來看決策理論與體系理論之間，就有結

³⁶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James N. Rosenau,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pp.41-56.

³⁷ 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Inc., 1997), pp.314-316.

合的可能。史奈德認為，一個國家的對外行為，決定於決策者如何界定當時的情勢；換句話說，決策者的主觀認知就是任何國家行為解釋的適當焦點，而不必去強調客觀實存。

認知與外交決策之間關係密切，決策者在面對外在環境的訊息時，會透過個人已具備的知識與信念來詮釋，³⁸並且賦予這個訊息一定的意義，這個認知與詮釋之間並不能絕對分開（圖2—2）。這種心理詮釋的過程在國際關係研究中扮演一種「形像」的角色，也就是個人以慣有的價值體系，形成了一套對外在環境的心理圖像，例如對威脅的圖像、對機會或利益的圖像等等。研究外交政策決策者所持有的意象，即外交政策決策者的心理環境，這涉及到他們的信仰體系，³⁹以及他們對人民、國家和形勢的意象，這些意象影響到他們的決定和行為。因而我們意識到，心理環境也會限制選擇的範圍，個人的心理活動使決策者將外界的資訊做一分類，並對刺激做出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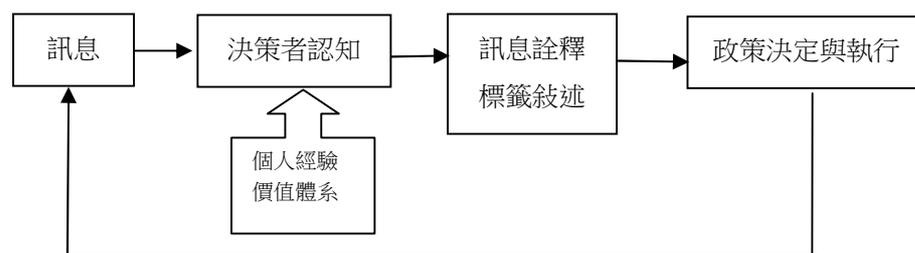


圖2—2 決策者認知影響政策之決定與執行

資料來源：張志孝，《毛澤東對中共與美國關係認知轉變之研究：1959—1972》

（台北：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頁13。

然而，關於決策者的信仰體系與個人特質很難獲得，即使獲得也不易解釋。因此，我們既要掌握決策者的歷年經歷的訊息，也掌握有關他們的世界觀、價值觀、人格和行為方式的訊息。透過這些訊息，我們可以了解這些因素對決策者產

³⁸ 先驗派心理學認為知覺是部分地依賴與生俱來的或者是很原始的知覺機制，見皮亞杰著，王憲鈿譯《發生認識論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頁22。

³⁹ 「個人特質」是由價值觀、人格、政治風格、智力以及過去的經歷組成的。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個人對世界的一套看法，即個人的信仰體系。

生何種意象，而這些意象又是如何發揮作用。換句話說，決策透過業已具備的知識與信念，就會對現象有「先入為主」的概念，而賦予一套不變的標籤（stereotypes）。在國際事務的層次上，決策者對如敵人、盟友或其他關係則賦予一定意義的標籤。當決策者對其他國家有某些程度的認知時，那麼他就會以此認知而產生既定標籤概念來詮釋這個國家的形象，從而做出反應。⁴⁰

從以上的分析得知，透過對決策者認知的研究，我們將能夠探討領導人（決策者）如何建構他眼前的現實。領導人對於威脅與機會的認知，則可以從領導人以何種的標籤敘述，來看待被觀察國家的行為動機、國家能力與決策程序。由此將演繹出領導者會採取以何種的態度來對待被觀察的國家，因而能判斷出領導者外交決策的目的與方向。

第二節 美國的佔領政策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原敬內閣（Hara Takashi）⁴¹鑑於英國的衰落和美國的崛起，開始強調把對美協調作為日本外交的核心。1922年幣原喜重郎（Shidehara Kijuro）出任外相，繼續推行原敬的「國際協調外交」，企圖在多國共管的局面下，以不開罪美國為前提，向中國展開侵略，但是隨著日本軍部勢力的逐漸擴大，幣原首相（Shidehara Kijuro）的外交被視為軟弱外交。1929年日本經濟大蕭條，導致日本人對幣原的國際外交路線更加的不滿，日本軍部法西斯勢力迅速膨脹，他們迷信侵略中國可以決解此一危機。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6年日本與納粹德結盟，日本軍部手中的軍刀不僅劈進中國的心臟地帶，也斬斷了傳統上日本與英美協調的路線。⁴²明治維新之後迄1945年止，日本在世界史

⁴⁰ 張志孝，《毛澤東對中共與美國關係認知轉變之研究：1969—1972》（台北：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頁21。

⁴¹ 有關原敬內閣時期的成就，請參閱福田和也著、林思敏譯，《日本歷代首相評價》（台北：商務，2005年），頁36。

⁴² 劉江永主編，《跨世紀的日本—政治、經濟、外交新趨勢》（北京：時事，1995年），頁583。

上以罕見的速度發展的日本帝國至此崩潰。

近代的日本經歷了兩次重大的變革，一是 19 世紀中葉美國海軍培里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所率領的「黑船」扣關，以武力突破日本的鎖國封建體制，迫使日本「開國」走向近代化國家之路；另一是百年之後，盟軍統帥麥克阿瑟 (Douglas MacArthur)，進駐日本並實施占領統治，使軍國主義產生質變，蛻變為民主和平的國家，兩次重大的變革，均由美國所促成，實為歷史的巧合。⁴³

根據雅爾達會議以及《波茨坦宣言》(Potsdam Declaration) 兩項協定，日本帝國正式瓦解，恢復到明治天皇親政時的版圖。盟軍宣佈無限期地佔領日本，這是日本有史以來第一次被外國軍隊佔領。⁴⁴美國為了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再次崛起，初期的佔領政策是相當嚴厲的。在美國一手的主導下，日本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並使日本邁向其悠久歷史中最重要、最不尋常的一個階段。在一連串占領政策的改革中，對戰敗後的日本影響至深的二位代表性人物：即佔領當局的最高指揮官麥克阿瑟將軍和日本首相吉田茂 (Shigeru Yoshida)，這兩位人物改變了日本的命運，也奠定日本成功的基礎。

戰敗對日本來說，是嚴酷的事實。「無敵於天下」的皇軍無條件投降，不可一世的「大日本帝國」崩潰了。根據《波茨坦宣言》的精神，日本領土應由盟國軍事佔領。當時的中國忙於內戰，英國已精疲力竭無力佔領日本。只有蘇聯提出把北海道的北半部及全部千島歸於蘇聯佔領。美國總統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認為「對日本的佔領不能重蹈德國的覆轍，我不想分割管制或劃分佔領區。」⁴⁵他直

⁴³ 趙建民、劉予葦主編《日本通史》(台北：五南，1991年)，頁339。

⁴⁴ 戰後以幣原喜為首的日本方面雖然預測到會有軍事佔領，但萬萬沒有想到美國會以佔領下的方式，對於日本進行國家社會的全面改造，這是日本前所未有的舉動。福田和也著，林思敏譯，前引書，頁93。

⁴⁵ 趙建民、劉予葦主編，前引書，頁367。

接了當地告訴蘇聯：「日本本土各島的日本部隊向麥克阿瑟將軍投降」，⁴⁶並任命麥克阿瑟將軍出任盟國最高司令統帥。蘇聯唯恐落後，搶先在庫頁島登陸，接著又佔領日本北方四島。盟軍於 1945 年 8 月底抵達日本，正式展開七年半的軍事佔領，日本被降為四等國。美國決心肩負起領導戰後世界的責任，以武力佔領日本，但也由於美國的單獨佔領，導致了日本國家的美國化和外交政策的一面倒，並且直接影響戰後中日關係的長期停滯不前。

一、政治方面

美國在日本並沒有採取像在德國所實行的軍政，而是君臨於日本天皇和政府之上，實行間接政治。依據《波茨坦宣言》精神所制定，美國佔領日本的最終目標有二：一是保證日本不再成為美國和世界與和平的威脅；二是最終建立一個和平與負責的政府，該政府尊重他國權利，並應支持《聯合國憲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的理想與負責原則中所顯示的目標。換句話說，日本必須解除武裝，並實行非軍事化，⁴⁷為了要實現解除武裝，並加速戰後日本政治民主化的進程，1945 年 10 月，麥克阿瑟指示幣原內閣實行五大改革，同時擬定新憲法。⁴⁸戰後的憲法確立了日本的政治體制，這一政治體制對日本的社會穩定以及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具有關鍵性第九條則明確規定：「放棄戰爭（war-renouncing）與否認交戰權」。⁴⁹

第一款：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作為國家

⁴⁶ 趙建民、劉予葦主編，前引書，頁 368。

⁴⁷ 盟軍採取的非軍事化的政策，包括（一）解除日本國內三百萬軍隊的武裝。（二）解除思想、宗教、教育的統制，廢除各種侵犯基本人權的法律。（三）實施經濟體制的改革。參閱趙建民劉予葦著，前引書，頁 369。

⁴⁸ 憲法調查委員會在占領軍和在野黨的壓力之下，匆匆拋出了《大日本帝國憲法修改草案》（又稱「松本方案」）。美國雖然不希望廢除天皇制，但卻強烈要求實行民主改革，因此盟總在失望之際提出了《日本國憲法草案》。日本在此種情勢之下，不得以只能以盟總提出的憲政草案為藍本，起草新憲法。

⁴⁹ 馮昭奎，《戰後日本外交史》（北京：中社會科學出版，1996 年），頁 75。

主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第二款：為了達成前項列舉的目標，絕不保持陸海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由首相吉田茂公布且施行的這部和平憲法，是戰後日本和平思潮的具體展現。戰後的民主改革，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的一次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日本憲法是按照英國議會政治體制的模式，由美國制定出來的民主主義憲法，它的生效與嚴格執行，徹底地改變日本固有的政治結構，也象徵著日本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完成和現代化國家體制的確立。

二、經濟方面

在盟軍總司令部（General Head Quarters, GHQ；以下簡稱「盟總」）的支援下，採取傾斜生產體制，進行物資的重點分配。其後，由於國際局勢的變化，美蘇冷戰的形成，逐漸改變美國的對日政策。1947年3月，盟軍總部指示日本政府全力復興經濟，不僅放寬賠償條件，同時也撤消了解散日本大企業指令，甚至提供經濟復興援助，日本經濟在美國的支援下漸漸步入重建的軌道。⁵⁰1948年12月，美國國務院為安定日本經濟遂提出「安定經濟九原則」，⁵¹派遣底特律銀行總裁為特命公使赴日，任盟總最高經濟顧問並制定道奇方針（Dodge Line），此一方針所採取的是一種緊縮政策，強調以抑制消費和減少銀行放款來壓抑通貨膨脹。⁵²後因進口增加消耗大量外匯，在這種情況下，唯有急速擴大日本商品的海外市場才

⁵⁰ 陳世傑，《戰後美日安保之政經分析：1952-2000》（台北：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頁32。

⁵¹ 趙建民、劉予葦著，前引書，頁398。

⁵² 其內容是由美國提供援助資金，來抑制日本的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廢止原來的多元匯率，設定美金一元對日幣匯率360元的價值，藉以抑制外匯的投機並促進日本進口，以進行自主性的國際貿易。對於以生產消費品和出口為主的中小企業帶來危機，導致失業率的增加。

能解決此一危機，恰好韓戰提供了日本經濟復甦的大好的機會。⁵³

1950年6月韓戰的爆發對日本形成極大的影響，「韓戰特需」為日本帶來投資與消費景氣，聯合國總司令部設在東京，日本成為聯合國軍的軍事基地，日本的產業與美國的「特需」成為聯軍的兵工廠，給予日本擴張軍需市場的大好機會。日本產業接受戰爭軍需的大量訂單後，出口量驟增三倍，並且帶動國內的投資熱潮，因而使得道奇緊縮下的日本經濟活絡起來（表2-1）。日本總體經濟結構，因韓戰特需而產生重大變化，⁵⁴由於輸出增加的刺激和外匯的急速累積，使得日本進口資本財的成本大為降低，同時也加速日本重工業的成長。

表 2-1 韓戰特需的契約額

年次	物資	服務	合計 (單位：千美元)
1951年	229,995	98,927	328,922
1952年	235,851	79,767	315,618
1953年	305,543	186,785	492,328
1954年	124,700	170,910	296,610
1955年	78,516	107,740	186,256
累計	974,607	644,129	1,618,736

資料來源：許介麟，《日本現代史》（台北：五南，1991年），頁208。

三、軍事方面

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戰爭，在1945年8月，日本裕仁天皇（Hirohito）以廣播《終戰詔書》的形式宣布無條件投降，正式結束戰爭的事實。戰敗後的日本依據《波茨坦宣言》的原則，被迫解散軍隊和實行非軍事化政策。⁵⁵因此，日軍大本營、陸

⁵³ 許介麟《日本現代史》（台北：五南，1991年），頁207-208。

⁵⁴ 在國際收支方面，由於美軍是以美元支付貸款，使日本在短期內累積了龐大的外匯。其次，由於1950年代的擴充軍備是世界性的風潮，而且日本佔了賣方的優勢，加上東南亞國家的購買力增加，導致日本對東南亞地區的輸出擴大，皆受惠於韓戰。

⁵⁵ 戰後日本非軍事化的內容有三項：（一）遣散軍隊，收繳和銷毀武器彈藥（二）為摧毀戰爭潛力而銷毀與拆遷戰爭設備（三）禁止生產武器及飛機。

軍參謀本部與海軍省、陸軍省等軍部指揮中樞機構亦相繼遭到解散，同時廢除《兵役法》、《國防保安法》、《國家總動員法》等軍事法律及戰時經濟統制的法令，徹底瓦解明治維新以來所建立「富國強兵」的總體戰略架構。⁵⁶

韓戰的爆發導致遠東新局面的產生，美國鑒於整個東北亞情勢丕變，為了防止共產集團勢力向太平洋擴張，在盟軍將主力投入朝鮮半島之際，日本本土治安將形成空隙。為了彌補此一問題，麥克阿瑟遂於 1950 年 7 月向日本首相遞交「關於建立警察預備隊」的書簡，要求日本建立警察預備隊來擔負維護社會治安的任務。首相吉田茂立即覆函關於建立警察預備隊的報告，內容是「已著令進行國家警察預備隊的成立作業，總人數為七千五百名，同時增派海上保安廳人員八千名。」⁵⁷這些警察預備隊，是日本重新整建軍事武裝力量的基礎，名義上雖然是警察，但實際上則是在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指導下，接受武器借貸與訓練。⁵⁸

綜合上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對日本造成相當大的衝擊，日本民眾陷入極端的自我否定，並強烈地反對任何與軍國主義有關的政策或政府活動，甚至鄙視軍人。另一個更大的衝擊則是，盟軍對日本的佔領以及民主化的改造，因為這幾乎否定日本作為主權國家的地位與權利，尤其是日本憲法第九條的規定。因此，美國的佔領政策對日本而言，是一次從思想意識到政治、經濟制度諸方面的革命性變革。就歷史上的意義來說，戰後日本民主改革，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進行的一次徹底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對於戰後日本經濟高速發展功不可沒。不過，原本限制日本軍國主義發展的憲法條文，卻為日後日本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同時也成為日美兩國 1980 年代政經摩擦的重要因素之一，更是日本於 1990 年代

⁵⁶ 沈仕晏，《日本國家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1999 年），頁 109。

⁵⁷ 藤原彰著，《日本軍事史：下卷戰後篇》（東京：日本評論社，1987 年），頁 28。

⁵⁸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台北：三民，1996 年），頁 391。

欲轉型為「正常國家」的巨大障礙。⁵⁹

第三節 吉田戰略三原則

二次戰後日本處於破敗不堪的境地，從吉田內閣到佐藤內閣（Satou Eisaku），基本上都是屬於處理戰後問題的內閣。此一時期的政治人物全面地進行改革、徹底實行政策，這正是所謂的第二次建國，首相的責任自然重大，也著實奠定了堅毅而偉大的成果。因為他們都克盡了身為政治人物的責任，把日本從一片焦土中浴火重生。從 1950 年代開始，日本迅速實現經濟復興，並在 1960 年代末期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國。⁶⁰

不過，在日本實現經濟飛黃騰達的過程中，我們也不能忽視對日本宏觀發展的戰略觀察。在探討日本戰後的發展戰略時，也不能單單強調美國具有決定性影響的外部作為，同時也要關注以吉田茂為首的保守政治家的主動性和能動性。總的來說，戰後日本保守政治之所以能夠長期把持日本政局，與其深得民心的發展戰略是分不開的。吉田首相的政治作為，對於日本未來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所以即便不稱讚他的為人，卻也不得不承認他存在的價值。戰後組閣的吉田茂繼承了從大久保（Okubo Toshimichi）、原敬、幣原等人的外交信念，並認為日本從明治維新到大正年間國運隆盛，主要是採取了日英同盟和對美合作的外交政策。因此，他極力主張日本的外交的根本方針，必須放在對美親善這個原則之上，今後不會改變也不應改變。

一、吉田戰略的構想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全球戰略是趨於「重歐輕亞」的考量，在歐洲

⁵⁹ 楊鈞池、許介麟著，《日本政治制度》（台北：三民，2006年），頁12。

⁶⁰ 福田和也著，林思敏譯，前引書，頁88。

大陸則是阻止蘇聯的擴張策略；在亞洲則是避免與蘇聯發生直接軍事衝突，認為應與蘇聯採取和平共存的方式來處理戰後局勢。因此，冷戰的形成與中國事態的發展，使日本的重要性倍增。⁶¹1948年伊始，美國逐漸放棄於日本施行的非軍事化與民主化政策，積極且務實地培植日本成為美國在亞洲地區的同盟伙伴。⁶²美國基於戰略上的考量，急需日本協助美國推動圍堵政策，因此堅決反共的吉田茂獲得美國的信賴與支持，並贏得國會選舉的勝利進行了第二次組閣，日本也進入了長達六年的吉田內閣時代。他依據美國的亞洲戰略構想，具體的提出對日本極具影響力的國防戰略構想，並認為美蘇冷戰結構性的激烈變化，將逐步形成對國內和平思潮的威脅。因此，吉田茂的戰略構想首先以「建立自衛武裝基礎」為國防戰略的核心；其次配合「經濟主義優先論」的戰略步驟；最後則是逐步實行「共同防衛同盟關係」的基礎戰略計畫。⁶³

（一）建立自衛武裝的國防政策

吉田首相是日本戰後政治發展過程中極具影響力的政治家，他意識到赤化的中國必然凸顯日本作為民主國家的重要地位。在韓戰期間日本政府全力支持美國，乃因日本政府深懼北韓一旦赤化朝鮮半島，日本將會成為共產主義進攻的次期目標。因此，吉田茂對於「非武裝中立論」的觀點持否定的態度，他十分清楚日本特殊的戰略地位與戰後特殊的國際環境，都不允許日本保持中立。利用這種可依附的條件，他開始倡議自衛武裝論，帶動社會大眾重新審視日本的國家前途。在此一期間，各種關於自衛武裝的論述與著作的出版，完全壓制非武裝中立論的聲音。因此，順應美國對日政策的重大轉變與重新武裝日本的意圖，吉田茂建立國家警察預備隊，一方面能維持美國在日本防衛空窗期戰力之不足，另一方面也

⁶¹ 參閱邵玉銘，〈馬歇爾使華再評估〉《近代中國》，第46期，1985年4月，頁87-88。

⁶² 杜魯門總統批准一份稱為 NSC13/2 號文件。根據這個文件，協助重整日本的經濟是美國對日政策的後期目標，也象徵美國將建設日本成為亞洲戰略防線的重要盟友。

⁶³ 沈仕晏，前引書，頁117-118。

重整日本自衛武裝的基礎戰力。

（二）經濟優先論

朝鮮半島情勢的惡化，使得日本右翼勢力伺機主張，利用東北亞局勢緊張之際，政府應立即著手進行大規模的再軍備行動。不過，吉田反駁此一主張並認為，重整軍備的輿論已經在國內外引起不必要的疑慮，況且戰敗後的日本顯然無力負擔強大軍備的費用。因此，吉田在建立警察預備隊後，即斷然採取壓制要求擴大重建軍備的輿論與作為，並提出「先經濟、後軍備」漸進式的戰略主張，並強調經濟優先的戰略原則。吉田首相是個務實主義者，他深刻瞭解日本特殊的地理戰略位置在兩極對峙的結構下，絕不會成為亞洲戰略棋盤上的兵或卒，而是機動靈活直衝敵陣截殺將軍的車棋。

另一方面，戰後日本處於不被信賴的國際環境中，任何大規模的重整軍備都將成為國際社會輿論與批判的藉口。日本不能在成為亞洲戰略棋盤上的車棋之前，過早暴露自己的想法與政治企圖，寧可暫時依附美國的軍事保護政策來逐步加強自身的經濟能力。⁶⁴吉田茂所採取的經濟優先戰略，正好符合日本戰後社會的實際需求，也為日本經濟復甦提供良好的發展機會，更為日本重建防衛戰力的軍需，構築深厚的經濟基礎。

（三）共同防衛的同盟戰略構想

運用戰後兩極對立的集團自衛權的概念，採取國際法關於共同防衛的條件，同時依賴美國對日本的軍事協助來實施共同防衛的同盟戰略構想，而這個觀點亦符合美國在遠東所構築的戰略利益。當共同防衛的主張，逐漸成為日本右翼團體攻擊的藉口時，吉田茂仍堅決選擇與美國結盟，實行共同防衛的構想，並藉此反

⁶⁴ 沈仕晏，前引書，頁 122-123。

擊非武裝中立論過於理想的論調。因此，依靠美國軍事力量來保障日本的安全與政治穩定，是戰敗後日本的唯一選擇。為構築國家的經濟發展，國家的主權與尊嚴是可以暫時讓步，這正是吉田戰略構想所凸顯的價值觀，也是吉田茂提倡共同防衛的主要目的。他強調日美之間的不平等的從屬關係是暫時性的，此種關係自然會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強化而發生變化。

總地來說，吉田首相在其任內擬訂國家長期發展的計畫，其短程任務是脫離盟軍占領、恢復國家主權，長程任務則是在美國核子傘的保護下，日本全力發展經濟。《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生效後，盟軍結束對日本的占領，日本也成為獨立的國家。⁶⁵美、日雙方也同時締結《日美安全保障條約》(Treaties of Security and Safeguard Between Japan and United States)，根據該條約的規定，美軍得以繼續使用日本的軍事基地並駐留日本，自此確立了日本採取以日美關係為主軸的外交方針。而美式價值也透過教育薰陶、媒體傳播、文化交流等方式漸漸深入日本社會，成為戰後日本社會思潮的主流。至此，日本已徹頭徹尾轉換成為美國的忠實盟邦，以及美國為中心資本主義國際社會的一員。

二、吉田戰略的影響

吉田茂對於戰後日本最重要的貢獻有二：一為確立日本自律性的制度；二為確立「保守本流路線 (Conservative Establishment Line)」。就當時日本的處境來看，我們不難理解吉田路線戰略考量的意義，歷史也印證了吉田戰略，著實地為日本成為經濟大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⁶⁶然而，正因為吉田路線過於專注國家利益和經濟發展，卻忽略了對於日本侵略歷史應有的反省與認識，最終造成日本國民在面

⁶⁵ 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該合約主要是為了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戰敗國日本的地位問題，隨著這個條約的生效，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恢復正常。

⁶⁶ 指的是與官僚聯合、對憲改採取消極的態度、重視經濟、在安全保障上依賴美國、最小限度的軍備的一連串的配套措施。

對日本侵略的史實上，普遍呈現出曖昧的態度。從而使得國民意識發生了內在的分裂，這反映出戰後日本改造的不徹底，吉田路線所形成的保守政治，對於日本的內政與外交形成了以下二點影響：

第一、戰後掌握政治權力的是戰前的政治勢力，這使得民主主義的推展更加困難，其後又因美國政策的轉變與保守勢力的長期執政，造成日本國民在戰後缺乏依照自己的意志決定日本發展道路的能動性。

第二、冷戰導致美國佔領政策的轉變與保守政治的抬頭，導致原本應該徹底進行肅清的軍國主義，以及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行動半途而廢。另外，日本的戰爭責任、加害者的心態，導致日本人形成了一種自己也是犧牲者、受害者的國民心理。日本保守政治留給當代日本人的遺產，不僅是吉田路線和大國主義的追求，還有更深層次的歷史問題，這正是日本國民意識中所產生的矛盾現象。

第四節 吉田路線的演變與挑戰

吉田內閣奠定了日本外交政策的發展方向，他認為日本外交政策應追隨美國，以建立「反共外交體系」，並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關係。⁶⁷ 日本外交的戰略發展從戰後吉田茂主張的「商人國家」，到中曾根（Nakasone Yasuhiro）提出的「國際國家」，乃至政治領袖小澤一郎（Ichiro Ozawa）所主張的「普通國家論」，具體地勾畫出日本從小到大，從內到外，以至從柔到剛的戰略過程。「重經濟、輕軍備」吉田的外交路線，一直是戰後日本內政外交的主流，儘管這一路線在1980年代在中曾根首相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時遭遇挑戰，不過中曾根之後的首相則又回到了吉田路線。冷戰的終結、波斯灣戰爭等國際局勢的轉變，大大改變了戰後以來日本長期所遵循的吉田路線，日本外交政策也正朝「普通國家」（normal

⁶⁷ 馮昭奎、劉世龍等著，《戰後日本外交》（北京：中國社科院，1996年），頁125。

nation) 方向前進。接下來將從吉田路線的演變與吉田路線的挑戰來逐一分析，戰後日本的外交戰略意涵的變化與影響。

一、「重經濟、輕軍備」吉田路線

二次戰後，日本選擇了一條作為「通商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道路，形成了以「經濟立國」為核心理念的國家戰略。在美國的引導與保護傘的掩護之下，日本與東南亞各國相繼通過「賠償」與「準賠償」的方式，處理戰爭期間遺留下來的問題。透過此一方式，日本不但重返亞洲，並且成為了戰後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⁶⁸在政治上，日本跟隨美國的步伐，儘量在國際政治上保持低姿態；在經濟上，日本政府採取「外交經濟政策」，由政府配合民間企業共同在國際市場謀取最大利益，以下將逐一分析冷戰期間吉田路線的發展。

(一) 池田－佐藤時代

在吉田茂的兩個得意門生池田勇人 (Hayato Ikeda) 和佐藤榮作 (Satou Eisaku) 執政時期，吉田茂所倡導的「富國輕兵」的經濟立國路線得到徹底的貫徹。池田主政時期，一改鳩山 (Ichiro Hatoyama)、岸信介 (Kishi Nobusuke) 的憲改路線，提出「所得倍增計畫」吸引國民的注意，以經濟成長為執政的優先課題，創造出高度成長的時代。政府一系列措施的目標，符合當時日本國內普遍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的要求，把國民的關注逐漸從政治轉向經濟方面。池田在其任內，不但成功地舉辦東京奧運，而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總會也在東京召開，⁶⁹這些作為象徵著日本已將戰敗國的陰影一掃而空。

⁶⁸ 由於泰國在戰爭期間並不是日本的敵國，日本與泰國之間並無戰爭賠償的問題，但日本在當時曾在當行「特別(日)圓」的貨幣。為了補償泰國方面的損失，日本在戰後同意予以結算，但是由於其性質有別於普通的償賠，日人稱之為「準賠償」。請參閱卓南生，前引書，頁 304。

⁶⁹ 國際貨幣基金在 1944 年成立，工作目標是維持全球經濟體系的穩定性，並向那些暫時出現國際性收支不平衡的國家提供短期貸款，以促進貿易。

自 1965 年開始，美國的全球戰略重心移轉至東亞，並且把美中對抗視為越戰的核心，企圖加強對中國的遏制。佐藤政府積極與美合作並開展亞洲外交，其外交上的成就包括：糾合亞洲親美反共諸國，採取遏制中國的政策，以實現其對美合作；同時在美國陷於越戰而被迫減少對亞洲國家的經濟援助時，日本成功地取代美國的角色，並進一步對這些親美國家進行經濟擴張。⁷⁰

在戰後的冷戰國際環境中，日本從吉田內閣開始，推動了以「與美國協調下的經濟發展（吉田主義）」為基礎的外交路線。在占領期間結束後，日本拓展美國以外的外交空間，⁷¹從池田內閣到佐藤內閣期間，外交政策的重心則是透過對美協調關係的深化，以美國強權之下的世界安定和平（*Pax Americana*）的受益者的身分，將其利益極大化。在佐藤內閣時代，日本成功地從美國手中取回琉球（日本稱為沖繩）的行政權，是為「外交上的勝利」。但是，隨著日美經濟實力的消長，雙方的關係也在急遽地變化。⁷²從佐藤政權開始，日本逐漸醞釀由「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的意識，對日本來說，模仿、追隨的時代已經過去，進入了自己選擇的時代。

（二）田中－福田時代

1970 年代的田中內閣（*Tanaka Kakuei*）到福田內閣（*Takeo Fukuda*）期間，日本仍遵循與美協調的外交路線，不過日本政府也意識到「對美一面倒」外交路線的弊端。1971 年，因美國宣佈放棄美元和黃金的固定匯率，造成許多國家對美國的不信任，再加上兩次石油危機以及美國自越戰中撤軍等因素影響，日本也開始意識必須對其角色以及外交政策作出調整。在此一共識之下，日本政府不再完

⁷⁰ 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台北：商務，1980 年），頁 867-868。

⁷¹ 鳩山內閣恢復與蘇聯的邦交，而岸內閣開拓了對東南亞的外交空間。

⁷² 佐藤內閣開始因與美國之間產生纖維摩擦，成為後來美日貿易摩擦的導火線。參閱松村岐夫等著、吳明上譯，前引書，頁 89。

全以美國的外交政策或利益為基準，也開始推行「自主多邊外交」。⁷³田中時代推動日中（共）正常化外交、⁷⁴恢復與蘇聯的會談，⁷⁵以彰顯全方位外交政策，不過推展的過程並不順利。

（三）大平—竹下時代

1980年代國際局勢動盪不安，也觸動美蘇新冷戰時代的開始。⁷⁶美國面對世界秩序重新調整的過渡階段，除了保護北約盟國的安全與穩定外，同時也要防範蘇聯在亞洲逐漸擴軍的威脅，並且一再強調日美安全保障體制的重要性。因此，此一時期日本外交戰略的思想，亦從冷戰時期以「軍事同盟」為主的日美安保體制，過渡到強調「非軍事因素」後冷戰時期的《綜合安全保障戰略》。⁷⁷

大平正芳內閣（Masayoshi Ohira）之後的內閣時代，日本對於地位相對低落的美國提供補充與強化的作用，並致力經營美、日、歐三強鼎立的國際系統。1980年7月日本提出《安全保會議紀要》，⁷⁸擬將日本的國際形象，由戰後「國際秩序利用型的特殊國家」朝向「國際秩序貢獻型的國際國家」方向轉變，這不但符合美國全球戰略利益，亦是回應日本國內「國際國家論」的政治思潮。此外，1980年代頻頻發生的日美貿易摩擦，以及1985年的廣場協定（plaza Accord），也迫使日本外交政策由過去的日美關係為主，逐漸走向「國際國家」的全球化外交路線上，以配合日本經濟實力日益強大所產生的影響力。⁷⁹不過，吉田主義（Yoshida Doctrine）的外交路線，在中曾根時代遇到挑戰，其後的首相又重新回到了吉田路

⁷³ 金榮勇，前引書，頁 32-33。

⁷⁴ 趙建民、劉予葦，前引書，頁 437。

⁷⁵ 張隆義，〈日本擴軍與亞太局勢〉，《問題與研究》，第 25 卷第 9 期，1986 年 9 月，頁 33。

⁷⁶ 1980 年蘇聯舉兵入侵阿富汗，立即造成兩極關係的緊張對峙。

⁷⁷ 1983 年中曾根提出「日美命運共同體」的言詞，再度確認日美兩國的同盟關係；1987 年正式打破防衛費不超過 GNP1% 的內閣決議。請參閱松山岐夫等著，前引書，頁 89。

⁷⁸ 該文件強調：「日本必須考慮與北約各國同一陣線，站在全球的角度，增強國家自衛戰鬥能力，並為自由主義陣營作出貢獻」。

⁷⁹ 金榮勇，前引書，頁 33。

線。

首相竹下登（Noboru Takeshita）時代，其外交政策仍以《日美安保條約》為基軸，並加強日美經濟、軍事合作，同時改善日本與其他西方國家之間貿易失衡的問題。1988 年竹下內閣在國會演說時強調：「要進一步樹立為世界貢獻的日本形象」，其國際合作構想是，「開展為了和平的合作」、「加強國際文化交流」、「擴大政府開發援助」為三根支柱的國際合作構想。首相竹下登傾向依靠日本經濟技術上的優勢，在協調南北關係上積極發揮作用。

綜合上述分析，1980 年代日本提出從「經濟大國」出發，走向「政治大國」、「國際國家」等口號，不過其具體目標並不明確。1990 年代的波斯灣戰爭提升了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日本也將聯合國視為提高其國際地位的重要舞台，並且積極爭取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作為實現其「政治大國」的目標。

二、吉田路線的挑戰

鳩山一郎是日本獨立後的第一任首相，具有濃厚的國家主義色彩；他高唱反吉田之道的政治，並批判一面倒的外交政策，他認為不但要與蘇聯恢復邦交，同時也要改善日中兩國的關係。⁸⁰為此，鳩山內閣倡導自主外交、自主防衛、自主憲法，實現真正的獨立，以清償吉田時代有的債務為使命。另一方面，為了達成加入聯合國的願望，日本政府於 1956 年與蘇聯簽訂《日蘇共同宣言》（Northern Territory Issue），⁸¹恢復了兩國邦交，日本隨即成為聯合國的一員，同時也開啓了

⁸⁰ 在日中關係方面：政府對日中兩國民間交流和貿易採取了默認政策，表現了向自主外交前進的姿勢，但對中國方面在 1955 和 1956 年所提出的邦交正常化卻未作出回應。其原因是政府還沒有擺脫追隨美國的路線。

⁸¹ 「日蘇共同宣言」這個宣言並不是媾和條約，僅僅是結束兩國戰爭狀態，恢復邦交。關於領土問題懸案，也只寫明在和約締結後把齒舞、色丹歸還日本。締結媾和條約，依然作為以後人民的課題遺留下來。

對共產集團封鎖已久的外交大門。⁸²。

（一）岸信介時代

有「昭和妖怪」封號，鷹派代表的岸信介，是戰後唯一真正具有國家戰略觀與未來願景的首相，可是卻不受到民眾的歡迎。岸信介反共的立場鮮明，並且成功地修改《日美安保條約》(Treaties of Security and Safeguard Between Japan and United States)，他認為東南亞已成為美蘇兩大陣營的真空地帶，無論是為作為自由主義陣營的一員履行其義務，或是為了在國際舞台上進行活動，亦或是為了復興日本經濟的東南亞市場，東南亞對日本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利用日本的工業力量和技術，協助東南亞新興國家確立經濟基礎，同時也積極地開拓日本市場。

（二）中曾根時代

早在 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期，日本經濟迅速膨脹之際，當時的佐藤政府就極力主張推行「富國強兵」的路線，不過礙於日本當時的國力，因此仍採取唯美國馬首是瞻的態度。1980 年代初期，鷹派首相中曾根康弘上台後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⁸³更把這個大國意識的思潮推向另一個高峰。此一時期日本外交的特徵是：日美經濟摩擦加劇，日本的經濟力量超越歐美。「超越歐美」是明治時代以來，日本官方號召國民共同追求的國家目標與夢想。因此，日本政府決心引導國民朝向另一個超越歐美的「強兵」目標邁進。

中曾根內閣在國會演說中再度強調：「日本不僅要實行經濟的國際化，並且在文化與政治方面積極向前發展，以成為能發揮世界性作用的國家。」同時，日本

⁸² 施嘉明，《戰後日本外交簡史—戰敗至越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頁 160。

⁸³ 中曾根於 1950 年代掀起改憲的風潮，並於 1970 年代出任防衛廳長官時，就極力主張修憲以擴張軍備。從此之後「世界貢獻」、「國際貢獻」，就成為傳媒、日本官方鼓吹大國意識的隱語。參閱卓南生，前引書，頁 232-234。

也要求其在世界事務尤其是在亞洲事務中，能發揮其應有的政治作用並分擔與其國力相稱的國際責任。⁸⁴過去在吉田、岸信介時代，日本為求經濟的發展而受制於美國；但到了中曾根主政時形勢大不同，他首次提出「政治大國」及「國際國家」的目標，為此還要培養「國際型人才」。中曾根一掃戰後歷屆首相萎瑣拘謹的姿態，無論在內政、外交上都象徵著新時代的開始。

（三）1990 年代之後

外務省於其「外交基本方針」中亦強調，以經濟實力和科技力量作後盾，且為國際秩序的主要承擔者，日本積極地參與旨在建立國際秩序的國際合作，這透露出日本政府為提升其國際地位的決心。⁸⁵自波斯灣戰爭後，日本在七國高峰會議中，積極地展現出獨特的色彩並增加其發言的力量。在高棉的問題上，日本積極充當調人，在兩韓之間頻頻穿梭，並且在兩岸關係上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日本企圖把其經濟上的影響力轉化在政治上。⁸⁶進入後冷戰時期的日本不再滿足於過去的「中小國被動外交姿態」，而有意朝「大國外交」的方向發展；並且參加正在構築世界秩序之國際性組織，藉以確保日本自身的安全與繁榮。⁸⁷2001 年美國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進一步為日本營造出一個有利其發揮安全角色的國際環境，日本也抓住此一時機配合美國參與國際的反恐行動，逐步朝「普通國家」邁進，接下來就要討論 1990 年代之後的首相，對於吉田路線所作的調整與修正。

1.海部俊樹

1991 年波灣戰爭爆發後，日本雖然對美國主導的軍事行動提供大量的經濟援

⁸⁴ 趙建民、劉予葦，前引書，頁 458。

⁸⁵ Yukio Satoh, "The Japanese Role," in T.B. Millar & Fames Walter ed. *Asian-Pacific Security after the cold war* (Canberra: ANU Printery, 1993), p.78.

⁸⁶ 張隆義，〈日本海部首相的中國大陸之行〉，《問題與研究》，第 30 卷第 9 期，1991 年 9 月，頁 17-19。

⁸⁷ 林金莖，〈展望後冷戰時期之日本外交〉，《美國月刊》，第 7 卷第 7 期，1992 年 7 月，頁 4-16。

助，但是國際上視日本之態度被動消極，並指責日本是「屬於存在意義極小之國家」，並譏為「支票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雖然日本是聯合國的重要會員國，在外交政策上除強調日美協調關係外，同時也以參與聯合國的活動為其外交方針，但是在波斯灣戰爭中，卻看不到日本的人員參與行動。日本政府為了不使美日關係趨於緊張，甚至波及到兩國間的經貿關係，日本體認到在資金支援之外，仍須在人員方面有所行動，否則在國際上必將「矮人一截」。因此，1991年4月，日本政府派遣海上自衛隊至波斯灣協助掃除水雷的行動，獲得國際間多數的讚揚，認為這是日本在人員方面對國際社會的一種貢獻。海部首相(Kaifu Toshiki)這次派遣行動，除了造成了自衛隊赴海外的事實，也留下了為突破憲法而派兵海外的強烈質疑。⁸⁸

2. 宮澤喜一

1992年1月宮澤首相(Kiichi Miyazawa)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安理會高峰會議中演說，他希望聯合國在1995年聯合國創設五十週年時，對於聯合國的機能及組織改革有具體結論；⁸⁹宮澤的演說旨在廢止聯合國憲章中之敵國條款，為日本擔任安理會之常任理事國進行解套。1992年4月，宮澤首相訪問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四國時，於曼谷發表政策演說，同時也正式宣佈日本的新亞太政策(即「宮澤主義」)，其主要內容包括：日本將在亞洲的安全問題上採取更積極的作法，但絕不會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在經濟上，則促成建立自由貿易體制，並且共同經援東南亞的未開發國家，力圖消除東南亞各國對日

⁸⁸ 日本共出資130億美元支持聯軍的行動，並派遣國際緊急援助隊66人前往支持，停戰後亦派遣海上自衛隊之掃雷艇赴波灣處理殘留機雷。請參閱張隆義，〈日本自衛隊與海外派兵問題〉，《問題與研究》，31卷第12期，1993年1月，頁17。

⁸⁹ 關於聯合國的所面臨的問題，請參閱曹異美，〈日本與聯合國安全保障體制〉，《問題與研究》，第32卷第9期，1993年9月，頁30。

本的疑懼。⁹⁰

由「宮澤主義」的內容來看，日本有意藉冷戰後國際政治地位重組的機會，於外交上深化其政治大國的戰略目標。另外，「宮澤主義」也透露出日本已逐步走出戰敗的陰霾，並且意識到一個和平而穩定的亞洲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重點，日本再也不能如同過去一樣逃避自身對於亞洲應負的責任。為此，日本政府認為日本應發揮與其地位相稱的國際責任，而亞洲是日本的第一步。⁹¹ 另外，1992年6月，日本政府通過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法案（Peace Keeping Operation, PKO）。1992年10月，日本正式派遣陸上自衛隊前往柬埔寨，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這是戰後日本軍隊首次派兵海外的行動。⁹²

3. 細川護熙

1993年9月細川首相（Morihiro Hosokawa）在聯合國大會上表示，根據1992年的決議，日本等國提出改組、擴大安理會等新方向，今後日本將繼續參加這方面的討論。在此同時，日本國內也掀起一股「新國家主義」的思潮，企圖通過控制國家政權，對戰後的日本加以改造，從而將日本導向新的發展道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自民黨幹事長小澤一郎。他強調日本應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並將此一想法反映在其著作《日本的改造計畫》一書中，他的主張對日本政府的決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該書中有關「普通國家」的論觀，更被視作政府今後的施政方針。⁹³小澤一郎對「普通國家」論的詮釋，幾乎與中曾根康弘「國際國家」的觀點，在戰略思維上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⁹⁰ 有關宮澤主義的內容，請參閱金榮勇，〈一九九〇年代日本的亞太政策〉，《問題與研究》，第32卷第6期，1993年6月，頁34-36。

⁹¹ 金榮勇，前引書，頁36。

⁹² 其要點為：在聯合國之下，國際社會的團結與努力解決了波斯灣的危機。冷戰結束後，為形成世界新秩序，聯合國的重要性更為增加，日本以聯合國中心主義為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今後對重要性日益增加的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應予以充實強化。請參閱劍持一己，《PKO 派兵》（東京：綠風，1992年），頁225。

⁹³ 小澤一郎著，陳世昌譯，《日本改造計畫》（台北：聯經，1994年），頁93-99。

4.村山富市

1994年6月，社會黨的村山富市（Tomiichi Murayama）當選首相後，一改該黨過去社會黨安保政策的基本方針，表明「自衛隊合憲」、「堅持美日安保體制」、「尊重日本國旗與國歌」等政策，顛覆了該黨成立以來的基本政策，⁹⁴也形成了1990年代之後，日本社會思潮的右傾與保守化，同時也導致日本國內政治左右翼結構的失衡。

5.小淵惠三

自小淵惠三（Keizo Obuchi）接任自民黨總裁與首相後，普通國家論的觀點即被轉換為以強化大政府統制功能為基礎的戰後總決算路線，積極且徹底地破除戰後舊政治結構。1999年5月，小淵內閣在眾議院主導通過《日美防衛合作指針》（The U.S.-Japan Guidelines for Defense Cooperation of 1997）的配套法案，並促使國會開始討論修憲的問題，同年8月日本政府通過爭議性極高的國旗國歌法，具體落實「日之丸」、「君之代」國歌的立法。國旗國歌法案的通過，這是明治維新以來，歷代政權極力追求卻無法完成立法的宿願，在首相小淵惠三的保守陣營積極的推動下，順利地完成實質審議的作業程序，同時也強化了國家的認同並重塑民族主義的思潮。

6.小泉純一郎

小泉上台後徹底改變了日本長期以來所信奉的吉田主義。⁹¹¹ 恐怖攻擊事件後，小泉首相立即發表反恐七項對策，其中第三項載明「為蒐集情報，儘速派遣自衛隊船艦」。日本政府深恐波灣戰爭當時支付130億美金，卻未獲國際社會肯定的窘態，再度重演，因而急於提出「眼睛看的見的貢獻」。小泉為了配合美國的反

⁹⁴ 松山岐夫等著、吳明上譯，前引書，頁152-153。

恐戰爭，決定派兵前往中東地區。⁹⁵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小泉強調有必要完備應付緊急事態的法律，日本政府加速進行「有事法制」建立準備工作；「有事法制」的提出也大幅度強化首相的權力，同時「有事法制」的相關法案也較《周邊事態法》等做出更多突破，大幅擴大大自衛隊軍事行動範圍。⁹⁶這些決策均被視為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的重要指標。

小布希總統對日本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的表現給予高度評價，並且表示日本對恐怖主義威脅的所作所為，再次證明美日同盟關係的牢不可破；另一方面兩國同意建立「美日戰略對話」的機制，共同來處理亞洲的危機。「小泉與小布希」發展出來的密切關係，已超越 1980 年代「雷根（Ronald W. Reagan）與中曾根」的關係，並且成為日美同盟 50 年以來關係最好的時刻。

中曾根與小泉兩人都是日本受歡迎的首相，執政時間很長，也都是保守派和民族主義的信奉者，先後鼓吹修改憲法並發出政治大國的言論。兩人都親美，中曾根康弘公開表示，日本是美國在東亞「不沉的航空母艦」，小泉則在反恐行動中全力支持美國，這與戰後日本保守路線相比，其作法更加激進、更意識形態化。2005 年 9 月，日本在小泉解散眾議院後提前舉行大選，並在這場政治豪賭中獲得空前勝利；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日本媒體稱其是歷史性的勝利，自民黨的影響力也達到了建黨以來的最高峰。選舉的結果代表了大多數日本選民的思想傾向，美國學者也撰文指出，民族主義在日本將極可能繼續強化。⁹⁷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關注的焦點是，2006 年 4 月小澤一郎當選日本最大在野黨民主黨的新黨魁，這位曾蜚聲上世紀 1990 年代日本政壇的政治家，對於日本政治產生極為重大的影響。他是位具有強烈政治理想的政治家，也是日本政壇中

⁹⁵ 劉冠效，〈轉變中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反恐特別措施法」〉《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頁 54。

⁹⁶ 孫國祥，〈「美國主導」與「東亞整合」互動〉，《2002-2003 亞太綜合安全年報》，頁 15。

⁹⁷ 張智新，〈日本對華政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中國評論》，2006 年 6 月號，頁 82。

少見的戰略家，他的追隨著以及對手都深受其影響，其基本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主張，在日本內外政策中多有體現。因此，許多觀察家也紛紛預測，隨著小澤的當選，即將為日本的國內政治、外交政策帶來新的影響。小澤在政治、經濟與外交的主張如下：⁹⁸

在政治方面，他認為日本的決策權力過於分散，應擺脫政治家嚴重依賴行政官僚立案的思維定勢，主張擴大首相權限於政治上建立有力的領導體制。在他看來，日本需要伊藤博文（Ito Hirobumi）、原敬、大久保利通和吉田茂之類的強有大的領導人。在經濟上，他倡議通過取消限制來擴大就業，改變舊產業結構，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以擺脫目前的經濟狀況。但這兩方面都只是手段，都是為了日本推行對外政策紮下基礎。「普通國家論」為小澤外交主張的核心，他認為日本要成為「普通國家」，就應做出相對的「國際貢獻」，並奉行「聯合國中心主義」。在日美關係方面，小澤堅持「日美基軸路線」，其意圖在於使日本成為「普通國家」或「國際國家」。綜合上述，我們可以得知，隨著小泉的下台，安倍晉三（Shinzo Abe）的崛起，日本將加速地朝「政治大國」的方向前進。

第五節 小結

在外交決策研究中，日益強調認知對於行為者的影響力，決策者心目中對於外在環境主觀的認知，遠比客觀存在的世界更具有影響力。所以決策的行為與內容相當程度受到決策者對於環境的理解與詮釋所影響，因此，探就決策過程毋寧就是在研究決策者如何處理從環境當中所接收到的訊息。決策者面對外在環境的訊息時，會透過已具備的知識與信念進行詮釋，同時賦予這項訊息一定的意義，並形成了決策者的意識型態。因此，意識型態的價值與信念，對於政府政策與決策者的行為而言，具有顯著的影響。

⁹⁸ 張智新，前引書，頁 83。

日本外交政策反覆出現的特色，務實的國家主義，缺乏理想，追求自給自足，以及凡事只求適應等特質，結給之後產生一種自私自利的國際行為。就歷史的觀點來看我們不難發現，日本不斷地向強國靠攏，包括英國（1902—1921 年）、德國（1936—1945 年），以及美國（1952 年之後）。⁹⁹戰後的日本退出國際政治舞台，接受美國的保護，數十年來在國際戰略事務方面毫無置喙餘地。然而，日本外交戰略中對國家權力的追求，與新興強權的結盟，以及與西方工業化國家並駕齊驅的渴望等，反映在全新而特殊的外交政策上。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日本人制訂政策的眼光非常遠大、睿智，絕非戰後各國可比。

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中，美國的國力超群，日本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的政治體制與自由貿易體制。從吉田首相組閣開始，即意識到唯有依靠美國的軍事力量，才能確保日本的安全與穩定，這是戰敗後日本的唯一選擇，他認為日美之間的不平等是暫時性的，此種關係將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強化而發生變化。冷戰的結束與蘇聯威脅的消失，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一度使得美日同盟陷入了漂流狀態，日美兩國的關係出現了潛在的變化。所幸，雙方在擺脫經濟問題的糾纏，以及日本遭遇到來自於中共與北韓的安全威脅後，日本再度意識到亞洲地區的穩定與繁榮，對日本而言極為重要。因此，為確立周邊安全環境，日本仍堅持日美關係是日本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因此，1996 年 4 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雙方發表「美日安全保障聯合宣言—邁向 21 世紀的同盟」，期使雙方的合作能進一步地穩定亞太地區的安全。911 恐怖攻擊事件之後，日本積極配合美國進行反恐戰爭，「小泉與小布希」發展出來的密切關係，已超越 1980 年代「雷根（Ronald W. Reagan）與中曾根」的關係，並且成為日美同盟 50 年以來關係最好的時刻，未來日本的首相也將持續以日美關係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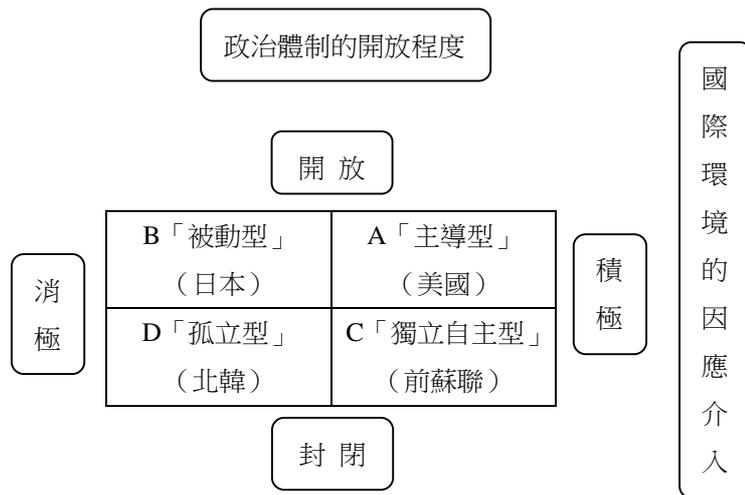
⁹⁹ Kenneth B. Pyle, 〈日本：追求權力的機會主義〉，Robert A. Pastor 編著，董更生譯《20 世紀之旅》，（台北：聯經，2000 年），頁 268。

綜觀個人層次上的分析，我們不難推論不管是戰後吉田首相所主張的「商人國家」或是中曾根首相所強調的「國際國家」，乃至民主黨領袖小澤一郎所提出的「普通國家論」，日美關係仍是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未來日本政壇不論是自民黨或民主黨主政，日本都不會偏離日美基軸，透過與美國領導者的合作，以強化日本的國際影響力。

第三章 國家層次分析

一國政治體制 (political regime) 的開放程度，將大大地影響一國的外交政策，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體制開放，外交政策易受到國內各種不同團體（如政黨、利益團體或輿論等）乃至於來自國外壓力的影響。相對地，共產極權國家的政治體制封閉，外交政策則不易受到國內因素的影響，同時對國際社會的依賴程度也較低。因此，共產極權國家的外交政策，比較容易出現抗拒來自國際壓力的現象。然而，即使政治體制相同的國家，其外交政策也會相左；國際環境的因應、介入程度，這些都是造成外交政策相左的原因。就日本而言，其政治體制開放，惟因國力（如天然資源、軍事力量）等因素，使其對國際環境的因應介入程度，未能同美國般積極。日本的外交政策係屬被動型，容易受到來自國內外壓力的影響(如圖 3-1)。¹⁰⁰

圖 3-1 政治體制與外交政策的關係



資料來源：加藤秀治郎、渡邊啓貴，《國際政治の基礎知識》（東京：蘆書房，1997），頁 280。

¹⁰⁰ 加藤秀治郎、渡邊啓貴編，《國際政治の基礎知識》，（東京：蘆書房，1997年），頁 280-281。

第一節 理論層面

一國政經發展策略的決策過程，是由許多行為者之間的相互連結與互動來完成。在行為者的分析研究當中，最重要的在於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互動。一國政策的制定乃是決策者從二個以上的選擇項當中，篩選出一項的意志行為過程。換句話說，政策決定者在作出決定時，會依照其所屬集團或國家利益與其價值，並配合他所處的環境與得來之資訊下判斷。¹⁰¹因此，我們可以從行為者的變化來觀察日本決策的過程。接下來，筆者將從國家層次上著手，試著找出影響決策的主要行為者，並逐一分析主要行為者的演變（如圖 3-2），以釐清行為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和權力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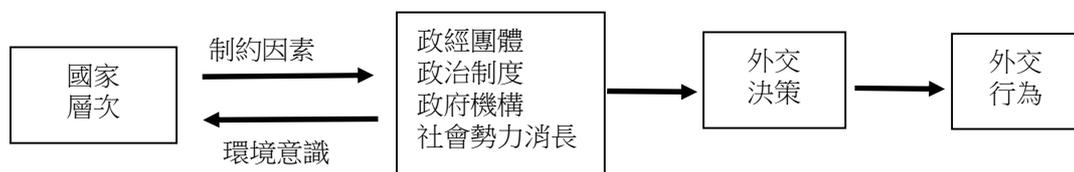


圖 3-2 外交決策過程中的國內因素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耿曙，〈分析層次與國際體系〉，《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2003年），頁 42。

影響日本政策的制定者，包括有官僚機構、國會、政黨、壓力團體、輿論、大眾傳媒等等。以下將針對這些行為者來逐一分析這些行為者在決策體系內的角色變化。

一、官僚體系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作為一個「強大國家」統制著社會的同時，為了迎頭趕上西歐社會追求現代化，行政官僚體制便是「強大國家」的主要推手。日本的大

¹⁰¹ 耿曙，前引書，頁 43。

企業、軍隊、政黨，因美國的占領政策被迫解體，官僚的權力非但没有受到影響，反而在盟總間接統治下逐漸提高權力。官僚因而成為間接統治與戰後重建的重要工具。戰後官僚出身的吉田茂利用整肅軍國主義分子的機會，拔擢了許多官僚出身的政治人物，使得官僚制、執政黨與政府化為一體。¹⁰²

官僚體系通常是國家政策最主要的執行者，日本的官僚透過對政策的規劃，進入國會與政黨的決策中，同時它也經由「行政指導」涉入民間企業的決策當中。因此，官僚體系能有效地推動社會各個領域的發展，同時也對社會各個領域進行滲透，形成官僚與社會各領域的特定利益的緊密結合。1972年自民黨為了抑制官僚專斷進而主導官僚的作法，因而強化政策形成的能力，把黨的政策化為國家的政策，進而主導整個國家資源分配，形成「黨高政低」的現象。1993年隨著小澤一郎出走、自民黨下台，加上大量學有專精的新生代議員進入國會後，使得官僚體系與派閥政治的運作完全改觀。¹⁰³

二、國會

國會通常是國家法令的主要審查者，同時監督政府與官僚體系的執行情況。國會的組成可以分成：一黨獨大與聯合內閣兩種形式；在政策制定方面，則可以區分為協商與族議員主導型兩種。不同的國會型態，將會產生不同的決策型態。在國會是一黨獨大的情況，國家的政策發展將被執政黨所壟斷，以致形成黨高政低的現象。政策的形成，並不是透過執政黨與在野黨的協商來達成，而是由執政黨內具有特殊利益的議員或派閥領袖所把持。¹⁰⁴反之，若國會屬於聯合政府的情

¹⁰² 許介麟、楊鈞池，《日本政治制度》（台北：三民，2006年），頁167-168。

¹⁰³ 蔡增家，〈垂直—整合與脆弱—衝突：論九〇年代日本金融政治的轉變〉，《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2期，2000年2月，頁33-35。

¹⁰⁴ 如1970年代，所有送交日本國會的 policy，都必須要先交付自民黨的政調會，換句話說，主要政策的決定都是由自民黨的派閥主導而不是國會議員。請參閱蔡增家，《日本轉型：九〇年之後政治經濟體制的轉變》（台北：五南，2004年），頁31-33。

況，國家決策重心將出現在國會，而政策形成需仰賴政黨間的協商與合作，因此執政黨所能夠掌控的部分相當有限，這也使得國會在決策體系中的重要性逐漸浮現。

三、政黨

在日本，政黨政治自明治時代起為派閥所操控，並且淪為派閥利用的工具。二次戰後美國占領政策中所推行的「驅逐公職」，迫使左派人士退出政治舞台，使得保守政治成為戰後日本政治的主流。日本的政治本質在於「五五年體制」，其本質可以說是建立在「政－官－財」三位一體的支配理論上（圖 3-3）。¹⁰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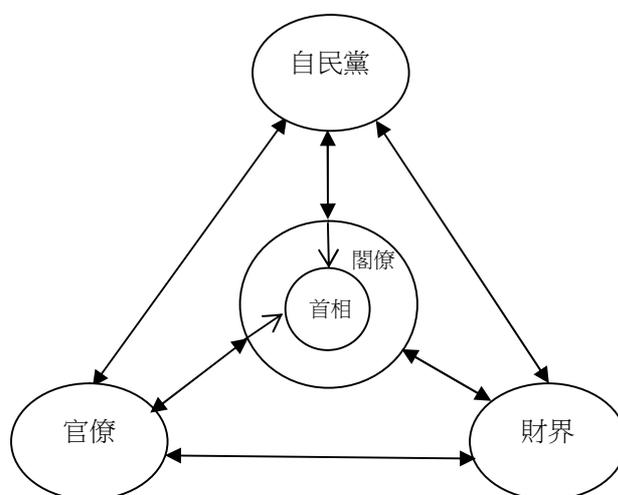


圖 3-3 細谷三角柱系統模型

資料來源：尹懷哲，《日本族議員在行政改革過程中的角色分析》（高雄：佛光山人文社會學院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15-16。

在戰前與戰後政治中，執政黨通常是國家政策最主要的制定者。東京大學北岡伸一（Kitao Kashinichi）教授認為「冷戰－中選舉區制－派閥」是自民黨維持政權的關鍵因素。自民黨在經濟發展的優先條件下，得以長期維持執政，而中選區

¹⁰⁵ 尹懷哲，《日本族議員在行政改革過程中的角色分析》（高雄：佛光山人文社會學院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頁 15。

制雖然可以壓制社會黨的勢力興起，但卻無可避免地導致自民黨出現派閥的統合與鬥爭。1980年代起，一連串的政商弊案，使得自民黨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自民黨內部亦出現改革的呼聲，自民黨在1993年結束長達三十八年之久的執政地位。¹⁰⁶

日本社會黨一直存在意識形態的路線之爭，左右二派1955年順利進行合併。在五五體制下的政經秩序，其實就是以自民黨與社會黨為代表的保守勢力與革新勢力之間的政經鬥爭（表3-1）。由於政黨路線與意識形態的僵化，社會黨空有第一大在野黨之名，卻沒有實質的成長空間，不但支持率逐年下降，票源也遭到其他在野黨瓜分。五五年體制瓦解後，社會黨由於無法因應政治改革等大環境之變革，黨內出現路線的爭執。社會黨首相村山富市上台後，於國會中提出「自衛隊合憲」、「堅持日美安全保障體制」、「尊重日本國國旗與國歌」等政策，顛覆了該黨成立以來的基本政策。¹⁰⁷

表3-1 保守與革新的對立

	政經體制	防衛體制	對外政策	修憲議題
自民黨	資本主義	加強軍備力量	日美軍事同盟	修憲
社會黨	社會主義	保持非武裝中立	和平中立	護憲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1993年日本政界重組，裂解戰後以來自民黨與社會黨相互對抗的政治局面。新一代的保守政治人物紛紛登場，他們高舉改革的大旗，對冷戰後的日本國家發展提出新的思維，成為政界主導。日本政治又再次進入多黨制的時代，「政黨重組」（party realignment）成為此一時期政黨政治的最大特色，因此有學者認為1990年代是日本政壇第一次重組。另外，從2005年9月的眾議院選舉結果來看，我們不難發現，日本的政黨政治正慢慢走出1993年以來，朝野勢力重組所形成小黨林立

¹⁰⁶ 許介麟、楊鈞池，前引書，頁145-146。

¹⁰⁷ 松村岐夫等著、吳明上譯，前引書，頁153。

的紛擾，將逐步形成兩黨制的政治新局。

四、利益團體

利益團體對日本政治運作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利益團體指的是為共同利益所聚集的組織，他們以影響政策及政治過程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日本國會議員的行動多半是受到利益團體所驅動，特別是日本利益團體與自民黨接觸的比率超出其它政黨。因此，1990 年代日本選民強烈要求日本進行政治改革，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正是因為日本利益團體過度涉入政治運作，進而對日本政治形成了嚴重的傷害，也造就了金權政治的弊端。以下逐一分析對日本政治影響較大的利益團體，主要有以下四種：¹⁰⁸

（一）工商業界利益團體

此一團體是利益團體中影響力最大的團體，除因工商業界擁有雄厚的政經資源之外，他們在工業化過程中對一國國力之增長、經濟發展、技術革新等層面具有實質的影響力，這也使得政府決策部門非常重視工商業界的政策意向。其中又以財界四團體是自民黨關係最密切的經濟團體，包括有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日經聯）、經濟同友會（同友會）以及日本商工會議所（日商），其中經團聯是日本業界的大本營，是日本政府與業界最主要的溝通管道。這四個經濟團體是自民黨派閥政治資金最主要的來源。¹⁰⁹

（二）勞工利益團體

¹⁰⁸ 許介鱗、楊鈞池，前引書，頁 216-231。

¹⁰⁹ 工商業界利益團體主要從行政與立法兩方面影響政府決策及政治。就行政方面而言，日本利益團體主要透過團體領袖與各大臣、高級官僚的私人關係，以及派代表直接參加政府的諮詢機構，如審議會等方式發揮影響力。就立法方面而言，最根本的方式就是在國會議員選舉時，捐獻政治獻金給政黨或特定的候選人，並利用原有組織網絡集票動員，支持或推派政策主張符合其利益的候選人，建立國會中的勢力。許介鱗、楊鈞池，前引書，頁 219。

一般來說，日本工會的政治影響力並不強，一方面是因為工人參加工會的比例不高，另一方面則是兩大全國性工會組織－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簡稱總評）與全日本勞動同盟（同盟）長期處於對立，又欠缺整合能力，造成政治資源難以得到統合，因而影響到該組織的政治影響力。戰後勞工組織向來支持左派立場的社會與共產黨，但是在政治總體保守化的過程中，勞工組織立場漸趨保守，從 1980 年代以後的勞動組織重組，以及 1990 年代的政界重編，共產、社會黨的式微以及民主黨的興起，都可以看出這勞工保守化現象日益明顯，也凸顯出利益團體對政黨的生存具有關鍵的影響。

（三）農業利益團體

在工商業極度發達的日本，農業利益團體始終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農業協同組合」（簡稱農協）的組織龐大、成員眾多，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利益團體。日本農民 99% 都納入農協組織，因此農協擁有巨大的政治力量，在 1980 年代之前農協一直是自民黨最穩固的票源基礎。不過 1990 年代起，日本農業面臨到美國開放農業的壓力，這也使得政府與國會議員再也無法捍衛農民的利益，但是農協所掌握的票源，仍然是一股無法忽視的力量。

（四）其他的特殊利益團體

除了上述幾種在政治上影響力較大的利益團體外，另外還有幾種特殊類型的利益團體，例如專家利益團體中的日本醫師會（簡稱日醫）、地方政府等機關組成的地方六團體¹¹⁰、以及宗教團體創價學會（Soka Gakkai）等，這些雖不屬於一般工商農勞等分類，不過其影響力卻不容忽視。

¹¹⁰ 由六個地方政府的民選首長與議員所組成的利益團體，其功能除了各地方政府首長間彼此間聯繫與進行地方政務有關的研究調查外，主要就是經由對國會議員與行政機構施加壓力，串連起來向中央政府「搶錢」以獲得建設地方的資本。參閱許介麟、楊鈞池，前引書，頁 224。

五、大眾傳媒與輿論

國民的意見不是眼睛看得見的組織（利益集團）或活動（政治運動），是更為日常生活化的，其動向以「輿論」的型態被政治行為者所掌握。在 1980 年舉行的菁英調查中，日本與其他的先進諸國不同，日本的大眾傳播媒體被認為是最具有影響力的組織。當決策者從認知乃致於機敏地掌握輿論，並具體地影響政治之際，輿論政治就此開始了。日本現代的輿論政治以系統性的面貌出現，始於 1960 年代池田勇人、佐藤榮作在位時。

大眾傳播媒體包括有報紙、新聞和廣播、網路。雖然各種工具所講求的時效性並不相同，但是對於輿論的形成都具有極大的影響力。雖然傳播媒體、大眾輿論對於各國政府決策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但是政策決定與大眾輿論並不能劃一等號。在國內事務與對外事務上，大眾輿論對於決策的影響程度，有所差別。基本上，國內事務的決策過程，無法輕視民意；不過在對外的事務的決策過程中，國民輿論固然重要，但國家利益才是真正決策考量所在。亦即，官僚從「利益」的角度上進行決策思考，而國民輿論則可能攙雜個人情感與好惡於其中。¹¹¹

歸結上述，我們得知日本所有的政策制定，都是由政府各部會專業的行政官僚先提出數種可行的政策方案選項，再由執政黨或聯盟掌權政治人物，從中決定一個其所偏好的政策方案，並設法在日本國會中推動此項政策法案的通過。這乃是由於日本的政治人物所真正關心的，其實是地方選區中選民的利益，對於國內經濟、社會民生較為關注，至於外交則略顯興趣缺缺。在此一態度下也使得日本外務省的行政官僚，對於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擁有較高的主宰權，不過這種模式到了 1980 年代之後，隨著外交決策的複雜化、擴散化、政治化，外務省的影響力卻逐步下降。以下將逐一分析日本政經制度的改革對於日本外交政策形成何種影響？

¹¹¹ 劉冠效，〈轉變中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反恐特別措施法的探討〉《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2002 年 2 月，頁 41-43。

第二節 政治方面

日本的政經發展約略可以區分為六個時期：¹¹² 第一個時期是從 1955 年至 1960 年期間，這個時期的政經秩序在五五體制下，確立了保守黨的執政與經濟發展的方向；第二個時期是從 1960 年至 1972 年期間，由首相池田勇人與佐藤榮作等官僚體系所主導的經濟發展政策，不但是日本經濟快速發展的黃金時代，同時也奠定自民黨長期執政的基礎；第三個時期是從 1972 年至 1986 年期間，此一時期日本的政經體制，逐漸由官僚體系主導轉向派閥主導，形成所謂「黨高政低」的現象，並形成派閥、企業與官僚之間的共生體系；第四個時期是從 1986 年至 1990 年期間，在這個時期由於日本政府政策的不當，造成國內泡沫經濟，同時也加深派閥與企業之間的利益輸送關係，形成日本金權政治及政治體制的崩壞。第五個時期自 1991 年至 2000 年，日本進入泡沫經濟、金權政治。第六個時期則是從 2001 年至 2005 年，小泉進行構造改革，徹底切斷利益團體與自民黨內派閥的共生關係。

一、1955 年至 1960 年：五五體制的確立

二次大戰結束後，在駐日美軍的主導下，日本進行「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的改革。在政黨政治方面，由於盟總放寬了組織政黨的條件，再加上 1946 年 4 月日本舉行戰後的第一次國會大選，原本在戰爭期間被迫停止政治活動的政黨紛紛復活，或是重新組合新政黨。然而，在盟總推動「公職追放令」的影響下，驅除具有軍國主義色彩的公職人員，使得戰後日本政黨生態產生極大的變化。¹¹³總計自 1945 年至 1948 年，日本政壇相當地混亂，一直到 1949 年 2 月，吉田茂第三度當選首相後日本政壇才趨於穩定。

¹¹² 蔡增家，前引書，頁 55。

¹¹³ 許介麟、楊鈞池，前引書，頁 142-144。

隨著韓戰爆發與《舊金山和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的締結，日本利用此一情勢，迅速地進行經濟重建工作，轉以內需為導向的新階段。日本政治體制為因應此一新局面，同屬於保守勢力的自由黨與民主黨遂進行合併；社會黨為促使革新勢力成為國會的多數，左右兩派人士也決定於1955年進行合併。社會黨與自民黨結束了日本自二次大戰以來的多黨制，自民黨旋即在當年的國會選舉中取得多數的席次，揭開自民黨長達38年的執政。從此之後，保守派的自民黨與革新派的社會黨、共產黨兩股勢力的相互對抗的「五五體制」於是形成。¹¹⁴在日本內閣制的運作下，五五體制不但使自民黨維持長期的一黨執政，也形成了由派閥主導的政、官與財界的鐵三角制度。

二、1960年至1972年：官僚主導

1960年池田勇人接任自民黨總裁及首相，展開長達12年「池田－佐藤」黃金時代，這個時期以官僚系統為主導並將日本經濟帶入另一波高度成長時期。分析1955年之後自民黨之所能夠持續在國會中掌握三分之二的席次，主要是因其策略的奏效。自民黨在1960年之後，成功地將日美安保議題及修憲的爭端，轉換為全力發展經濟；反觀社會黨則仍然在修改憲法及安保議題上打轉，大大限制左派勢力的選票，自民黨在經濟發展上的成功，也成功地奠定了自民黨往後38年的執政基礎。¹¹⁵

從政治層面上來看，可以區分為官僚體系與自民黨二部分來探討。由於之前盟總提出公職放逐令，因而迫使許多官員離職，恰恰適逢國會全面改選，他們便參與選舉進入國會並成為自民黨籍議員。因此，池田勇人的所得倍增政策，即自

¹¹⁴ Ray Christensen, *Ending the LDP Hegemony: Party Cooperation in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pp.5-6。

¹¹⁵ Steven Reed, "The 1993 Election and the End of LDP One-Party Dominance," in Steven Reed, ed., *Japan Election politics: Creating a New Party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 Curtzon, 2003), pp.2-3.

民黨內官僚體系出身的議員，肩負此一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同時透過學長制的倫理關係，加強了官僚在政策上的貫徹性。在自民黨執政基礎漸漸穩固後，日本的政策制定逐漸從國會，移轉至自民黨的政策協調委員會，政調會的通過與否，則必須透過黨內派閥之間的協調與商議。¹¹⁶另一方面，在此一時期，由於各派閥之間大小差異相當大，派閥之間得以和睦相處，同時也奠定日本政經發展的基礎。

總體說來，日本在五五體制之後，許多的官僚透過參選進入國會，這也使得官僚體系的影響力，由單純的部會之間拓展到國會以及自民黨內部，形成官僚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強調保守政治，並積極達成經濟高度成長是五五體制的一大特色，佐藤誠三郎（Sato Seizaburo）與松崎哲久（Matsuzaki Tehiki）教授也認為，由官僚強烈主導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的發展模式來看，由自民黨、行政官僚與利益團體緊密結合的政治體制，具有高度穩定性。事實上，這樣的緊張關係也反映出日本財界，即大產業經營者階層的團結與政治發言權的強化。

三、1972年至1986年：派閥主導

1972年大藏省出身的田中角榮繼任首相，他與過去幾任首相的出身有著相當大的差異，¹¹⁷並深刻了解政治謀略與權力運作。因此，在其主政治期間，他將日本「官僚主導」的政治型態轉變為「派閥主導」。在田中角榮刻意的運作下，派閥（田中派）的政治勢力逐漸凌駕官僚之上，再加上大量官僚體系退休進入國會體系，弱化了官僚體系在整個政策過程中的角色。任何政策都必須透過政調會派閥之間的協商，才有可能付諸實行，而派閥之間的妥協與政治考量，也使得日本政府也開始追求擴大公共工程等短期利益。在派閥勢力凌駕官僚體系，與地方勢力

¹¹⁶ 國會是主要的立法機構，政府的所有施政必須在國會經過充分的討論，並經由國會的立法，再交付官僚體系去執行。但是在日本自民黨長期一黨執行下，每一項法案，都是先由自民黨政調會內部的派閥先行協商後，再交付國會表決。蔡增加，前引書，頁 65-69。

¹¹⁷ 過去幾任首相如吉田茂、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等人，皆是官僚體系出身，而田中角榮本身只有高中學歷，是新瀉地方出身的國會議員。

結合之後，派閥也漸漸主導政策的執行，形成以地方補助款來換取選票的情形出現，最後導致日本金權政治與泡沫經濟的出現。¹¹⁸

四、1986 年至 1990 年：派閥主導

1986 年中曾根康弘帶領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當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使自民黨誤以為只要日本經濟持續成長，選民自然會支持自民黨繼續執政。因此，在自民黨派閥的主導下，日本政府不斷地以擴大政府支出，以及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刺激景氣的成長，在錯誤的政策之下，導致了 1980 年代中期的泡沫經濟。在泡沫經濟的推波助瀾下，企業提供更多的政治獻金，並向日本派閥領袖進行遊說，同時也要求日本政府使用更多的擴張政策，為日本經濟再加溫，同時也為特定的法案來護航，在此一循環下導致一連串的醜聞出現。¹¹⁹

五、1991 年至 2000 年：政黨主導

在泡沫經濟的後期，不只是自民黨派閥捲入金權政治的漩渦中，就連日本人民最為信任的大藏省官僚，都無可避免地涉入金權醜聞，使人民對政治徹底失望，¹²⁰並在 1991 年參議院選舉當中，首度讓自民黨嚐到敗績。自民黨內的新生代政治人物，也開始對自民黨的派閥政治感到不耐，要求黨內進行政治改革的口號，可是卻遲遲沒有實現，因而紛紛出走另組新黨。金權政治不但造成黨內的分裂，也讓自民黨在 1993 年下台結束長達 38 年的執政，¹²¹由細川護熙為首相組成聯合政

¹¹⁸ 在列島改造計畫下，田中政府透過自民黨議員，將政府對地方公共工程建設的補助下放到地方，再由當地議員的樁腳來獲得這項工程，而派閥議員也透過這種地方補助款，進一步來鞏固自己的選票。參閱蔡增家，前引書，頁 78-79。

¹¹⁹ 矢部洋一、古賀義弘、渡邊廣明、飯島正義編著，《日本經濟年史》（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2002 年），頁 334-335。

¹²⁰ Gerald Curtis, *The logic of Japan politics: Leaders, Institutions, and the Limits of Chan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4-36.

¹²¹ 關於自民黨垮台的原因，請參閱蔡增家，前引書，105-109。

府。細川之後由不同政黨共組聯合政權，形成了日本政治運作的常態；¹²²1993 年大選的另一個效應，乃是社會黨的泡沫化。從自民黨分裂的新政黨大量吸引改革選民的青睞，對社會黨選票造成擠壓效應，使得社會黨的席次大幅縮減，改變過去兩大政黨對抗的局面，形成左右翼結構失衡的現象，日本政壇因此進入了戰國時代。¹²³嚴峻的政經狀況，使得愈來愈多的日本國民感到不改革就沒有出路，在輿論的壓力下，自民黨再度執政之後歷任首相，都試圖改革政經體制以回應人民的不滿。

1990 年代推動的政治改革，包括有 1993 年細川任內通過的選舉制度改革，改變了日本政治運作的方式。¹²⁴1996 年橋本內閣（Ryutaro Hashimoto）上台後提出以「變革與創新」為理念的行政改方案，除了重新架構中央省廳之外，還包括擴大了首相的決策權力，並提出內閣法修正案。¹²⁵

六、2001 年至 2005 年：政黨主導

1990 年代全球化之後，東亞各國逐漸改變國家發展模式，然而日本政府卻抗拒這股全球化的力量，使得日本經濟持續衰退。2001 年小泉上台後，他順應全球化的潮流，打著終結自民黨內派閥與構造改革的大旗，對日本的政經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造。小泉的構造改革是一種全面性的改革，它的目的就是要改造現有的政

¹²² Steven Reed, "Realignment Between the 1993 and the 1996 Elections," in Steven Reed, ed., *Japanese Election politics: Creating a New Party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 Curtzon, 2003), p.24.

¹²³ T. J. Pempel, *Regime Shift: Comparative Dynamics of the Japanese Politics Today: Beyond Karaoke Democracy* (New Jersey: St. Martin Press, 1997), pp.108-109.

¹²⁴ 日本現今政壇金權政治及派閥林立，皆源自於中選區制度。請參閱 Lonny Carlie and Mark C. Tilton, *Is Japan Really Changing Its Ways? Regulatory Reform and the Japanese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1998), P.15.

¹²⁵ 橋本的六大改革，在反覆的討論與研議下，日本於 1999 年 7 月通過「中央省廳等改革關連法」，在 2001 年 1 月正式啟動中央省廳新制，包括「政治主導」、「小政府」、「地方分權」、「高行政效率」、「特殊公團法人獨立化」等原則為改革方向。而小泉純一郎在 2001 年就任總理大臣後則又增加「官轉民」的行政改革理念。請參閱許介麟、楊鈞池，前引書，頁 56-57。

經體制，以及解決泡沫經濟的後遺症。¹²⁶由於小泉的構造改革受到黨內自民黨內派閥的抵制，迫使小泉打破過去黨內的年功序列傳統並且大量拔擢新人，以個人專長取向取代過去派閥平衡，導致日本新保守勢力的崛起。這兩項有異於過去政治傳統的內閣人事佈局，對日本政治產生兩項重大的影響。第一、將政策權力從事務官僚轉向特任官，使得官僚權力大為縮減，¹²⁷許多學術界及民間專業人士被延攬入閣的機會將會越來越大。第二、派閥年功序列的傳統被打破之後，派閥政治力量將會逐漸減弱。¹²⁸強調脫離派閥、毀壞派閥，對日本進行全面性構造改革的小泉純一郎，的確是與過去的自民黨首相不同。在其超派閥主政之下，日本派閥政治將會逐漸被終結，朝向自民黨－民主黨的兩黨政治體制，而官僚權力也會逐漸減弱，徹底改變過去日本派閥政治與官僚獨大的政治生態。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過去日本政策的制定，其主要決策權主要是掌握在政－官－財鐵三角的手中，國會的角色通常被忽略。然而，1993年聯合政府成立後，鐵三角體制漸漸被打破，使得政策的主導權重新回到國會。另外，過去在自民黨單獨執政時代，自民黨為顧及輿論的壓力，在單獨審議或強行表決上，常採取自我限制的態度。但是在聯合政權下，如周邊事態法、PKO等法案的成立，則不必再顧及輿論的批判，因而使得強勢國會的運作較為容易。

第三節 經濟方面

二次大戰之前，日本採取經濟和軍事相互支援的手段，以工業化作為發展軍事的基礎，憑恃其武力掠奪海外的資源。戰敗後的日本，適逢從未出現的大荒年，

¹²⁶ 塚崎公義，《よくわかる構造改革》（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1年），頁17。

¹²⁷ 過去日本首相組成內閣的依據，是來自於黨內派閥的平衡，採用的人選自然並非是該領域的專家。日本的內閣大臣通常對於專業的政策並不了解，因而需要依賴事務官處理，結果卻造成日本官僚權力的高漲。參閱蔡增家，前引書，頁223-224。

¹²⁸ Peter Hartcher, *The Ministry: How Japan's Most Powerful Institution Endangers Markets* (Boston, Mas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8), p.21.

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失業人口續增，大都市缺乏糧食，整個經濟陷入空前的危機，幸賴美國的經援始得挽救。恰好韓戰提供日本經濟復甦的極佳的機會。依靠韓戰的「特需」，日本經濟得以恢復。1953年日本政府在經濟白皮書中指出：「由於有了特需，日本經濟因此得以提高。但是，日本經濟卻陷入了離開特需就不能自立的那種不正常的狀態」。隨著韓戰的停止與美蘇冷戰的迅速緩和，迫使日本必須重回「無特需」的經濟，特需的國際收支自1952年11月開始失衡，這是日本媾和後首次的外匯危機。在此情況下，吉田內閣不得不採取「走走停停的短期循環型」的經濟調整方式，終於結束了通貨膨脹，對於經濟的復興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¹²⁹ 以下將分析在五五體制下，日本經濟的發展的歷程與影響。

一、1955 到 1960 年：經濟復甦

政治上的「五五體制」，在經濟上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但穩定了日本政黨政治的發展，同時也為自民黨長期執政，提供政治與經濟的基礎。1955年12月鳩山內閣提出的「經濟五年計畫」，形成了往後歷任內閣上台之際就提出經濟計畫的慣例，此一計畫設立在五年內達到經濟成長率4.9%的目標，不過這項目標在兩年之內就順利完成。1957年日本政府，再度發布新一波的「新經濟成長計畫」，因而締造了戰後第一波高度成長的「神武景氣」，¹³⁰並於1959年出現比「神武景氣」持續時間更長且規模更大的「岩戶景氣」。重組之後的財閥與保守勢力結合，提供自民黨政治運作的經濟來源，農業協同組合與自民黨的相互結合，也提供自民黨在地方動員最大的政治力量。自民黨在1955年具備這些基礎後，緊接著在1960年日美安保議題的紛爭告一段落後，開始全力發展經濟。¹³¹

¹²⁹ 趙建民、劉予葦著，前引書，頁403-404。

¹³⁰ 戰後日本的經濟由「數量景氣」轉化為「價格景氣」，金融市場亦因設備投資資金需要的活潑化而逐漸緊迫。這種大型的景氣是日本有史以來罕見的好景氣，稱之為神武景氣。請參閱林明德，《日本近代史》（台北：三民，1996年），頁383。

¹³¹ Aurelia George Mulgan, *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e in Jap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40-46.

二、1960 年至 1972 年：經濟高速成長

1957 年「穩定增長」與「高速增長」論爭辯方酣之際，池田勇人網羅一批經濟官僚和經濟評論家，並制定未來內閣的經濟政策。1959 年 11 月，當時的首相岸信介於經濟審議會上，提出十年內日本經濟規模擴張 10 倍的構想。不過，真正促使日本提出「所得倍增計畫」，乃是政治上的因素。¹³² 池田勇人上台之後，擬採促進經濟的快速成長的構想，以消除國民的不滿，以圖政治的安定，因而提出「所得倍增計畫」。¹³³ 在安保鬥爭對立之際，此計畫的提出，不僅達成了政治的安定，同時也將國民的目光從政治拉回到經濟。其後又提出「五年經濟復計畫」，將日本未來五年國家總體經濟成長率設定為 7.2%。在出口熱絡及成長的帶動下，日本全面進行公共工程建設，再加上 1964 年日本申辦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s），將日本的整體經濟成長率帶動至 13.6%。¹³⁴

1964 年池田勇人下台，由佐藤榮作接任首相，面對 1965 年因生產及設備過剩所引發的經濟停滯，佐藤提出「新全國總合開發計畫」，以政府進行大量公共投資來帶動經濟的成長，而日本經濟也旋即於 1967 年再度好轉。這波經濟榮景一直持續到 1971 年石油危機發生為止，是為戰後日本經濟成長的黃金時期。1968 年當明治維新 100 週年時，日本終於超越了德、英、法、意而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大國。至此，日本的年平均經濟成長率達 8%，並擺脫「低度開發國家」（less-developed country）的行列，進入「已開發國家」（developed country）。自從日本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後，其經濟進入連續高速增長階段，國際上對日本經濟發展的

¹³² 池田勇人「國民收入倍增計畫」（1961 至 1970 年度）就是下村治理論的具體化。參閱陳世傑，前引書，頁 35。

¹³³ 此計畫的最終目的，乃在「提高國民生活水準，達到充分就業」謀求經濟的穩定增長。請參閱林明德，前引書，頁 398-399。

¹³⁴ 蔡增家，前引書，頁 83。

看法正迅速地發生變化。¹³⁵

綜歸上述，我們發現從池田內閣到佐藤內閣期間，日本政府主要的決策體系並不是在國會，而是掌握在官僚體系。日本政府在經濟上採取三項管制措施，首先是控制國外資金的進入，以建立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增強政府對於經濟體系的控制能力，並將企業資金來源逐漸導向政府控制的銀行體系。¹³⁶其次是建立主要銀行體系（Main Bank System）來控制企業資金來源，¹³⁷以利於政府控制企業的資金來源，使政府主導的經濟政策能夠徹底實行。最後，則是企業之間及內部的交叉持股，使得企業可以從銀行體系獲得低廉的資金以提高其國際競爭力。¹³⁸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國際因素，就是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三和路線」¹³⁹的提出，在蘇聯與中國分別提出「超英趕美」的響亮口號下，這種雄心勃勃的宏偉經濟追求，在和平競賽的國際氣氛中形成了對日本巨大精神壓力。一種民族危機感喚起的使命感，對日本的經濟的高速展起了積極的作用。¹⁴⁰

三、1972 年至 1986 年：經濟成長停頓

1972 年佐藤學校出身的大藏省官員田中角榮，繼任為自民黨總裁及首相，在其刻意地運作之下，不但形成了派閥主導「政高黨低」的現象，也結束了經濟高度成長的黃金時期。田中角榮上台之際，外受到國際石油危機的影響，陷入第一波全球性的經濟不景氣，國內的產業也被迫轉型，使得 1955 年經濟高度成長的「神武景氣」陷入停頓。為此，田中首相提出「日本列島改造計畫」，藉擴大政府支出

¹³⁵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簡稱 GATT。1948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總部設在日內瓦。

¹³⁶ 蔡增家，〈資本管制與金融自由化：以日本為例〉《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3 期，1999 年 3 月，頁 71-84。

¹³⁷ 蔡增家，〈日本金融改革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7 期，1998 年 7 月，頁 31-48。

¹³⁸ 新保博，〈財閥私考〉《日本經營史講座月報》，第 3 卷第 2 期，1976 年 10 月，頁 1-2。

¹³⁹ 指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

¹⁴⁰ 趙建民、劉予葦，前引書，頁 421-422。

來刺激國內景氣的復甦。¹⁴¹在這個改造計畫下，日本國內開始出現第一波地價狂飆，不過受到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來襲的影響，日本的經濟開始進入低潮期，對日本經濟造成以下幾點影響：

（一）大量的赤字出現

從 1970 年代開始，日本政府開始迷信可以利用擴大公共工程建設，來抵抗全球能源危機與經濟的不景氣，進而復甦經濟。不過，日本政府鉅額的財政赤字，也從這個時期出現。

（二）金權政治的浮現

自田中角榮上台後，派閥的政治勢力凌駕官僚體系，再加上從官僚體系退休進行國會體系的族議員，導致在決策的過程中，官僚體系的角色日趨弱化。在派閥主導的政治運作下，日本政府開始追求擴大公共工程建設等短期利益，並與地方勢力相互結合，以穩固票源。因而導致了日本部分的農業縣份開始出現許多無效率以及閒置的公共建設，最後造成了日本政府在財源不足的情況發行國債，衍生金權政治與泡沫經濟的出現。為了要應付這波物價飛漲，1975 年日本首相三木武夫（Takeo Miki）「提出新經濟計畫」以抑制物價高漲，繼任的福田糾夫（Takeo Fukuda）更是提出「構造調整」，寄望以企業減量經營以及增加海外投資的方式，來度過經濟的不景氣。然而 1980 年緊接而來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卻再度使日本陷入不景氣的循環當中，首相鈴木善幸（Suzuki Zenko）緊接著提出「財政再造」，藉縮減政府財政赤字，並積極地進行「行政改革」，來抑制公共事業的支出。

1982 年中曾根康弘上台，在日美貿易逆差日益擴大的情況下，美國開始對日

¹⁴¹ 「日本列島改造計畫」主要內容：分散太平洋沿岸工業重鎮、都市改造計畫、全國環狀交通網絡的設置、15 年內經濟成長率達 10% 的目標。其目的是為了要克服從前的石油危機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參閱金子貞吉，《戰後日本經濟總檢點》（東京：學文社，2000 年），頁 152-153。

本施壓，並要求日本開放國內市場，日本被迫進行金融自由化以及擴大半導體的輸入。從 1980 年代開始，美日之間的貿易逆差逐漸擴大，在美國的壓力之下，雖然日本進行一連串的自由化政策，但日本政府仍以非正式的措施來保護本國的產業。因此，美國於 1985 年 9 月召集英、法及德國訂定「廣場協定」(The Plaza Accord)，造成日圓急遽升值，大量的國際資金湧入日本市場。¹⁴²

四、1986 年到 1990 年：泡沫經濟

此一時期，是日本金權政治最興盛的時期。拜股票飆漲所賜，企業為了要維持土地與股市成長的榮景，紛紛透過對政治人物的政治獻金，向日本派閥領袖進行遊說，同時要求政府進行更多的擴張政策，來熱化日本的經濟，同時也為特定的法案來進行護航。自民黨的派閥在獲得企業的政治獻金後，自然會以政治力來干預其貨幣政策，造就派閥與企業之間關係的緊密。¹⁴³在泡沫經濟期間，日本政府並沒有即時遏制市場上過多的閒置資金，反而一再的降低利率，因此造成市場上的游資過於浮濫。此種經濟政策，短期內雖然維持經濟的活絡性，但是在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政府用盡各種政策工具，卻仍然無法挽救日本的經濟，¹⁴⁴最終也引爆自民黨下台的危機。

五、1991 年到 2000 年：泡沫經濟破滅

進入 1990 年代，日本經濟每況愈下，並且被海內外學者喻為「失落的十年」，甚至連過去引以為傲的低失業率也一路攀升到歷史新高。雖說日本經濟是外向型經濟，受國際大環境的影響較大，然而 1990 年代世界經濟堪稱繁，美國、歐洲的

¹⁴² 蔡增家，〈如何達到最適匯率制度：美國與日本匯率政策選擇的政治分析（1985-2001）〉，《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頁 139-164。

¹⁴³ 北岡伸一，〈自民黨政權の 38 年〉（東京：讀賣新聞社，1995），頁 77。

¹⁴⁴ Masaru Kohno, *Japan's Postwar Party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91.

經濟情況大致良好。然而對日本而言，1990 年代的景氣不振乃是戰後以來經濟最長的蕭條，同時也是七大工業國（G7）中表現最差者。從 1991 年開始，日本經濟持續下滑，日本政府雖然一方面進行片面的體制改革，另一方面卻仍然沿用過去的方式，以擴大政府支出來提升國內景氣。

從 1991 年至 2000 年，日本政府後前後實施了近十次的刺激景氣對策（表 3-2），同時也讓銀行基本利率調降接近於零，但是日本的經濟仍然没有起色，其主因乃是因為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國際資金已衝破國界的藩籬，改變了經濟政策的制定權，轉變了貨幣與利益的決定權，同時弱化了政府的角色。在此種情況下，日本政府仍然使用過去以發行國債來進行不必要的公共投資以鞏固地方票源，造成日本政府每年必須以總支出的 20% 來支付國債的利息。¹⁴⁵

表 3-2 泡沫經濟後日本政府的對策

時期	經濟對策名稱	規模（日圓）	主要內容
1992 年 8 月 （宮澤政府）	綜合經濟對策	10.7 兆日圓	擴大公共投資、中小企業對策、促進民間設備投資。
1993 年 4 月 （宮澤政府）	新綜合經濟政策	13.2 兆日圓	擴大公共投資、中小企業對策、促進民間設備投資、雇用對策、減稅。
1993 年 9 月 （細川政府）	緊急經濟對策	6 兆億日圓	擴大公共投資、中小企業對策。
1994 年 2 月 （細川政府）	綜合經濟對策	15.25 兆日圓	擴大公共投資、中小企業對策、促進民間設備投資、實施所得稅減免。
1995 年 4 月 （村山政府）	緊急經濟對策	7 兆日圓	阪神大地震相關、緊急防災對策、中小企業對策。
1995 年 9 月 （村山政府）	綜合經濟對策	14.22 兆日圓	擴大公共投資、中小企業對策等。
1998 年 4 月 （橋本政府）	綜合經濟對策	16 兆日圓	社會資本整備、特別稅追加、中小企業對策等。
1998 年 11 月 （小淵政府）	緊急經濟對策	17 兆日圓	社會資本整備、金融對策、雇用對策、亞洲對策。
1999 年 6 月 （小淵政府）	緊急雇用對策	70 萬人	增加雇用、就業機會對策。
1999 年 11 月 （小淵政府）	經濟再生對策	17 兆日圓	社會資本整備、中小企業等金融對策、住宅金融對策、雇用對策。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蔡增家，《日本轉型：九〇年之後政治經濟體制的轉變》（台北：五南，2004 年），頁 132。

¹⁴⁵ Bai Gao, *Japan's Economic Dilemma: the Institution Origin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10-112.

1990 年代日本經濟長期陷入低迷的原因，除了全球化的因素之外，還包括以下三點：¹⁴⁶

（一）派閥主導造成經濟衰退

在過去經濟高度成長時期，官僚體系主導經濟政策的制定；但是 1980 年代之後，經濟政策的主導權卻逐漸從官僚體系轉到派閥手中，使得日本經濟政策的制定，受到派閥勢力與地方利益的左右。

（二）資金來源的多樣化

過去日本政府以控制銀行體系來管制企業的資金來源，使企業能夠配合政府的經濟政策。但是進入全球化之後，企業獲取資金的管道也多元化，它不但能夠從外國銀行取得資金，也可以透過資本市場來募集資金，也使得日本政府無法再以偏好性的貸款來管控企業的發展政策。

（三）國內市場的開放

過去日本是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並透過財政融投來獲取郵政體系鉅額資金，以擴大政府公共建設支出來刺激國內的經濟景氣；1980 年代之後，政府的公共建設逐漸被派閥及地方勢力所壟斷，不但造成日本政府財政的失靈，也讓政府累積鉅額的財政赤字。

從以上分析我們發現，日本經濟衰退可以從二方面來看。在政治方面，派閥主導政治；在經濟方面，財政赤字的高築。換句話說，由派閥所推舉出身的日本首只能在正式制度上做片面的改革，卻無力從政、官、界財的鐵三角機制的運作

¹⁴⁶ 蔡增家，〈2005 年日本眾議院改選的政經意涵〉《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2 期，2005 年 3 月，頁 4-5。

上進行根本改革。

六、2000 年到 2005 年：小泉的構造改革

2001 年小泉上台後，便進行所謂的「構造改革」，在此結構之下並不單單只是包含金融制度，或是財政結構等單一面向的改革，而是全面向的改革。日本經濟持續衰退營造小泉改革的環境，同時也讓小泉得以放手進行改革。歷來日本政府所作的改革，不論是政治或經濟層面，都只是針對體制作微觀的調整，直到泉純一郎的「構造改革」，才對日本整個經濟結構作結構性的改革與調整，¹⁴⁷使日本逐漸適應全球化之後的國際環境。打著改革口號的小泉內閣，初期改革的成效不彰，其阻力來自於黨內派閥的牽制、派閥與保守官僚的結合，以及財政赤字、不良債權等因素的影響。2005 年 9 月，小泉所領導的自民黨，在日本國會改選中獲得壓倒性的勝利，這是日本戰後以來最重要的一次選舉，而這次的選舉也證明，小泉的改革政策仍受到選民的支持。¹⁴⁸經過這次選舉之後，道路公團改革¹⁴⁹以及郵政民營化¹⁵⁰將會逐漸瓦解自民黨內的派閥勢力，而自民黨內大量新人的當選，將促成日本朝野新保守勢力的匯集，徹底改變過去由政府主導的政策走向，並且一改過去政、官、財界鐵三角的共生關係。

從經濟成長指標看來，小泉所推行的「構造改革」，使日本經濟從谷底漸漸復甦，其改革已有初步的成效，日本逐漸擺脫經濟停滯的窘境，並且開始穩定增長，

¹⁴⁷ 在政治方面，包括政府體制的改造、政府財政赤字的降低，及既得權的縮減；在經濟方面，則包括財政、金融、產業、特殊法人、農業及社會福祉等六大項目，小泉希望透過這項改革，來改變日本的政經體制，以挽救已陷入谷底的日本經濟。請參閱蔡增家，前引書，頁 258。

¹⁴⁸ 小泉首相冒險解散國會，其企圖以郵政改革措施為口號，剷除長期控制日本政經的鐵三角，凸顯其敢於改革的形象，並恢復國民對其執政的信心。

¹⁴⁹ 二次戰後，日本從五五體制之後便全力發展經濟，而道路建設便是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一環，於是日本政府於 1956 年成立日本道路公團。但是在派閥的把持下，日本道路建設並不是基於經濟的考量，而是基於派閥本身政治利益的考量，這讓日本道路公團累積鉅額的債務。請參閱蔡增家，前引書，頁 16-17。

¹⁵⁰ 由於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政府巨型公共建設開發，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一方面發行國債來籌措資金，一方面則利用財政融投的方式將郵政體系鉅額的資金移為建設基金。

因此，有學者認為日本已經告別「失落的十年」（如表 3-3）。在小泉「構造改革」之下，日本雖說不上有驚天動地的轉變，但比起過去四十年卻給人有一種脫胎換骨的感覺。2000 年以來持續的經濟衰退，營造小泉改革的力量與環境，這些改革徹底改變過去日本政府主導政、官、財界的鐵三角體制，同時也讓日本經濟逐步復甦。¹⁵¹在超派閥小泉的主政下，日本的派閥政治將被終結，逐步朝向以自民黨與民主黨為主的兩黨政治，官僚的權力逐漸下降，政策制定與執行的權責將更容易釐清。

表 3-3 日本經濟成長率（單位：％）

年度	美國	日本	香港	中國大陸
1995	2.50	1.88	3.89	10.51
1996	3.70	3.62	4.31	9.59
1997	4.50	1.79	5.07	8.80
1998	4.17	-1.18	-4.97	7.80
1999	4.45	0.19	3.42	7.11
2000	3.66	2.82	9.97	8.39
2001	0.75	0.41	0.64	7.21
2002	1.60	0.14	1.84	8.91
2003	2.70	2.07	3.20	10.20
2004	4.22	2.74	8.60	9.90
2005	3.52	3.25	7.33	9.90

資料來源：國際金融統計（國際貨幣基金）年報、中國統計年鑑、香港統計月刊。美國、香港、日本、中國各官方網站。

第四節 軍事方面

日美安保體制與日本自衛隊，是日本安保政策的兩大支柱。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在安保政策上共出現四次重大的爭論（表 3-4）。冷戰期間，日本以《日美安保條約》為主軸所建構的日美安保體制下全力發展經濟。在安保政

¹⁵¹ 蔡增家，前引書，224。

策的議論上，日本朝野政黨，以「自衛隊是否合憲」、「對美支援是否會再度捲入戰爭當中」，為其對立的癥結所在。此種意識形態的對立，隨著冷戰的結束也隨之消失。¹⁵²1993 年自民黨結束一黨執政，進入聯合內閣時代。日本朝野政黨對於安保政策的「各論（細節）」雖仍有爭議，但在「總論（綱要）」部分業已建立共識。¹⁵³進入 1990 年代，由於日本受到北韓的核武危機、中共飛彈試射、印巴核爆等事件影響，日本更加重視自身的安全。在日美雙方重新定義日美安保體制並調整安保政策之際，自衛隊的角色也隨之加重，其所擔負的任務亦不斷擴大。

表 3-4 日本安保政策之爭議

時間	在位者	爭議	影響
1960 年	岸信介	修訂《日美安保條約》	日美簽訂《新日美安保條約》
1983-1987 年	中曾根康弘	戰後政治總決算	廢止防衛經費為 GNP1% 的限制
1990-1992 年	宮澤喜一	國際貢獻	通過聯合國和平維持協力法（PKO 法）
1996-1999 年	橋本龍太郎	周邊事態	通過周邊事態法、自衛隊法修訂案、美日物品及勞務相互提供協定修訂案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劉冠效，〈轉變中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反恐特別措施法」的探討〉《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頁 43。

一、自隊衛的成立

美國的占領政策與日本國憲法的制定，徹底改變了日本安全保障的政策。在否定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第九條憲法的限制下，日本的防衛機關曾經一度完全遭到廢除，同時警察機關也在民主化的改革下解散了內務省，廢除國家中央警察並設立自治體警察，以及設置公安委員會的監理制度。其後因冷戰的形成、韓戰的爆發，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要求日本重新武裝，¹⁵⁴為自

¹⁵² 劉冠效，〈轉變中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反恐特別措施法」的探討〉《問題與研討》，第 41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頁 41-42。

¹⁵³ 朝日新聞，2001 年 10 月 19 日，版 4。

¹⁵⁴ 共產主義進而席捲東南亞，美國就必然遭受政治上的大潰退，其影響將擴及世界其他地區，這個理論被稱之為「多米諾骨牌」，日本被定位為防止對這種骨牌效應式悲劇發生的阻擋牆。請參閱王正毅，《邊緣地帶發展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32。

由世界作出貢獻，並將此項要求列為簽署兩國和平條約的前提。雖然首相吉田茂創設警察預備隊，是作為回應美國要求擔負日本本土秩序維持的警察部隊，但是大部分的成員仍是戰前日本部隊的舊屬，擔任日本本土軍事防衛的任務。1952年8月設置保安廳，¹⁵⁵同年10月將警察預備隊改為「保安隊」，海上警察隊改為「警察隊」。1953年9月將保安隊再度更名為「自衛隊」沿用迄今（表3-5），¹⁵⁶以防衛外來的直接侵略為主要任務，自衛隊的實力也隨其名稱之更改而增強。因此，自衛隊的法律地位，長久以來一直是日本國內政治辯論的焦點。

表 3-5 日本重整軍備過程

1950 年韓戰爆發前	1950 年韓戰爆發後麥克阿瑟書簡	1952 年 4 月進行改編作業	1952 年 8 月成立保安廳下轄	1954 年成立防衛廳下轄單位
	警察預備隊 (成立)	警察預備隊 (改編)	保安隊 (改編)	陸上自衛隊
			保安隊 (改編)	航空自衛隊
海上保廳警備隊 (擴編)	海上保廳警備隊 (改編)	海上警備隊 (改編)	警備隊 (改編)	海上自衛隊

資料來源：沈仕晏，《日本國家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頁 122。

二、自衛隊的發展與角色的轉變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規定：「所有會員國在其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或以與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條文中並未使用「戰爭」一詞，換言之，不管會員國是否以戰爭為名的武力行使乃至武力威脅，均被禁止。¹⁵⁷目前，日本政府對於自衛權行使

¹⁵⁵ 藤原彰，前引書，頁 46-48。

¹⁵⁶ 董世榮，《冷戰後美日安保沿革及其地緣戰略意涵》（台中：中興大學國政所碩士論文，2004），頁 20。

¹⁵⁷ 丘宏達，《現代國際法》（台北：三民，2002 年），頁 868。

的解釋如下：在國際法上，根據《聯合國憲章》相關規定，日本作為主權獨立國家，當然擁有集團自衛權，但是礙於憲法第九條的規定「日本國放棄戰爭、禁止武裝軍隊，也不得行使集團自衛權。」個別自衛權的行使，僅限於防衛日本所需最小限度的範圍。而個別權的行使，必須嚴守自衛權發動三條件：第一，受到緊急不當侵略時；第二，無其他手段排除侵略時；第三，限於行使必要最小限度之實力。¹⁵⁸

由於特殊的歷史背景，日本並沒有落實和平憲法的精神，尤其是韓戰的爆發，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使得日本成立自衛隊防衛日本的本土安全，對於日本而言，自衛隊在某種程度上是軍隊的一個別稱。1990 年代出現「成為正常國家」的呼聲，使得日本海外派兵逐漸成為常態。2001 年美國的 911 恐怖攻擊事件，成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轉變的契機。日本政府透過與美國進行反恐合作，並且配套進行修改相關法律，這一連串行動顯示出，日本積極透過立法程，已經建立相當完整的國防體系與軍事指揮體系，這對於日本走向「普通國家」助益甚大；相對地也意味著日本憲法的「和平精神」已逐漸消失。以下將分階段逐一分析，自衛隊的功能與角色的演變，並進一步分析自衛隊角色的提升對日本安保政策的影響。

（一）冷戰時期

日本的防衛作為係依據日本和平憲法、《日美安保條約》以及《聯合國憲章》等三大法律作為建構防衛之基礎。1954 隨著「防衛廳設置法」和「自衛隊法」在國會獲得通過，日本陸、海、空自衛隊正式成立，徹底改變戰後日本關於警察後備力量的性質。¹⁵⁹雖然稱為自衛隊，但其本質上卻是國家的正式軍隊，這與憲法第九條相悖。為此，「自衛隊是否違憲」、「如何消弭憲法第九條與再軍備之間的矛

¹⁵⁸ 劉冠效，前引書，頁 45。

¹⁵⁹ 自衛隊的任務為：「陸海空三自衛隊擔負著保衛國家的和平、獨立和安全，使其不受直接或間接侵略的任務。」

盾」，冷戰時期日本國內展開兩次廣泛而激烈的爭論。

第一次修憲是以鳩山一郎和岸信介兩任首相為代表的「重新武裝派」，一直想利用修憲使自衛隊「合法化」，使自衛隊成為真正的軍隊以實現日本軍事自主；修憲勢力的興風作浪，是為第一次修憲高潮。這次修憲運動雖在強大的護憲勢力的聲討下以失敗告終，但在重建軍備方面卻取得了突破。在鳩山執政期間，自衛隊的兵力由十五萬二千人增加到二十一萬四千人，議會還通過了旨在擴張軍備的「國防會議法案」；岸內閣則制定了「第一次防衛力量整備計劃」。¹⁶⁰其後，隨著國際情勢的轉變以及日本經濟力量的增加，自衛隊的武力亦隨之擴充。自 1957 年起，共推行四次防衛力整備計劃(如表 3-6)，並陸續完成防衛政策的基本方針¹⁶¹。因此，長達 19 年的四期防衛戰力發展計劃中，日本自衛隊已經完成自主防衛建軍戰略的目標。

表 3-6 自主防衛建軍計劃

時間	簡稱	目的
1958-1960 年	一次防	建立基礎防衛力量
1962-1966 年	二次防	提升自衛隊聯合作戰能力
1967-1971 年	三次防	加強自衛隊的快速反應與機動能力
1972-1976 年	四次防	全力發展最精銳的現代化科技武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齊濤，《日本深層》，(台北：三民，1994 年) 頁 114-117。

1970 年代國際政經與安全情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日本國內亦展開關於安全政策的辯論，並強調自主性的安全政策。在 1976 年三木武夫 (Takeo Miki) 內閣期間，防衛廳提出「防衛計畫」來替代「X 次防」，

¹⁶⁰ 陳娜，〈「自衛隊」升級「自衛軍」的意涵〉《中國評論》，(2006 年 1 月號)，頁 85。

¹⁶¹ 內容包括：1. 支持聯合國組織規定，與國際間謀求合作，實現世界和平；2. 推行愛國思想，建立國家安全保障所必須的基礎；3. 根據國家能力與國情需要，在自衛方面所必須的限度內，逐步發展有利的防衛武力；4. 對於外力入侵，依據日美安保體制先予制止，直至聯合國之能力有效地制止時為止。參閱孫向明、張輝燦編，《中外軍事戰略概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 年)，頁 341-342。

不過為避免鄰國的擔憂，因而作出其防衛預算不會超過日本 GNP1% 的限制。¹⁶²進入 1980 年代之後，以外務省掀起的一場「討論防衛問題」的浪潮為開端，掀起了第二次修憲高潮。此次修憲運動雖因護憲力量的抵抗和民眾意識的淡泊無疾而終；儘管未能成功，但是在中曾根內閣時代，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三大軍費支出國，並突破了三木內閣制定軍事開支不超過 GNP1% 的上限，首開大幅增加防務開支之先河。雖然成長幅度不大，不過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此舉被認為是日本擴充軍備的危險訊號。¹⁶³另外，中曾根發表自衛隊實施掃雷等保衛航行安全的活動並不違憲、鼓吹增加軍費、海外派兵等言論，在某種程度上鼓舞了右翼份子。

（二）後冷戰時期

隨著東西冷戰的終結，過去日本自民黨與社會黨，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對立也漸漸消失。在國際情勢出現重大轉變之際，各政黨也不得不重新構思防衛政策的方向。¹⁶⁴若以波灣戰爭為分界，二次戰後迄波斯灣戰爭前，日本安保政策爭論的重點在於「確保日本自身的和平與安全」；波斯灣戰爭後，其議論的焦點轉移為「維持並參與國際秩序」。換言之，前者強調「和平主義」的貫徹，後者則將重心置於「國際貢獻」的展現上。¹⁶⁵另一方面，日本 98% 的能源皆從海外輸入，使得日本也開始思考如何確保其海上交通線的暢通。因此，波斯灣戰爭後，日本打著「國際貢獻」的旗號，將日本自衛隊派往海外，並積極為自衛隊「走出去」製造新的法律依據。¹⁶⁶

¹⁶² See Joseph P. Keddell, Jr., *The Politics of Defense in Japan* (New York: M.E. Sharpe, 1993), pp. 59-72.

¹⁶³ 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 1945-1997〉（台北：東大，1999 年），頁 112。

¹⁶⁴ 張隆義，〈冷戰後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7 期，頁 2。

¹⁶⁵ 大沼保昭，〈『和平憲法』と集團安全保障（1）〉《國際法外交雜誌》，第 92 卷第 1 號，1993 年 9 月，頁 2。

¹⁶⁶ 陳娜，前引書，頁 85。

日本的《防衛計畫大綱》首度發表於正值冷戰的 1976 年，1993 年 10 月細川護熙首相在自衛隊成立紀念日的訓示中發言質疑《防衛計畫大綱》的功能，並於 1994 年以樋口廣太郎（Higuchi Report）為首的諮詢機關「防衛問題懇談會」進行研討。同年 8 月，該懇談會向村山首相提出「日本的安全保障與防衛力應有的情況－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展望」報告書。該報告提議冷戰後要尋求綜合的安全保障戰略，以「促進多邊的安全保障合作」、「充實日美安全保障的合作關係」、「加強自衛能力的維持和質的改善」等三條路線為主要的支柱。1990 年代，日本在安保政策上的突破有二：首先，1992 年的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PKO），使日本自衛隊可赴海外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其次，1999 年的「周邊事態法」，在日本周邊地區發生對日本安全有重大影響之事態時，自衛隊可對美方進行後勤支援。對日本而言，這兩項法案的通過使得日本的防衛政策，由被動走向主動，防衛範圍也由日本本土擴大至遠東地區。

1. 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

自伊拉克出兵科威特開始，日本國內主張打破禁例，派兵出國的聲音也日益洪亮。從日本官方所釋放出的風球，以及日本大眾傳媒引導輿論的動向中，不難察覺日本當局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藉此良機為日本自衛隊的派遣海外鋪路。1990 年 10 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樹提出 PKO 法案，卻因為這個法案來得太過突然，再加上當時自民黨鷹派公開支持修憲，並進一步逐步擴大對憲法的解釋，引起民眾的反感。與此同時，亞洲各國對日本當局派兵海外的言行，深感恐懼並嚴加注視，在各方嚴密關注及反對下，PKO 法案只好被宣判為廢案。¹⁶⁷ 1991 年 11 月宮澤喜一上台後，再度拋出 PKO 法案，在吸取第一次派兵法案失敗的經驗教訓後，在提案之前，日本政府採取一連串宣傳策略，並在眾議院的有關特別委員會上，強行

¹⁶⁷ 卓南生，前引書，頁 217-218。

通過派遣自衛隊出國的新法案。¹⁶⁸這是戰後日本第一個與現行憲法精神相抵觸的法案，其借聯合國的名義突破了海外派兵的「禁區」，使自衛隊合法地邁出國門。此後，日本自衛隊相繼參與了聯合國在柬埔寨、莫三比克、盧安達維和行動。

日本派遣自衛隊赴海外協助維持和平的問題，最初是在美國要求下產生。在波灣戰爭之際，美國曾要求日本參加多國部隊的後方支援工作，在日本國內輿論的反對下遭遇挫折，於是改以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形態出現，並通過立法使自衛隊在海外的活動取得法律的依據。日本藉著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一方面回應美國要求的壓力，另一方面日本也想以其經濟大國之實力，積極參與聯合國的一切活動，進一步獲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寶座。¹⁶⁹曾被喻為「談戰色變」的日本人為什麼允許其政府闖入派兵的禁區，公然撕毀其「和平憲法」？推究其原因，日本政府曲解憲法是首要的原因。戰後以來在日本當局與大眾傳播媒體，長期鼓吹大國思想的意識下，¹⁷⁰日本民眾對派兵問題逐漸喪失原有的敏感性。另外，日本大國意識思潮的重新抬頭，也是重要的因素。

2. 週邊事態法案

1999 年日本國會根據 1997 年的《美日合作防衛新指針》（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逐步通過「自衛隊法修定案」、「日美物品及勞務相互提供協定修訂案」以及「週邊事態時確保日本和平安全法」等相關法案。這三項法案的通過不但落實了《美日合作防衛新指針》當中週邊事態的制度化工作，也賦予了自衛隊海外執行任務的依據，提升日美安保在軍事上的合作關係，

¹⁶⁸ 海灣戰爭結束後，在官方與大眾傳播媒介引導國民輿論的宣傳攻勢下，不少的日本民眾從震驚、反對的立場，逐步轉為採取冷靜、旁觀乃至默許的態度。

¹⁶⁹ 張隆義，〈日本自衛隊與海外派兵問題〉，《問題與研究》，第 31 卷第 12 期，1992 年 1 月，頁 23。

¹⁷⁰ 日本國內宣傳的重點，指出「要當大國，就得出人（派兵）」的國際貢獻論。在派兵成功後，日本國內輿論引導的方向已轉為「要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日本就得積極參加聯合國的武裝部隊和修改憲法」。卓南生，前引書，頁 261。

進一步確立了日本國家安全政策的新方向。由此可知，日本的防衛角色從冷戰時期的「消極防衛」轉變成「積極防禦」。

（三）911 恐怖攻擊事件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紐約與華府兩地，同時遭到恐怖份子前所未有的襲擊，震驚世界各國。在此同時，911 恐怖攻擊亦成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轉變的契機。911 恐怖攻擊為日本提供絕佳的修憲藉口，日本打出「盟國責任」的旗幟，企圖在「協美反恐」的認同下實現海外派兵的制度化。

1. 反恐特別措施法

2001 年 10 月，日本國會緊急通過「反恐怖特別措施法」、「自衛隊法修正案」和「海上保衛廳法修正案」等三大新法案。這三項法案的通過，意味著今後日本可以向世界任何地方派兵參與軍事行動，完全改變日本在過去「專守防衛」的安全保障政策，並且將日本軍事力量由內向型轉變成外向型。¹⁷¹因此，有專家學者認為，「反恐怖特別措施法」的制定，不但為戰時日本自衛隊出兵海外打開了大門，同時也成為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一大轉捩點。

2. 有事法制

1999 年日本國會順利通過「週邊事態法」，為日本海外派兵提供合法的基礎，隨後在 1999 年 3 月、2001 年 10 月，日本海域發生不明船隻入侵事件後，強化日本政府進一步於 2003 年 6 月，建立「有事法制」，作為日本應對緊急事態時危機

¹⁷¹ 尤其是「反恐怖特別措施法」的制定，乃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的特別立法，它既非執行維和行動亦非發生周邊事態並且再度擴大了自衛隊的角色與任務。請參閱蔡增家著，邱稔壤主編，〈911 之後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國際反恐與亞太情勢》（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4 年），頁 155-178。

管理機制的法源依據。「有事法制」是以發生武力攻擊或將發生武力攻擊的事態作為前提，帶有先發制人的色彩。¹⁷²這項政策並未受到在野黨的阻撓的原因，乃是因為北韓的核武威脅，強化了日本政府防衛政策的正當性，同時也扭轉日本人民的危機意識，轉而支持日本政府採取主動性的防衛政策。日本「有事法制」的制定，除一方面回應美國的壓力；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戰後影響日本深遠的「和平主義」，已漸漸失去其政治與安保的影響力（表 3-7）。¹⁷³

表 3-7 冷戰結束後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

時間	事件	現場狀態	後勤支援	法律期限	轉變
1992 年	PKO 法案	平時	無	無	自衛隊得於「平時」派兵海外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
1999 年	周邊事態法	準戰時	包括武器、彈藥的運送 (武器彈藥補給除外)	無	由原先防衛「遠東」轉變成防衛「日本周邊」的概念。
2001 年	反恐特別措施法	戰時	包括武器、彈藥的運送 (武器彈藥補給除外)	二年	自衛隊後勤支援美國的軍事行動，首開「戰時」海外派遣之先例。
2003 年	有事法制	戰時	包括武器、彈藥的運送 (武器彈藥補給除外)	無	以發生武力攻擊或將發生武力攻擊的事態為前提，帶有先發制人的色彩，大幅擴充自衛隊軍事行動範圍。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蔡增家著，邱稔壤編，〈911 之後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國際反恐與亞太情勢》（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4 年），頁 155-178。劉冠效，〈轉變中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反恐特別措施法」的探討〉《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頁 52。

第五節 小結

隨著冷戰的結束，日本政界的戰前世代亦逐漸凋零，退出舞台，新保守主義思潮在日本政界逐漸成為主流。這些政治人物認為，日本必須從自主的國家意識

¹⁷² 2004 年日本更是通過了「有事七法案」，作為對「有事三法案」的重要補充。

¹⁷³ 2000 年 10 月，美國大選前夕，阿米塔吉與奈伊等 16 位共和與民主黨人士，於美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中心，提出「阿米塔吉」報告。該報告強調，日本政府憲法解釋禁止集團自衛權的行使，係日美同盟合作的一大限制。2001 年 4 月小泉上台，在美方的順水推舟下，主動提及應透過修憲的管道來行使集團自衛權。請參閱劉冠效，前引書，頁 48-49。

出發，提出自己的外交與安保政策。隨著這些戰後出生的新生代政治家的崛起，及其追求變革心理的影響下，也大大地改變日本外交政策的道路。因此，從國家層次來看，我們可以歸結出以下幾點：

一、外交體系的轉變

二次戰後，日本建立起以國會為中心的政治制度，國會本該是日本政治制度的核心運作機制。但實際上，從戰前以來持續性的官僚支配，以及自民黨的長期執政，弱化了國會的監督功能。豬口孝教授（Takashi Inoguchi）認為，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來分析，在戰前及戰後的一段時間內，超然於政治並指導國家的官僚體制占著優勢的地位。然而，隨著政黨與政治家發言力量的增強，政黨的角色逐漸擴及到官僚所負責的政策領域中，日本政黨與官僚的互動關係，顯然是一個從「官僚主導」走向「政黨主導」發展過程，亦即「黨高政低」的政治現象。¹⁷⁴不過，政黨地位與權威的提高，並不意味著政黨就不需要官僚體系的協助，相反地，政黨更需要官僚的知識與資源來作為執政的基礎，政黨與官僚之間形成相互依賴卻又相互牽制的關係。¹⁷⁵

目前日本的外交政策正歷經戰後最大的轉換型，外交決策逐漸從以外務省為中心轉向以國會為中心，呈現出「強政治、弱官僚」的政治走向，亦即整體外交決策體系由過去「官僚主導」向「國會主導」轉變，使得國會在決策體系中的重要性逐漸浮現。整體而言，1990年代以後日本在野黨監督執政黨的作為，愈來愈強調「政策政見」的重要性，這是因為日本政治逐漸成兩大政黨的政策對決。此一現象，也反映出日本選民愈來愈重視政治人物對政策政見的見解、說明與批判的能力。雖然目前自民黨是國內的第一大黨，在外交決策上也不能再專斷獨行，

¹⁷⁴ 許介麟、楊鈞池，前引書，頁 72-73。

¹⁷⁵ 尹懷哲，前引書，頁 3-4。

必須與在野黨磋商，大大增強了在野黨對外決策的發言權。

二、新保守主義的崛起

過去日本的政治人物對外交事務並不熱衷，傳統的日本政界著重政治派系的經營與政治利益的分配。這些政治人物往往將外交視為內政的延伸，換言之，對他們而言，外交是從屬於內政的。隨著冷戰的結束，日本政界的戰前世代逐漸凋零，退出舞台。1993年日本政界重組，裂解戰後以來自民黨與社會黨相抗的政治格局，他們高舉著改革的大旗登上政治舞台，對冷戰後的國家發展提出新的思維，並形成一股新的保守勢力，主導政界的發展。他們對於日本的國家戰略發展，不同於和平主義的吉田路線，其主張為堅持日美同盟，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並企圖成為政治大國，依靠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綜合國力以發揮國際影響力。

冷戰後，新保守主義的思潮在日本政界迅速成為主流的情勢下，日本外交政策也一改過去「被動」的姿態而改採「主動」。尤其是911事件，美國展開反恐戰爭後，小布希總統在處理伊拉克與朝核危機的過程中，美國所形成的新保守化的傾向漸漸擴散到日本政界，紛紛主張以日本的軍事力量，來強化日本在國際間積極扮演安全乃至於軍事角色的「新保守國家」(neo-con state)之觀點。¹⁷⁶日本政府透過反恐與美國進行合作，並且配套進行修改相關法律，這一連串的行動顯示出，儘管日本沒有修改憲法第九條的規定，不過日本卻透過立法的程序，建立完善的國防體系與軍事指揮體系，在實質面上有助於日本走向「正常國家」；相對的，也意味著日本憲法的「和平精神」已逐漸消失。¹⁷⁷

三、政策主導權的移轉

¹⁷⁶ 何思慎，〈日本政界世代交替對新世紀的日本對華政策的影響〉，發表於「全球化.民主化下日本與東亞關係」學術研討會（台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2005年10月28日），頁69。

¹⁷⁷ 許介麟、楊鈞池著，前引書，頁26。

在1970年代以前，由於《日美安保條約》的制約，特別是戰後日本的經濟嚴重地依賴美國市場，因而使得日本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美國的意圖而制定。在此一情況下，外務省的功能遠低於大藏省、通產省，另一方面，外交問題與議員的政治生命關係不大，因而日本的國會議員對外交問題的關心度不高。然而，1970年代之後，由於貿易摩擦不斷地加劇、外交問題的複雜化與政治化，特別隨著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逐漸提升，執政黨的國會議員對外交政策的關注與影響力日益增強。

冷戰結束後，日本政界的換血，為日本外交決策模式帶來微妙的變化，他們不再受制於外務省保守的官僚，對於外交事務轉向積極。此外，隨著東西兩大陣營的對話與對立情勢的和緩，日本益發需要強化其外交的發言權，以確保其國家安全。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世界形勢迫使日本必須承擔更多的國際事務，日本的外交政策也因此作出調整，由過去的「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前進。然而，在外交政策大幅調整之際，作風保守的官僚的機構卻難以突破過去的框架，使得國會議員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發揮了主導的作用。

四、利益團體力量的式微

過去利益團體以提供政黨政治資金，來影響政策以及政治過程，以滿足自己的目的。日本國會議員的行動多半是受到利益團體所驅動，特別是利益團體與自民黨接觸的比率比其他政黨高出一倍以上。¹⁷⁸在五五年體制下，日本政治部門受到企業團體與官僚體系的影響以制定政策，因而形成了政（自民黨）、官（官僚體系）、財（企業）的三位一體。1970年代開始，在派閥主導的政治考量下，運用政治系統將各種利益，透過公共事業與行政服務的提供與分配加以緊密結

¹⁷⁸ 許介麟、楊鈞池，前引書，頁216。

合，逐漸形派閥、企業、官僚之間的共生體系。¹⁷⁹然而，1990年代以後利益團體的影響日趨下降的原因有四：第一，因利益團體過度涉入政治運作，導致日本金權政治與泡沫經濟，選民強烈地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第二，日本政府對於政治獻金採取了更加嚴格的限制。第三，日本政壇更迭迅速，不易形成緊密關係。第四，利益團體亦受經濟衰退所苦，政治影響力下降。

五、大眾輿論影響力的提升

國民的意見不是眼睛看得見的組織（利益集團）或活動（政治運動），輿論可分為國民輿論和知識界輿論。前者起伏大，感情因素多；後者相對穩定，理性因素多。如果知識界和媒體發生變化，就有可能影響到國民輿論；日本政府在外交策略上，常藉輿論以發揮「聲東擊西」的效果。如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員卜大年（**Dan Blumenthal**）於2005年發表的《美日同盟的復活》（**The Revival of U.S.-Japanese Alliance**）一文中指出，小泉就利用「參拜靖國」問題來當誘餌，並刻意藉由對靖國神社的參拜，造成中國對此的強烈反應，巧妙的改變了日本國內的輿論與政治氣氛，使得日本的對中強硬路線逐漸抬頭，並藉機強化美日軍事同盟與對台海問題的關切。歸結來說，冷戰後日本的輿論，因受到北韓核武危機、中國崛起等問題的影響，在區域防衛方面已形成共識，但在國際安保問題上，仍無法達成共識。

綜合上述分析，後冷戰時期日本政策指導要綱強調：「日本企業已進出於世界全域，日本人捲入現地紛爭的可能性大增，只求國內安全而已的時代已經過去。」這顯示出，日本「海外派兵法案」的最終目標，有著保護海外資產的用心。¹⁸⁰從

¹⁷⁹ 在派閥主導的政治考量下，日本政府以擴大公共工程並與地方勢力結合的方式來換取選票，不過卻造成無效率及閒置的公共建設。政府在財源不足的情況也開始發行國債，導致金權政治與泡沫經濟的浮現。參閱蔡增家，前引書，頁55。

¹⁸⁰ 在美蘇兩極構造下維持了國際均衡，但兩國經濟力已經式微，勢將由兩極化演變為多極化，轉而亂象環生。日本為對應這種情勢的到來，必須把安全保障政策加以更張。齊濤，前引書，頁133。

五五年體制到 2005 年日本政壇上的變化，我們不難發現在美國保守主義的影響下，日本政界也逐漸朝向「總體保守化」的方向，有關憲政、自衛隊等主張日趨一致，日本正在為後冷戰時期替自己在國際舞台上重新定位。

第四章 國際層次分析

冷戰結束後，國際情勢再度面臨新的挑戰和威脅，為了適應此一情勢，各國紛紛調整其外交政策，不再依循以往的意識型態來建構外交關係，因而加深了國際關係的多元性與不確定性。日本國內對於政策和安全戰略上，是否要繼續追隨美國始終存在爭議。¹⁸¹部分人士主張日本作為亞太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不宜過度追隨美國，而應回歸亞洲，同中共改善關係，加強對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同時展開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外交，並為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預作準備。¹⁸²然而，這種思潮一直無法成為主流思想。1996年日美安保再界定，意味著日本在外交及防衛政策上依然選擇了美國，而未同東南亞國家在冷戰結束後，選擇在霸權美國和大國中共之間保持等距關係。¹⁸³911恐怖攻擊事件後，日本追隨美國的趨勢更加明顯，日本不但配合美國反恐，同時積極配合美國在亞太軍事重組，並強化雙方的協同作戰能力。

第一節 理論層面

政治現實主義者向來認為，國際環境乃是影響國家行為以及國際關係最重要的變數之一，冷戰期間兩極對抗，支配著國際局勢的發展。冷戰的結束改變了民主與共產集團對峙的局面，意識形態也失去主導全球政經發展的力量。這些結構性的改變衍生出新的問題，其中以種族、宗教和經濟等問題最引人注目。七國高峰會討論的焦點，也從安全與政治等問題轉向經濟及貿易方面，而這問題比過去的問題更難以解決。進入1990年代的另一個轉變乃是全球化的浪潮，政治全球化

¹⁸¹ 有關日本對外政策上的爭議，請參閱趙建民、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議〉《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1期，2004年1月，頁86-87。

¹⁸² 俞正樑等著，《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俄、日、歐盟和中國》（北京：中央編譯社，1998年），頁191-197。

¹⁸³ Nikolas Busse, "Constructivism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1, 1999, pp.50-53.

過程的加快，對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換句話說，全球化對日本而言，是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的契機。

一、國際大環境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美國是名符其實的超級強權，基於美國傳統上的孤立主義態度，絕不輕易地參與戰爭，而且一俟戰爭結束，迅速與戰爭切斷關係。因此，短期內美國不願意肩負起維護全球秩序平衡者的責任。不過，由於二次大戰的結束與冷戰的爆發，在時間上幾乎是沒有間隙的，美國陷入了孤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兩難局面。者是全球權力的真空。戰爭摧毀了除美國之外所有戰前（包括歐洲與日本在內）的強權國家；再加上各國外交理念的矛盾，於是從歐洲、亞洲、非洲等地區，到處充斥著權力真空狀態。儘管民族獨立風潮此起彼落，新國家或新政權不斷產生，但體系的結構的定位與未來似乎仍難以露出曙光。1945年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開始意識到美國必須以強大軍力為基礎，領導全世界以維持和平，進而接受外交官肯楠（George F. Kennan）與幕僚們對蘇聯的分析，唯有對抗才能遏制其擴張主義與共產主義，¹⁸⁴因而提出「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成為支配戰後世界局勢發展的主軸。¹⁸⁵

（一）冷戰時期

冷戰時期國際局勢的發展，除了可以從美蘇兩國間的互動以及嚇阻戰略變化的角度來剖析，亦可從國際體系的角度來觀察其變化。從卡普蘭（Morton A. Kaplan）

¹⁸⁴ Public Papers of the U.S. Presidents, Harry S. Truman 1945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3), pp.404-413.

¹⁸⁵ 史匹克曼主張美國應聯合海洋民主國家在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構築圍堵大陸共產勢力入侵的戰線。參閱Kennan, George F. 1947.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pp.566-582。

的體系觀念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冷戰時期國際體系出現了以下的變化：¹⁸⁶

1.緊密的兩極體系

1950 年代以美、蘇兩國為首的兩大集團，由於意識型態的差異以及對彼此的不信任，雙方存在著高度的敵意，非集團角色（如不結盟國家）和全球性角色（如聯合國）皆無緩衝或調適作用。尤有甚著，由於各集團內部成員國不但無法與美蘇兩國相提並論，反之美、蘇對其附庸國則擁有支配的地位。

2.鬆散的兩極體系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由於核子僵局的形成，若干附庸國（特別是西歐與日本）的經濟獲得復甦，新興的第三世界國家紛紛標榜與美、蘇之間維持等距外交關係，在外交上採取不結盟政策。東西集團內部亦發生不和或分裂的現象，換句話說 1970 年代是冷戰體系轉變的重要分水嶺，國際體系的內涵也轉向了「鬆散的兩極體系」。

3.非常鬆懈的兩極體系

1980 年代美國摧毀一手建構的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緊接著石油危機的爆發導致了全球性經濟動盪，日本與西歐經濟迅速復興並逐漸對美形成競爭威脅，蘇聯受長期軍備競賽拖累乃至於瀕臨經濟解體……等因素，使得曾經維繫長期和平的兩極架構出現明顯的鬆動，而朝向多元化方向邁進，¹⁸⁷1989 年蘇聯的崩塌則是對體系的最後一擊。

（二）後冷戰時期

¹⁸⁶ 蔡東杰，《西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2001 年），頁 266-267。

¹⁸⁷ Donald E. Nuechterlein,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rests in a Changing World*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3), P.172.

蘇聯解體為冷戰劃下句點，兩極體系的終結打破權力平衡的結構，國際體系亦呈現出力量失衡的現象。國際戰略力量的失衡，形成國際體系產生結構上的矛盾，增加世界局勢發展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檢視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的變遷，中重要的觀點有以下幾種：

1.單極論

克勞薩莫 (Charles Krauthammer) 認為冷戰結束後的世界，發生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不復存在，國際體系將朝向單極發展，美國仍然是世界權力的中心。¹⁸⁸他也認為波灣戰爭結束後，美國政府提出「國際新秩序」的口號，更加突顯了美國的獨霸地位。從新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當美國國際地位相對加強，而第二強國無法抗衡第一強國時，單極體系儼然到來。另外，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裏辛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也認為，美國至今仍然是唯一的一超級大國，在經濟、軍事、技術、文化四方面對全世界具有無比的吸引力，促使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全球性超級大國。¹⁸⁹

2.回復兩極結構

美國國防大學國家戰略研究所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的所長漢斯 (Hans Binnendijk) 認為，新的兩極將以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為一方，另一方則是中、俄、印及無賴國家。但是部分俄羅斯學者也認同兩極結構，只不過其內涵與漢斯的主張不同，而是指歐洲、中國聯合，與美國對抗。¹⁹⁰

3.一超多強

¹⁸⁸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1 (Winter 1990/1991), pp. 23-33.

¹⁸⁹ 布裏辛斯基著、林添貴譯，《大棋盤》（台北：立緒，1998年），頁27。

¹⁹⁰ 林利民，轉引 Hans Binnendijk, *Back to Bipolar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1999, pp.10-13.

杭亭頓 (Samuel P. Huntington) 認為國際體系已朝向「單極為主多極體系」(uni-multipolar system) 發展 (圖 4-1)。¹⁹¹萊恩 (Christopher Layne) 認為體系內仍有其它的軍事和經濟強國 (日本、德國) 存在，且單極體系必定會引發新崛起強權之間的挑戰，只時時間快慢的問題，而原先的單極體系將會轉變為多極體系。¹⁹²另外，奈伊 (Joseph S. Nye) 則認為，若將權力的分佈情形比擬為三維棋賽，頂端為軍事力量，美國是當今超強，所以是單極局面；中間為經濟力量，主要角色為美國、歐洲與日本，所以呈現多極現象；底端則為權力結構更加分散的跨越國境 (cross border) 與在政府管轄範圍之外的跨國關係。¹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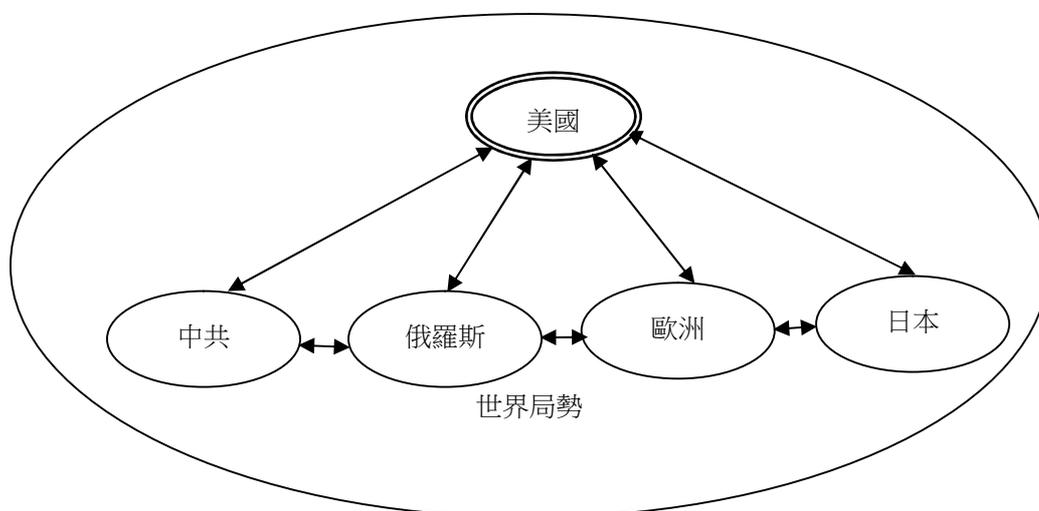


圖 4-1 單極為主多元體系

資料來源：施閔豪，《美國對中共戰略之轉變 (雷根－柯林頓時期)》(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頁 34。

4. 文明衝突論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指出，不同文明的國家和國

¹⁹¹ 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Vol. XXXIII, No.1 (January/February 1991), p.6.

¹⁹² Christopher Layne,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 No.4 (Spring 1993), pp.5-51.

¹⁹³ 蔡東杰譯，《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臺北：左岸，2002 年)，頁 57。

家集團之間的關係不僅不會緊密合作，反而會相互對抗。他將未來 15 年的全球戰略關係區分三階段解讀：第一階段美國仍是唯一超級霸權。第二階段則會出現許多區域性的強權，如亞洲的印度、中國、俄羅斯，歐洲的德、法二國，以及拉丁美洲的巴西。第三階段則會出現抗衡區域強權的力量，都將無可避免地將與美國發生衝突。¹⁹⁴在兩極對抗的冷戰時代，是以軍事安全為主軸的安全思維，而「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則是後冷戰時期的安全概念，其面向包括了非軍事因素，如經濟、社會、環境、資訊、恐怖主義等範疇。傳統的國家安全與國際安全觀起因美國 911 恐怖攻擊事件起了變化，並且撼動了全球政治，更影響了全球經濟。因此，在全球化的時代中，「風險社會」(risk society)已經擴充到一些非中心的邊陲國家，因而形成了「全球化的風險社會」。¹⁹⁵

綜歸上述，我們發現從冷戰結束以來，由於全球化進展快速，國家經濟安全的問題就成為一國對外政策與戰略發展的核心。杭廷頓亦指出，經濟活動確實可能是國家最重要的生存因素，其經濟力量的強弱，將是決定國家處於主導或相對優勢地位，還是從屬、依附地位的重要因素，且其重要性日益增加中。¹⁹⁶後冷戰時期雖然是轉向「以經濟競爭取代軍事對抗」和「以談判合作化解敵對衝突」的全球和解的氛圍裡，但是新的國際秩序卻在各國秉持經濟民族主義 (economic nationalism) 的原則之下，進行區域性的經濟聯盟。這代表國際秩序逐漸在既有「地緣政治」(geo-politics) 的權力平衡下，擴增「地緣經濟」(geo-economics) 的利益安排。

二、國際次環境

¹⁹⁴ Samuel P. 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臺北：聯經，1998 年），頁 7-9、22。

¹⁹⁵ 有關「風險社會」，請參閱 Ulrich Beck,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e, 1986).

¹⁹⁶ 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Vol.XXXIII, No.1 (January/February 1991), p.6.

隨著冷戰後國際權力結構的改變，作為全球次體系的亞太地區，無不強化自我實力以維護自身利益，進而填補權力的真空。由於亞太地區，在地理上及歷史上的多樣性，也使後冷戰時期的亞太地區，呈現出多樣性的安全觀。¹⁹⁷

（一）蘇聯的解體、美國權力的式微

亞太地區因海洋（太平洋邊緣國家）與陸地（亞洲陸塊國家）相對的地緣特徵，以及自二次世界大戰後分採不同政經體制與發展策略，導致亞太地區從韓戰迄今就呈現海洋（以美、日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與陸地（以蘇聯、中共為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相對峙的關係。冷戰結束後，昔日美、日兩國軍事同盟的敵人的威脅驟減，但是冷戰所遺留下來的問題卻尚待解決。

1990 年代伊始，美國的政界、學界和輿論界對於美國是否要繼續維持世界各地軍事行動，出現了質疑與檢討聲浪。尤其是當美國經濟出現衰退之際，美國政府也極需重新定義美國的國家利益，並且尋求一個新的理論架構，以支撐下個世紀美國的全球安全戰略政策。在亞太方面 1991 年至 1992 年的《東亞戰略報告》（East Asian Strategy Reports, EASR），報告中指出美國將階段性地減少或撤離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駐軍，亞太地區將出現權力真空，此一報告引起了亞太地區尤其是日本的擔憂。美國為了要防止其東亞戰略利益的流失，必須加強美日安保體制以確保東亞海域之制海權，更進一步地希望強化日本的角色及影響力，以維護區域內的和平與穩定。

（二）中國崛起

中共是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竄起速度最快的新興強權，也是影響亞太未來政經局勢發展主要的力量之一，更是亞太地區對日本政治大國目標最具威脅的國

¹⁹⁷ 詹滿容等著，《亞太集體安全體系之建構與我國扮演之角色》（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6年），頁25-26。

家。中共在經改成效的支持下，積極進行國防武器的現代化，尤其是從俄羅斯獲取先進的海、空軍武器，使得中共結合強烈經濟與軍事企圖的「海洋戰略」日趨落實。中共國力的迅速提升，明顯觸動亞太海洋與陸地國家間微妙的權力平衡關係，而對鄰近的海洋國家造成極大的安全威脅。「中國威脅論」不僅是亞太區域內弱勢國家，對尚未發展出能予中共強權有效牽制的憂慮，如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所言：「在東亞地區，最令人擔憂的事莫過於中國軍力的擴張；中國必須重整軍備，而這將會導致日本起而效法，以制衡中國的力量；進而引發東亞地區軍備的競賽。」¹⁹⁸

美國《時代週刊》(Times)也於1993年發表專題報導，認為中共已有主導東亞地區的野心，並指出中共建立遠洋海軍的目的，乃準備將其軍事勢力伸展到南海海域。美國奈伊在其所提出美國《東亞戰略安全報告》中，也清楚地指出中共自天安門事件後，不斷提高國防預算並加速擴張軍備。日本防衛廳出版的防衛白皮書中，也從1993年起便將中共視為潛在威脅。從區域與全球安全的角度觀之，日本認為中國的崛起並不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

(三) 領土主權的爭議

戰後亞太地區雖未必會出現如南斯拉夫或前蘇聯各國那樣大規模的紛爭，但是冷戰結構的崩塌也使得亞太地區潛在的衝突一一浮現。這些衝突的本質仍以領土主權之歸屬、邊境劃界、無主領土之爭奪與國境內獨立運動或分離主義抗爭為主。其中最可能引爆軍事衝突的三個地區為：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南海主權爭議。

(四) 缺乏多邊安全機制

¹⁹⁸ 李文志，〈『中國威脅』與美國的對策：介入？圍堵？〉，http://www.inpr.org.tw/inprc/pub/journals/120-9/m129_4.htm

亞太安全體系的構想在後冷戰時期已悄悄萌芽，惟因亞太地區的高度異質性，對亞太區域主義的發展相當不利，進而影響到區域內集體安全體系的建立。另外，亞太國家在追求區域安全時，仍然沿用冷戰時期所遺留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機制。¹⁹⁹目前亞太地區權力平衡體系，主要是以美國所領導的雙邊協防條約架構為主(表4-1)，這些雙邊或多邊條約，對亞太區域形成一定程度的穩定作用。

表 4-1 美國與亞太國家的防衛關係

日本	美日安保條約	紐澳	美澳紐公約
南韓	美韓共同防禦條約	泰國	1951 年美國共同安全法
台灣	台灣關係法	新加坡	1990 年美新後勤設施使用諒解備忘錄
菲律賓	美菲共同防禦條約	汶萊	1994 年美汶防禦合作諒解備忘錄

資料來源：引自林正義，〈亞太安全保障的新體系〉，《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12 期，1996 年 12 月，頁 13。

三、美國亞太戰略的轉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啓美國掌控太平洋的戰略契機。美國分別從亞洲陸地與陸地邊緣的海島鏈兩條戰略動線介入東亞戰事，企圖從戰時到戰後全面控制東亞局勢的發展。然而，美國的戰略構想卻因中共取得中國政權而遭破壞，迫使美國在韓戰爆發後，確立以列島戰略的海洋圍堵線，以圍堵亞洲陸地的共產主義勢力向海洋國家擴張。²⁰⁰

(一) 冷戰時期

1950 年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就是在海洋與陸地對峙的地緣政治中，透過雙邊安全協定與經濟援助的方式，將美國與亞太盟邦的政經利益整合成為以美國為首

¹⁹⁹ 權力平衡乃是維持國際和平的一種制度，也是決策者追求的一種國家安全政策，為了確保權力分配達到均衡狀態，必須應用各種權力平衡手段，其中以增強軍備及締結軍事同盟最常使用。請參閱林正義，〈亞太安全保障的新體系〉《問題與研究》，第 32 卷第 9 期，1996 年 12 月，頁 13。

²⁰⁰ 在亞洲陸地上，美國希望扶持中國成為戰後東亞的強權，以牽制戰時不斷擴張的蘇聯共產黨，並在戰後取得主導中國龐大市場的籌碼。在海島鏈上，美國以跳島反攻的戰略方式，逐步掌握串聯亞洲陸地邊緣國家的籌碼，在亞洲陸地周圍建立可進可退的海洋戰略線，這就是著名「列島戰略」。李文志，〈海陸爭霸下亞太戰略形勢發展與台灣的安全戰略〉，《東吳政治學報》第 13 期，2001 年 9 月，頁 134。

的區域安全體系。然而，196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的海洋圍堵戰略路線因蘇聯的擴大建軍政策以及積極介入東南亞戰事而鬆動；1969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在關島發表了美國今後的亞洲政策，即「關島主義」（Guam Doctrine）表明美國將自亞太撤軍，並強調亞太國家應強化自身的防衛責任。²⁰¹

進入1970年代，美國的亞太戰略不僅延續「聯中制蘇」的陣勢，在卡特總統（Jimmy Carter）上台後更有深化美蘇在亞太地區的和解，使美國更形依賴中共以牽制蘇聯與維持亞太區域穩定的角色。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迫使卡特政府（Jimmy Carter）放棄深化和解的戰略，重新對蘇聯採取強硬的政策。1981年上任的雷根總統（Ronald Wilson Reagan）在蘇聯取得越南金蘭灣的海軍基地，以及中共有意緩和與蘇聯對峙的情況下，迫使美國重新審視「聯中制蘇」的戰略以因應新的亞太形勢。美國政府內部也因而爆發激烈地辯論，最後海洋戰略再度成為1980年代美國推動亞太戰略的主張。1989年2月，馬爾他高峰會中正式宣告美蘇關係的全面和解，連帶促使亞太地區柬埔寨、南北韓等問題的漸次鬆解。

（二）後冷戰時期

後冷戰時期，美國為了持續掌控亞太地區的政經發展，企圖推展以安全保障與經濟利益相結合的亞太戰略；此一戰略的發展將遭到中共與俄羅斯的挑戰，以反制後冷戰時代美國所欲建構「一超多強」的國際體系。布希（George H. W. Bush）上台後，推動「扇形戰略」（fan-spread），其「扇沿」（圖4-2）成為美國推動「和平演變」的「新（軟）圍堵線」。²⁰²亞太經濟合作是扇面表層結構。美國的考量是：在安全方面，繼續維持雙邊軍事同盟關係以穩定亞太地區的安全；在經濟方面，

²⁰¹ Robert G. Sutter, 1991.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anging East Asia Order: Implication for Taiwan's Ability to Deter Possible Treats from the Mainland*.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ly 1991.

²⁰² 布希政府時代的國務卿貝克於1991年提出，他認為美國的亞太戰略即：扇軸在北美向西開展，骨架是美日同盟，以美國為中心所輻射出去，從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澳洲等海洋國家所構成之弧形的「扇形戰略」。

通過亞太經濟合作部長會議（APEC）以保持多邊協調機制，並確保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上的主導權與各項的經濟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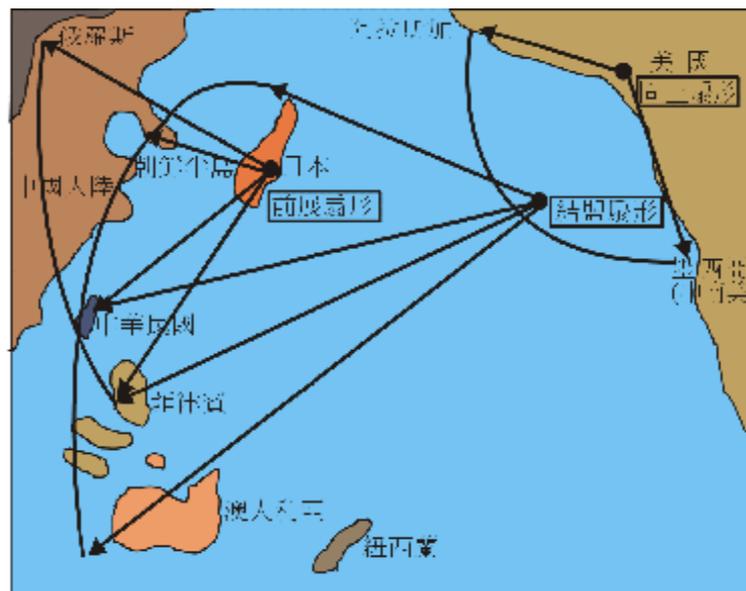


圖 4-2 美國的扇形戰略

資料來源：李文志，《後冷戰時期美國的亞太戰略》（台北：憬藝，1997年），頁60。

「新太平洋共同體」（A New Pacific Community）是柯林頓政府上臺後的亞太戰略，而美日關係一直是推動該戰略最重要的軸心。²⁰³不過，因美日貿易摩擦的加劇，導致美國內部對於日美關係，出現經濟（修正派－日本威脅論）與安全（傳統派－戰略平行論）派的激辯；其戰略重心也由歐洲轉向亞洲，並且採取「交往代替圍堵」的戰略來維繫亞太地區的穩定。直到 1995 年「奈伊報告」、1996 年的台海危機，再度確立了美日安保體制是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中的核心。因此，美日雙方於 1996 年、1997 年分別簽訂《美日安全聯合宣言》、《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大幅加強了對中國的遏制與防範態勢。²⁰⁴

²⁰³ Bill Clinton, 1993. "Clinton: I'm Sending a Message of Asia's Importance." *AIT EPF* 205 (July 6, 1993).

²⁰⁴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戰略與安全形勢評估 2001-2002》（北京：時事，2002 年），頁 55-61。

小布希總統（George W. Bush）上台後，美國政府逐漸凸顯新保守派的傾向和對權力政治的追求，致使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產生變化。²⁰⁵探究其原因，除了經濟的理由之外，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的變化與發展，也逐漸對美國構成安全上的挑戰。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就指出，美軍必須將軍事重心，投射在亞太地區的朝鮮半島及中國；然而焦點的轉移並不代表美國對歐洲降低興趣，而是亞洲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將逐漸升高。基於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的外交理念，小布希採取「聯合盟友以制衡中共」的亞太戰略。

然而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之後，國際係似乎進入一個新時代。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 L. Powell）提出，「不但冷戰結束了，後冷戰時期也結束了。」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的亞太戰略也隨之作出調整，有學者認為這是美國霸權走向衰弱的徵兆，然而事實證明，美國在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分別運用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雙邊主義（bilateralism）以及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使美國並未因此撤出亞太地區，反而成功地落實其原先既定的亞太政策，使美國得以繼續鞏固並強化其霸權地位。²⁰⁶簡言之，小希布政府企圖建構一個以美國單邊行動為核心，以盟友雙邊合作為基礎，以國際多邊協調為支撐的反恐聯盟與安全架構；其初期目標設定在打擊蓋達組織、阿富汗塔利班（Taliban）政權，中期目標為瓦解以伊拉克、伊朗、北韓為首的「邪惡軸心」（Axis of Evils）反美政權，至於長期目標則是要遏止中國等潛在戰略對手挑戰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²⁰⁷

四、日本亞太戰略的調整

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選擇一條作為「通商國家」而生存與發展的道路，

²⁰⁵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認為，未來的共和黨政府應以國家利益，而非虛幻的國際社會利益。小布希總統的外交觀點深受萊斯及其國家安全團隊成員的影響。

²⁰⁶ 孫國祥，前引書，頁 6-7。

²⁰⁷ 林佳龍，〈國際反恐下的台灣安全戰略〉，發表於「台日論壇 2002 年台北會議」（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2002 年 7 月 16 日），頁 116。

形成了以「經濟立國」為核心的國家戰略，奉行吉田路線並採取最小途徑的防衛與安全政策。在外交上，日本採取追隨美國的外交政策，鮮少有自己的立場。不過隨著冷戰結束、日本自身經濟力量的茁壯和美國逐漸從亞洲撤出其駐兵，日本在亞洲事務上的聲音和影響愈來愈大，日本的外交政策也隨之改變。

（一）冷戰時期

冷戰時期，美國為圍堵共產勢力在亞洲地區的滲透與擴展，也為了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日美兩國簽訂《日美安保條約》。因此，在美國的亞太戰略中日本始終扮演，防止「多米諾」骨牌效應悲劇發生的阻擋牆。²⁰⁸在韓戰和越戰期間，日本作為美國後方基地的支援助地區，1980年代則逐漸轉型為美蘇區域軍力平衡的參與者。日本自衛隊加強與美軍實施聯合訓練與演習，並進行角色與任務分工，由美軍擔任「矛」，日本擔任「盾」的角色，以穩定亞太地區的安全。

（二）後冷戰時期

蘇聯解體後，美日同盟仍然是日本外交的基軸，並與美國建立「全球性夥伴關係」，日本借此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與影響，以緩和日美經貿摩擦，為蘇聯解體後的日美關係注入新動力。進入後冷戰時代，日本在亞太安全方面採取雙軌戰略，一方面堅持美日軍事同盟，以維護日本的國家安全與海外利益。同時日本積極提升自衛隊的防衛能力，並藉美日實施聯合演訓以建立作戰能力。另一方面，日本積極參與多邊安全對話機制，以防止爭端並解決衝突。日本也利用美國要求分攤責任之際，強化其在東亞區域內的角色與功能，目前日本正遂行多層次的戰略佈局，謀求於未來的國際局勢中發揮重要影響力。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日本在美國主導的反恐戰爭中，一改變過去波灣戰爭中

²⁰⁸ 沈仕晏，前引書，頁 116。

消極的態度，不僅出錢而且出人，日本眾議院隨即以 140 票贊成、100 票反對通過「對付恐怖組織特別法」，成功地授權自衛隊派遣軍艦到印度洋援助美軍攻擊阿富汗的行動，進一步實現自衛隊的海外派遣。²⁰⁹對美國而言，日本作為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的盟友，並提供 1,400 名自衛隊員，不僅有其象徵性的意義，實際上也提供十分重要的協助。就日本而言，對伊出兵除加強美日的合作關係，代表日本外交政策的獨立性，同時也展現出日本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綜合上述分析，日本政府加強與美國合作之戰略意圖其目的有五。第一，提高國際地位，改變美日同盟中的不對等。第二，擴大國際作用，提供日本運用軍事手段處理國際事務的依據。第三，透過美日安保體制的發揮瓶蓋作用(cap in the bottle theory)，²¹⁰以緩和周邊國家的反彈與對日本發展方向的疑慮。第四、日本利用美日同盟牽制俄羅斯、北韓、中共等區域內的國家。第五、為日本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甚至為軍事大國鋪路。²¹¹

第二節 政治方面

自冷戰結束以來，日本也開始對其經濟外交作出調整，以謀求確立以經濟為主、政治為輔的外交戰略。日本對外已不再自滿於過去的「中小國外交姿態」，而有意朝「大國外交」的方向發展。自 1945 年日本參加「可倫坡計畫」(Colombo Plan) 以來，積極對外進行政府開發援助，到了 1992 年，日本對外的援助之金額已超越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日本雖然成為經濟大國，然而其國際地位卻無法與經濟實力相比擬，因而使得日本對其國際地位的不平等更形不滿；尤其當日本的經濟與

²⁰⁹ 蔡增家、邱稔壤主編，〈911 之後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國際反恐與亞太情勢》（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4 年），頁 155-178。

²¹⁰ 日本《產經新聞》指出，美國保持在日本及亞太駐軍有多種目的，其中主要目的之一是發揮「監視日本」的功能，發揮防止軍國主義化的瓶蓋作用。丁永寧，〈日本會成為軍事大國嗎？〉，《新華網》，2002 年 9 月 29 日，〈<http://ijs.cass.cn/files/xszl/dingyongning.htm>〉

²¹¹ 曉光，〈冷戰後日美安保體制的調整對亞太地區中日關係影響〉，《東亞季刊》，30 卷 4 期，2003 年 9 月，頁 74。

科技實力與日俱增，且外援執世界牛耳後，國內各界要求日本提升國際地位的聲音愈來愈大，²¹²以下將從政治大國與聯合國外交二方面，逐一分析日本外交政策的發展。

一、政治大國的發展

從 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初，日本的戰略環境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中曾根康弘在擔任日本防衛廳長官時，就曾表示：「改變歷來對美國的不明確期待與缺乏原則的軍事依賴，日本有必要明確地分擔任務，使日、美關係獲得實質立場上的平等。」²¹³1970 年 9 月，日本外相在聯合國發表演說，再次強調中曾根的想法，並且要求聯合國重新考慮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組成架構。從戰略的觀點分析，這種以強大經濟基礎為後盾的發言動作，是向國際社會提出日本將邁向政治大國的信號。從日美安保體制的角度觀察，日本開始尋求與美國構築非形式平等的政治夥伴關係。尤其是 1973 年與 1978 年發生的兩次石油危機，更讓日本政府深刻體會經濟安全必須獲得保障。因此，日本發出政治大國的明確訊號共計有兩次，分別是 中曾根康弘與小澤一郎。

（一）戰後政治總決算

日本政府追求成為政治大國的意圖，始於中曾根康弘首相於 1982 年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口號，暗示日本外交政策將有所轉折，他代表戰後日本國內強烈要求成為「政治大國」的一股政治思潮。在 1983 年外交藍皮書中，他再次指出日本外交政策的目標：「日本今後應在世界政治中加強日本的發言權，除了增加作為

²¹² 林風佑，〈冷戰後影響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國內因素〉，《問題與研究》，第 24 卷第 1 期，1998 年 1 月，頁 29。

²¹³ 中曾根所謂實質立場的平等係指，日本爭取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小林正雄編，《宰相中曾根康弘－內閣總理大臣への足跡》（東京：日本伊勢新聞社，1985 年），頁 312-313。

經濟大國的份量之外，亦要增強日本作為政治大國的份量。」²¹⁴這是日本首次將「政治大國」作為外交的戰略口號，此言論一出立刻引起在野黨、美國與亞洲國家的疑慮。部分的國家認為，日本要成為政治大國，必然要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這將為日本從政治大國邁向軍事大國奠定基礎，因而形成亞洲的疑慮。為此，首相中曾根也只好改以「國際國家」來替代原本的「政治大國」。²¹⁵

為了推動政治大國路線，日本政府自1980年代中期以後，就不斷透過擴大實施政府開發援助政策，並以突破國防預算上限及海外派兵等限制，來厚植其在推動政治大國外交政策路線時的實力，以便促成「政治大國」目標的達成。1989年，海部俊樹出任首相，亦於任內指出，日本要以強大的經濟實力為後盾，以對國際社會發揮積極作用，並要求世界各國在把日本看作經濟強國的同時，也不要忽視其重要的政治力量。後冷戰時期日本欲成為政治大國的腳步越來越迫切，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戰後日本參與國際政治事務的權力有限，僅能採取「經濟外交」，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日本不甘於發揮「經濟大國」的角色，而欲謀求與其經濟地位相對應的政治大國地位，以增強其對世界事務有發言權的地位。第二，過去日本在美國的保護傘下，全力發展經濟，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國際局勢的快速變化，日本也感受到基於自身安全需要，日本必須運用多種綜合力量，逐步向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以爭取在多極世界中成為重要的一極，以朝「政治大國」的目標前進。

（二）普通國家論

1990年波灣戰爭中，日本雖然提供高達130億美元的軍費，卻被西方國家譏為只出錢、不出力的「支票外交」(checkbook diplomacy)。日本也察覺到以日本當

²¹⁴ 有關中曾根擴展外交政策的方針，請參閱馮昭奎等著，《戰後日本交 1945-1995》（北京：中國社科院，1996年），頁467-470。

²¹⁵ 樊明勇、談春蘭，前引書，頁14。

前的國際影響力，實難以捍衛自己的利益，日本無法如同過去只在經濟及政治上支持美國及西方世界，必須以其他方式對國際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否則將有被孤立的危險。²¹⁶為此，日本國內出現要求檢討的聲浪，在政府及媒體的鼓吹之下，國內逐漸形成共識，並認為今後必須在國際社會中扮演更積極的主動的角色，甚至不排除與安全有關的議題。

日本國會議員小澤一郎於 1993 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計劃》，系統地闡述了他在日本政治、經濟、外交方面的觀點。在外交方面，他主張「普通國家論」和「國際貢獻論」，其中又以前者為核心。小澤認為，日本遠未能成為與其他國家享有同樣的權利與義務的普通國家。他認為「普通國家」應具備兩個必要特徵：其一，對於國際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就把它作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並盡自己責任去實行。其二，對為構築富裕穩定的國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國，以及對地球環境保護等人類共同課題，盡己所能進行合作。日本雖然在經濟援助方面，有著巨大的國際貢獻，但是在安全保障方面卻不盡如人意。小澤認為，日本要成為「普通國家」，就應做出相應的「國際貢獻」，即奉行所謂「聯合國中心主義」，修改嚴重妨礙日本向海外派兵的「和平憲法」第九條，積極參與國際維持和平活動。因此，他的主張可以是對自民黨，戰後長久以來奉行的傳統保守主流思想「重經濟、輕軍備」的修正，²¹⁷小澤的想法充分地顯現其「政治大國」的主張。

二、聯合國外交

積極利用聯合國場合來提高日本的國際政治地位，是日本政府自 1980 年代起即展開的外交戰略。1983 年 5 月，中曾根首相在七大工業國高峰會上，一反過去日本僅在經濟議題上發表意見的前例，公開發言支持美國在西歐部署中程導彈，

²¹⁶ Francis Fukuyama & Kongdan Oh, *The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hip after the Cold War* (Santa Monica: RAND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 1993), p.15.

²¹⁷ 陳娜，〈小澤一郎：新黨魁老政客〉《中國評論》，2006 年 6 月號，頁 85-88。

並在會中力促對蘇聯發表強硬政治聲明。1983年6月，中曾根在英國發表演說時，鼓吹「日美歐三極合作架構」。1985年中曾根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要求「接受日本成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冷戰結束後，日本政府繼續推動聯合國外交路線，強調提高日本的國際貢獻，以期擴大日本的政治影響力，進而提升其國際地位。1990年3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樹於國會發表施政演說時，正式宣佈日本參與建立國際新秩序，他宣稱世界正處於歷史性變化之中，日本必須參與構築國際新秩序以開展有理想之外交，並運用經濟、技術和經驗，積極參加旨在建立新秩序的國際努力，作為本國施政的首要方針。

此外，日本為去除二次戰敗的恥辱，日本政府於1990年9月，由日本外相正式要求聯合國刪除憲章過渡安全辦法中的「敵國條款」。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中，日本不僅出錢還出力（非戰鬥人員）。1992年6月，宮澤內閣上任後延續了海部首相的外交路線，提出以聯合國為中心並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的主張。宮澤在其施政演說中強調，日本要為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作出貢獻。²¹⁸2001年12月，日本國會在通過「反恐特別措施法」時，附帶通過解除有關PKO法案中，凍結自衛隊赴海外參與維和行動的限制，進一步強化日本經由參與聯合國行動執行聯合國外交路線，以發揮其國際影響力。²¹⁹

因此，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就成為日本「政治大國」最高的戰略目標，透此一方式既可以滿足西方國家對日本的要求，同時也可以減輕東亞國家對日本軍國主義復甦的疑慮；更可以提升其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以擺脫日本「經濟巨人，政治侏儒」的刻板印象。為此，日本政府傾注極大精力積累國際貢獻實

²¹⁸ 宮澤喜一於1992年訪問法國時表示，日本為建立國際新秩序，將在三方面發揮作用：第一、監督裁軍。第二、加強聯合國的作用。第三、注意環境保護，並提供援助。波灣戰爭中安理會迅速通過各項制裁伊拉克的決議案，聯合國安全保障體制的機能有逐漸恢復的跡象。為了加強聯合國安全保障體制的機能，日本亟思出任安理會之常任理事國，並刪除敵國條款，以提高在聯合國中的發言權。請參閱曹異美，前引書，頁26。

²¹⁹ 黃金湯，前引書，頁40-41。

績，並開展「聯合國外交」，²²⁰其努力成效如下：

（一）向聯合國繳交巨額會費和經費

日本加入聯合國之初，所分擔的會費比率只占全部會費的 1.92%，到了 2005 年已達到 19.7%，僅次於美國的 22%，並超出其他安全會的常任理事國，名列世界第二。除了會費之外，日本還參與各機構的籌款活動，同時也是聯合國最主要的出資國。²²¹

（二）積極參與聯合國各項組織

作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強國，日本積極參與諸多國際組織，其中以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最為重要，日本正通過這些國際組織在國際社會中發揮自己的影響力。然而，日本的地位並未隨其分擔的比例增加而上升，其中最大的理由是，在國際機關中缺少「人的能量」之故。因此，日本積極參與聯合國的所有事務，包括政、經濟、環境、女性、裁軍等領域，以發揮其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

（三）參加聯合國的維持和平方行動

1992 年 6 月日本政府通過 PKO 法案，其主要目的有二：其一，為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強化聯合國安全保障機能，必須先積極參加聯合國 PKO 的活動，以累積實績。其二，波灣戰爭證明日本要提高國際地位，除經濟貢獻之外也必須在人員方面作出貢獻。²²²隨著日本經濟實力增強，應同步拓展其安全理念的視野並積極參加聯合國 PKO 的活動，有助於日本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席

²²⁰ 黃金湯，前引書，頁 128。

²²¹ 聯合國人口基金、聯合難民高級專員公署、世界糧食計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聯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等機構等。

²²² 曹異美，前引書，頁 29。

次，以擺脫二次大戰後的陰影並提高國家政治影響力。

綜歸上述，日本的外交政策從吉田茂的「吉田路線」，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戰後總決算」到小澤一郎所提出的「普通國家」論，我們不難發現，由於後冷戰時期國際環境的快速變遷，加速日本企圖從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邁進。

第三節 經濟方面

戰後初期，日本在美國安全保護傘的有利國際政治環境下，以及與美國、西歐的國際分工中，透過對外的出口實現經濟快速成長；出口所得迅速地被運用於更新國內製造業的設備與投資，一方面提升了出口製造業的生產效率，同時也提高日本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二次戰後，日本政府採取行政指導與大企業密切合作，由政府選出最有發展潛力、高科技、能創造高就業率的產業，給予補貼、信用保證和賦稅優惠，並獎勵出口以創造貿易盈餘。日本的這套發展政府為日本的經濟奠定了基礎，使日本能一舉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盈餘與債權國。²²³接著將探討影響日本經貿外交最為重要的二種途徑，即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以及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另外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rea, FTA）也成為日本經貿外交的新發展。

一、政府開發援助

對外援助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通常與國家的外交政策息息相關，若以從屬的關係來看，則一國外交政策將主導其外援政策的制定。從政策工具的角度來看，「對外援助」在二次大戰後，則是國家執行外交政策時的主要政策工具。²²⁴在國際關係的現實與理論體系當中，「對外援助」（Foreign Aid）具有其獨特的地位及功能。

²²³ 張亞中、苗繼德，〈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國際關係總論》（臺北：揚智，2003年），頁150-151。

²²⁴ 有關援助理論，請參閱黃金湯，前引書，頁126-128。

一方面「對外援助」與投資以及貿易一起構成了國際經濟關係的三大範疇領域；另一方面，「對外援助」又成為經濟外交重要的工具和手段，與政治外交、軍事外交鼎足而立，因而構成了國際關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對外援助」（Foreign Aid）既非單純的國際政治現象，而是一種典型的國際政治經濟現象。

戰後初期，日本援外政策的主要政策考量，在於配合美國政策及執行經濟外交政策。1981年基於「綜合安全保障」的國家政策，日本外務省於 ODA 白皮書中，指出日本的援外政策將基於人道主義、相互依賴和綜合安全保障三項需求來進行對外援助。自此之後，日本援外政策之基本理念與作法，已由過去以經濟、貿易為重點的援助，發展到以關注人權、社會福利、醫療保健、甚至環保等議題的援助，並且日趨重視與開發中國家的互動、國際社會的貢獻（圖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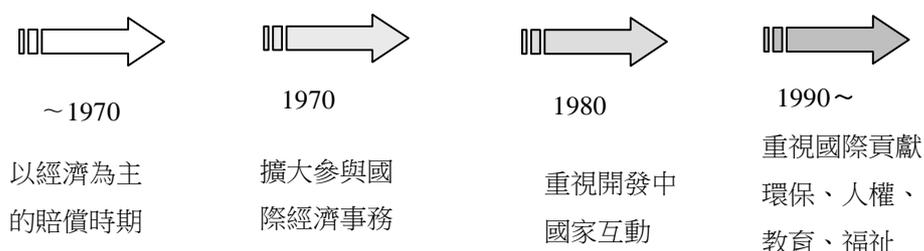


圖 4-3 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理念之演變

資料來源：林雍凱，《冷戰後日本對東協經濟戰略之轉變》（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論文，2001年），頁 37。

就歷史的觀點，二次戰後日本由盟軍佔領，日本是接受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經濟援助的國家，換言之，日本是「受援國」而非「援助國」。一直到 1951 年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第十四條規定：「日本應對其在戰爭中所引起的損害及痛苦給盟國以賠償」，與各受害盟國簽訂賠償條約，日本的對外援助，自此以賠償形式展開。²²⁵為了履行賠償並為了與東南亞國家關係正常化，日本展開了對東南亞國家的各項交流。在此之際，以經濟為手段的「對外援助」，則是戰後日本唯一可行

²²⁵ 林雍凱，《冷戰後日本對東協經濟戰略之轉變》（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論文，2001年），頁 38。

的外交工具。²²⁶日本政府對東協的 ODA 並不全然是以人道援助作為考量，而是以商業利益為考量，日本政府以經濟援助為名，之後日本廠商再利用援助的機會進入東南亞市場以建立橋頭堡，發展日本的經濟。

若從歷史的時間軸分析，日本的援助政策自 1954 年 10 月，日本加入可倫坡計畫（Colombo Plan）後，²²⁷日本的經濟援助就此展開；透過這個賠償計畫，日本打開了對亞洲地區貿易投資與民間投資的道路。1950 年代，日本之所以對東南亞國家以「賠償援助」的型態進行外援，主要係因美國的壓力與東南亞資源的雙重考量。1960 年代的日圓借款，更開拓了亞洲與拉丁美洲的市場，日本以經濟援助為手段，使日本企業得以大舉介入東南亞國家的農、工商業及公共建設，成為日資輸出的基礎。²²⁸到了 1970 年代，為了應付石油危機，大規模的援助開始擴散中東地區。1980 年代之後，在美國因素的影響下，日本正式將戰略援助項目增列在其外援的範圍中。²²⁹綜觀日本的對外經濟關係已由原先單純以經濟為目的，轉變成納入政治大國的戰略軌道，並且透過各種不同援助的倍增計畫來分攤國際責任。²³⁰冷戰結束以後，日本對外經濟援助的政治色彩加強，不僅用來維持經濟利益，更憑藉它來參與和影響地區事務。1989 年日本首度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援助國，自 1991 年起日本的 ODA 已連續數年居世界第一，在世界 ODA 總額中其比重超過了 20%。這對於受到憲法限制無法向世界提供「軍事援助」的日本而言，透過「經濟援助」來擴大其政治影響力，事實上是相當理想的途徑（表 4-2）。

1998 年 1 月在外務省的「邁向二十一世紀 ODA 改革懇談會」上，提出了今後

²²⁶ 張隆義，〈日本的對外開發援助〉《問題與研究》，第 27 卷第 11 期，1988 年 2 月，頁 2-6。

²²⁷ 為討論南亞和東南亞經濟發展計畫和為便於向發展工程項目，提供技術和財政援助而作出的安排。

²²⁸ 許介麟，前引書，頁 205。

²²⁹ Robert M. Orr, *The Emergence of Japan's Foreign Aid Powe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5.

²³⁰ 柯玉枝，〈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外交：從『內向經濟』至『政經並行』〉《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5 期，2000 年 5 月，頁 80。

ODA 實施的方向，²³¹並於 1999 年 8 月在新的 ODA 中程計畫中，特別強調以下三個重點：第一，以更適合、更有效的態度來追求與執行援助計畫。第二，向國會及國民強調身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履行國際責任，提供國際貢獻的榮耀。第三，強調 ODA 政策必須日本的國際責任、貢獻、外交政策、國家利益連結在一起。換言之，日本政府希望透過政策的關連性，以促進日本的國家利益並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

表 4-2 日本 ODA 政策的發展

時期	國際情勢	援外類型	援助對象	理念與特色	目的
1950 年代	韓戰爆發	戰爭賠償	緬甸、印尼、菲律賓、寮國、越南	1.具有濃厚的戰爭賠償色彩。 2.打開了日本對亞洲之貿易與民間之投資。	企圖全面恢復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
1960 年代	美國身陷越戰經濟實力下滑欲使日本分擔援助責任。	戰爭賠償、日圓貸款	南韓、台灣	1.以振興出口為手段附件條件的援助。 2.日本透過經濟力量擴大參與國際組織。	促進輸出並援助日本國內產業的海外投資。
1970 年代	1.尼克森震撼使美國決定從中南半島撤軍 2.1973 石油危機 3.蘇聯入侵阿富汗	日圓貸款	泰國、越南、蒙古、巴基斯坦、土耳其。	1.將 ODA 視為綜合安保的一部分。 2.日本對東南亞的戰爭賠償結束，正式進入另一個援助的里程碑。	確保石油等資源以及強化經濟相互依存度為主要目的。
1980 年代	蘇聯入侵阿富汗引起冷戰情的加劇。	日圓貸款	擴大至非洲及中南美洲	1.日本展開經濟、政治並重的發展策略。 2.對貧困國家施以人道關懷 3.對戰略上的重要國家實施戰略援助。	加強對紛爭周邊國的經援，以遂行援助來創造一個安定良好的國際環，以抑制非軍事威脅之產生
1990 年代	冷戰結束	日圓貸款	土耳其、泰國、巴勒斯坦、中國	1.落實 ODA 四原則。 ²³² 2. ODA 的援助中附帶促進民主化、落實市場經濟等政治理念。	人道關懷 戰略性援助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石原忠浩，〈戰後中日經濟與政治〉，《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第 5 期，1997 年 5 月，頁 36。

²³¹ 柯玉枝，〈當前日本對外援政策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6 期，2001 年 1 月，頁 31-51。

²³² 1992 年日本內閣會議正式決定之「政府開發援助大綱」，其目的是對於二次戰後數十年間所形成的對外援基本理念與做法進行重大調整。此大綱的要旨為：1.環境與開發並重。2.避免被用於軍事用途而助長國際紛爭。3.維持並強化國際安全，對開發中國家之軍事支出、大規模破壞武器以及發彈之開發製造或武器輸出給予密切之關切。4.關注開發中國家之民主化，致力於導入市場經濟，以保障基本人權與自由。

不過自 1999 年由於日本經濟持續疲弱不振，政府財政困難與負債過高，再加上受到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等國內外因素的連累，迫使日本政府必須重新思考其原有的路線。²³³2003 年 8 月的內閣會議中修正了「政府開發援助大綱」，並再次確認 ODA 的投資價值，因此不論 ODA 未來的發展如何，日本仍將盡全力以經濟實力支持政策，以提升國際地位與聲譽。

二、對外直接投資

日本的經濟外交政策除了政府開發援助之外，另一個重要的手段即為「對外直接投資」。雖然政府並無法完全掌握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與方向，仍就發揮積極的推動、誘發和主導的角色。戰後，因日本處於美國安全保護傘下的有利國際政治環境，以及與美國及西歐合作的國際分工模式，實現了日本快速經濟成長。日本利用出口所獲取之利潤，快速地運用於更新國內製造業的設備與投資，進一步地提升了出口產業的生產效率，提高日本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如此便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日本製造業歷經紡織品、重化工產品、電子、電器產品的過程，進而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自二次大戰結束以來，日本對外投資的成長狀況來說，可以區分為以下四個階段：²³⁴

（一）第一個階段

此一時期日本對外投資的區域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開發中國家。日本的投資規模雖然較小，卻也初步形成了以「資源開發型」與「市場導向型為主」的對外直接投資型態。1971 年由於尼克森震撼（Nixon Shock）切斷了美元與黃金的聯繫，導致日圓大幅升值，使日本中小企業陷入困境，日本的經濟結構被迫作出調整。勞力密集型產業大規模移出海外，這對於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推展有很

²³³ 金琮凱，前引書，頁 85。

²³⁴ 金琮凱，前引書，頁 94-99。

大的助益。此一階段由於亞洲地區的地理位置、資源配置以及廉價的勞動力為日本轉移其本國勞力密集型產業提供適當的條件。

（二）第二階段

此一時期為日本經濟泡沫化的重點階段。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自 1986 年起有快速增加的趨勢，(表 4-3)。首先，1985 年五大工業高峰會後日圓匯價急速上升所致。由於亞洲其他國家貨幣大都釘住美元，使日圓匯價對這些地區也升值，日圓升值使日本生產成本大增，對外投資正可以降低企業之生產成本。²³⁵其次，1980 年代後期股價、地價高漲，使企業資金調度能力大增，也有能力對外進行併購之投資。最後則是日本貿易收支大幅盈餘，導致貿易摩擦頻繁，進口國採行反傾銷措施等限制貿易措施。因此，在此一情況下，不單單是生產或是銷售據點設立在國外，而且研發據點等也有對外擴大之趨勢。

表 4-3 1990 年代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

	海外直接投資額 (億美元)、投資比率 (%)							
	1986 年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1992 年	1993 年	1994 年	1995 年
美國	102 45.5%	325 48.2%	261 45.9%	188 45.3%	138 40.4%	147 40.9%	173 42.2%	226 44.1%
歐洲	35 15.5%	148 21.9%	142 24.9%	93 22.4%	70 20.5%	79 22.2%	62 15.2%	86 16.7%
亞洲	23 10.4%	82 12.2%	70 12.3%	59 14.2%	64 18.7%	66 18.4%	97 23.6%	124 24%
韓、台 香港	12 5.5%	30 4.4%	23 4%	15 3.6%	19 5.5%	18 4.9%	18 4.4%	21 4%
中國	2 1%	4 0.6%	3 0.5%	10 2.4%	10 2.9%	17 4.7%	26 6.2%	45 8.7%
東協	9 3.8%	27 4%	29 5%	35 8.4%	31 9%	30 8.4%	49 12%	53 10.4%
全球	223 100%	675 100%	569 100%	415 100%	341 100%	360 100%	411 100%	514 100%

資料來源：林雍凱，《冷戰後日本對東協經濟戰略之轉變》(台北：政大外交所碩士論文，2001 年)，頁 83。

²³⁵ 1985 年底，包括日、美在內的西方五個國家共同發起，為提升日元對美元的比價，日本同意採取對等的貨幣政策並達成了廣場協定，G5 認為日元被高估，日圓的升值造成日本損失大約二倍的資本盈餘，造成國內過剩資本大量增加，日本為推行經濟資本國際化政策，對海外投資政策一系列的鼓勵支持措施，積極地促進了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三) 第三階段

儘管 1990 年以來，日本受到日本股價、地價下跌以及經濟低迷的影響，再加上歐美市場成長並不樂觀，日本對外投資總額連年減少。然而，日本對亞洲投資的情況卻有突破的趨勢。尤其是 1994 年開始，日本對亞洲的直接投資進入空前活躍的新階段，出現了亞洲取代歐洲的新趨勢。隨著日本拓展海外市場以及東協國家的經濟發展，雙方的經貿關係日益密切，一方面東協國家提供了日本所需的廉價勞力以及海外市場，另一方面則是日本移轉先進的技術給予東協國家協助其產業升級，形成了以日本為領導的雁行發展模式。日本在 1997 年東亞金融風暴之前的對外投資均以製造業為主，且製造業投資之重心由歐美轉向東亞地區。²³⁶

(四) 第四階段

1997 年發生的金融危機，使東南亞國家的景氣衰退，也暴露出日本與東協各國經濟構造上的缺陷，影響到日本與東協國家的經貿投資關係，導致金融危機後日本開始轉向歐洲投資。不過，隨著東南亞國家的景氣復甦，雙方的經貿易投資又慢慢恢復到 1997 年以前的水準（表 4-4）。

表 4-4 日本海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地區（單位：億日圓）

區域/年份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北美	14,137	27,765	13,796	8,196	10,299	12,072	5,198
中南美	8,349	8,349	8,614	5,838	9,654	7,005	5,948
亞洲	8,555	8,196	6,638	8,307	6,910	7,233	10,091
東協	5,159	4,404	2,804	4,733	2,847	2,630	2,967
歐洲	18,116	28,975	27,061	13,263	18,807	14,268	13,934
大洋洲	2,853	1,036	777	694	1,628	1,137	2,009

資料來源：蔡增家，〈2000 年之後日本對東協經貿關係的轉變〉，發表於「日本與亞太國際學術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2006 年 11 月 25 日），頁 113。

²³⁶ 洪淑芬，〈1990 年以來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之探討〉《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2 期，1998 年 2 月，頁 69-88。

三、自由貿易協定

以區域板塊來觀察全球的經貿勢力，在歐洲地區有歐洲聯盟，美洲則有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²³⁷中美洲共同市場及南方共同市場，而亞洲則僅有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區域經濟之整合，同時會員國正持續擴大。反觀東北亞地區三國，日本、南韓與中國大陸，則介入區域性整合的程度並不深，態度也不積極，在 2000 年之前，日本、南韓與中國大陸除了加入亞太經合會之外，則僅有以對話夥伴的身分參與東協的活動，形成東亞地區「北冷南熱」的現象。²³⁸

但是 2000 年之後，整個「北冷南熱」局勢開始產生了轉變，日本、南韓與中國大陸等東北亞三國，對於區域性經濟整合的態度開始轉趨積極。日本政府於 2001 年發表的「通商白皮書」中列舉日本開始重視「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rea, FTA）的五點理由：第一，為了處理 WTO 中尚未成形的新型貿易問題，如電子商務相關規則；第二，日本希望透過 FTA 加強地區合作，進一步促成世界的貿易自由化；第三，對國際化速度較慢的日本而言，FTA 是促進國際貢獻或國際交流等國際化事務的有效手段；第四，簽署 FTA 對當事國 GNP 成長有極大的助益，相對的，被排的國家則會產生負面的影響；第五，由於日本國內政治力量無法強有力地推動經濟結構改革與管制放寬，日本寄望透過 FTA 「動態的效果」來推動其經濟改革。²³⁹

²³⁷ 由美、加、墨三國組成，經過幾年協商，在 1994 年 1 月生效。協議規定三個國家在 15 年內須排除所有貿易障礙，讓這個人口 3 億 6 千萬的地區成為世界第二大的自由貿易區。

²³⁸ 蔡增家，〈2000 年之後日本對東協經貿關係的轉變〉，發表於「日本與亞太地區」學術研究討論會（嘉義：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2006 年 11 月 25 日），頁 105。

²³⁹ 童振源，〈亞太經濟情勢：經濟整合與安全〉，孫國祥主編，《2002-2003 亞太綜合安全年報》（台北：遠景基金會，2003 年），頁 93。

日本不同以往的構想與動作，備受東亞各國的重視，小泉首相的談點重點與政策主軸，都在積極建構一個能夠結合東南亞國家、日本、中國、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南韓的自由貿易區，也就是希望能成立一個「東協加五」自由貿易區體系，以形成一包含日本在內的東亞地區經濟共同體。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與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簽署日本－新加坡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此協定同時也是亞洲國家之間第一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²⁴⁰之後日本分別與新加坡、南韓以及墨西哥進行締結 FTA 的相關談判。就實質層面而言，日本對區域自由貿易的重視，象徵著日本國際經貿戰略的根本改變。²⁴¹然而，雖然日本對自由貿易區的規劃十分積極，不過由於 FTA 牽涉層面繁複，完成簽署實非易事，尤其對日本而言，與東亞國家之間長期政治不信任，以及日本對農業保護不肯退讓的立場，使得日本在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相關談判迭遭挫折。²⁴²

日本之所以採取「自由貿易協定」成為其對外經貿外交政策新方向的原因，乃是鑑於「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成功與擴大之後，日本無法再繼續忽視此一世界性的潮流與動向。尤其是 2001 年 11 月，中國與東協達成協議，這對於今日經濟情勢低迷的日本而言更是一記當頭棒喝。2002 年 10 月，日本外務省公佈《日本 FTA 戰略》指標，該指標明確指出，締結自由貿易協定將加強日本與相關國家政治關係，並擴大日本的外交影響力。日本將優先與東協各國與韓國締結自由貿易協定，日本政府認為，締結自由貿易協定不僅在經濟方面對日本具有重要的意義，對包括安全保障在內的日本外交也具有重要的意義。日本外務省認為，世界貿易組織談判的領域急劇擴大，無法對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作出因應並制定出相關的規則。

²⁴⁰ 日本之所採取「自由貿易協定」作為其對外經貿外交政策方向的原因，是因為日本過去長久以來一直在經貿思想上認為「自由貿易協定」的概念將會使世界經貿塊狀化，進而對日本擴展對外貿易與投資形成不利的影響。

²⁴¹ 參閱金琮凱，前引書，頁 114。

²⁴² 童振源，前引書，頁 94。

綜歸上述，我們發現 1990 年代之後日本的 ODA 政策與 FDI 政策，都因為日本的經濟衰退而放慢了腳步，再加上各國為爭奪未來貿易秩序的主導權不斷擴大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的範圍。日本若不抓住時機進行戰略調整將陷入不利之地。因此，日本將在繼續多國間貿易自由化談判的基礎上，將外交戰略核心向促進兩國間貿易自由化轉移。同時日本也將密切注視中國與東協締結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進程，以防止經濟實力日益增長的中國，利用自由貿易協定擴大其在東南亞地區的外交影響力。²⁴³

第四節 軍事方面

任何針對日本戰後安全政策的研究或觀察，均會指出美日同盟對於日本安全防衛上重要性，進入 21 世紀，日美兩國為因應國際安全情勢的變化，已著手調整雙邊安保上的合作關係。美日聯盟的歷史總是在美國的高度期望、失望、尖銳對立，以及要求日本分擔負荷的壓力上周而復始。過去 20 年來，美日雙方的軍事合作長有長足進展，但所有的進步都集中在日本領土的防禦作為上。²⁴⁴冷戰時期日美同盟的形成與發展，主要是建立在兩國因應蘇聯在亞太地區軍事威脅的基礎上。隨著冷戰結束與蘇聯的瓦解，日美過去的共同安全威脅消失，導致雙方不僅未對冷戰結束後的安全合作提出新的界定，反而因為雙邊貿易摩擦問題，加深彼此的摩擦與猜忌，使雙方進入「漂盪」(drift) 時期。直到 1990 年代中期美國國防部部長奈伊提出「奈伊報告」，呼籲美國檢討日美兩國合作關係，日美安保運作的問題才再度受到重視。²⁴⁵尤其是 1996 年台海危機發生後，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與美國總統柯林頓共同發表《日美安全聯合宣》，重新界定雙方安全合作之基本原

²⁴³ 日本 FTA 戰略，請參閱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fta/senryaku.html>。

²⁴⁴ 楊鈞池，〈美日同盟關係的演變〉《復興崗學報》，第 84 期，2005 年 9 月，頁 165-166。

²⁴⁵ Joseph Nye, "East Asian Security: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No.74, 1995, pp. 90-102.

則，兩國安全合作關係的提升才出現新的契機。²⁴⁶美日安保體制雖然是冷戰時期美蘇對抗下的產物，隨著國際與亞太情勢的改變以及美日兩國關係的發展，也逐漸轉變為兩國之間經濟、政治、文化和發展議題的結構性支柱。對美國而言，《美日安保條約》（*Treaties of Security and Safeguard Between Japan and United States*）不僅是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佈局的重要基石，也是構建國際和亞太秩序的支柱之一²⁴⁷。

2001 年小泉上台後，日本政府主張重新審視日本的防衛與安全戰略。在日本國內，開始出現要求調整美日安保合作方式的呼聲；而在國際上，日美兩國對於如何因應後冷戰時期的美日安保合作的安全環境，亦面臨全新的挑戰。隨著日本國內政治情勢與亞太區域安全環境的變化，日美同盟又重新回歸到以軍事合作為最優先及核心的議題上。日美安保體系的演變與發展，不僅反映出國際戰略關係與東北亞區域秩序的轉變，也反映日美兩國同盟關係的調整，以及相關戰略與防衛政策的轉型；其影響所及，更牽涉到相關國家與其戰略與防衛政策的改變。以下針對影響日本深遠的日美安保體系的演變，以及雙方關係上的變化作一深入的分析。

一、1950 年至 1970 年代：美國主導

第一階段自 1952 年簽訂《日美安保條約》至越戰結束，美國完全主導日美同盟關係。在此一時期，日本主要扮演配合美國因應冷戰時期的戰略設計，並為美軍提供各種基地。

（一）日美安保條約

此一條約由前言與五項條款所組成，第一、二條是屬於核心條款，條約內容

²⁴⁶ 蔡明彥，〈日美同盟之發展與抉擇：兼論台灣因應策略〉《全球政治評論》，第 4 期，2003 年 10 月，頁 100。

²⁴⁷ 鄭舜元，《跨世紀日本防衛武力整建戰略涵義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在職專班碩士論，2002 年）頁 121。

規定如下：²⁴⁸

第一條規定：在和約與本條約生效之日，由日本授與美國擁有在日本國內及周圍駐紮美國陸海空軍之權利。駐日軍隊得用於維持遠東的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維護日本免受外來武裝進攻之威脅，包括根據日本政府的要求，為鎮壓由於一個或多個外國之煽動和平涉而在日本引起的大規模暴動和騷動所給予的援助。

第二條規定：在第一條所述之權利被行使期間，未經美國事先同意，日本不得將任何基地給予任何第三國，亦不得將基地上或與基地有關之任何權利、權力或權限，或陸海空軍駐防演習或過境之權利給予任何第三國。

從美國主動要求簽署安保條約、以及條約的內容看來，美國其實是為了自身在東亞地區擁有軍事基地，並以此作為其圍堵蘇聯的戰略前哨。《日美安保條約》與 1952 年另簽《行政協定》(U.S. – Japan Security Treaty)，都是單向條約並且把日本政治與軍事的自主權利，都規限在從屬關係的架構中，進一步使美軍獲得建立基地與設施的法律權利。²⁴⁹深究其目的，其本質是佔領的延續性所作的安排，且時也是將日本置於美國控制之下的不平等條約，因而引發日本各界的不滿。

(二) 日美安保條約的修訂

1957 年岸信介接任首相後，與美國總統艾森豪 (Dwight D. Eisenhower) 會談，希望檢討《日美安保條約》，建立美日兩國更為平等的安全合作關係。為此，日本極力地向美國提議修改要求，在歷經二十五回合的雙邊會談後，日美兩國終於在

²⁴⁸ 沈仕晏，前引書，頁 128-129。

²⁴⁹ 楊永明，〈冷戰時期日本之防衛與安全保障政策：1945—1990〉《問題與研究》，第 5 期第 41 卷，2002 年 9 月，頁 25。

1960年1月重新簽署，並且重新界定兩國的聯盟關係。根據1960年修訂的《日美安保條約》第6條規定，駐日美軍可以使用日本境內36個基地與設施，以防衛日本與東亞的安全。美軍依約可以繼續留駐日本，日本也改善了從屬美國的形象，建立其與美國雙邊關係之間更大的對等性，日本的國際地位因而也提升了不少，²⁵⁰不過日本的軍事行動均被排除在日美雙邊安全對話中。

整體而言，此一階段的美日戰略關係，對日本而言可說是以「專守防衛」作為安全保障的基本原則，日本維持最小限度的自衛力量。日本在不承擔區域安全責任的情況下，仍能保有美國的防衛承諾，既不傷害日本在東亞地區的政治與經濟發展，也不會危及自民黨內部各派系的政治共識與經濟發展的優先戰略。同時，日本不實施先發制人的攻擊，只有在遭受武力侵略時才進行有限的武裝自衛，防衛作戰只限於日本領空、領海及周邊海域。但因雙方對於日本周邊有事的範圍沒有達成共識，也成為了往後日本政治與外交上的爭議。²⁵¹

二、1970年代至1990年代：逐步邁向「共同承擔責任」

第二階段自越戰結束後，美國重新編組其全球性軍事部署，尼克森總統同意日本在日美安保的框架下扮演更自主的角色，這可以說是日美安保體系在冷戰時期的質變。這種質變隨著美蘇兩國在1980年代進入「新冷戰」而更加明顯。日本隨著經濟實力的成長，進一步運用經濟與科技力量而強調作為「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美國針對對蘇聯太平洋艦隊自其海軍基地通往太平洋的出口要地，將日本自衛隊的作戰能力納入東亞區域性軍力平衡的部分。換句話說，在韓戰與越戰期間，日本在美國冷戰戰略中的角色僅只是作為後方基地的支援助地區，至1980年代則逐漸轉型為美蘇區域軍力平衡的參與者。

²⁵⁰ 張啓雄，〈百年來東亞政治格局的變遷〉，《歷史月刊》，2003年11月號，頁63。

²⁵¹ 楊鈞池，〈美日同盟關係的演變－以美日安保條約為例〉《復興崗學報》，第84期，2005年9月，頁175。

此一階段最明顯的變化在於 1978 年日美安全保障協議會確定了第一次《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並且強調為了順利且有效地實施防衛日本的聯合作戰，要進行共同作戰計畫的研究，適時地從事必要的聯合演習與共同訓練。美、日兩國在確立防衛合作指針後，無論是海上聯合演習、空戰聯合演習等規模與次數皆有明顯的提升。由此可知，《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是日美安保體制的重要轉捩點，經常被視為《日美安保條約》的第三版，同時也是日美軍事同盟關係具體化的新階段。與之前的條約相較，1978 年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不僅提供日美兩國在冷戰時期防衛性的合作措施，更重要的是提供美國在東亞地區軍事基地和軍事並存的基礎。²⁵²

從日本的角度來分析，1980 年代以來日美安保體系發生重大的轉變，主要是為了因應美國國力的下降，以及蘇聯對日本的威脅增強等客觀因素影響所致。因此，日美安保體擴大到區域層級的合作，以確保日本與西方國家的安全，並藉此提升日本的國際地位。1981 年在日美雙方的溝通下，日本對外宣布它將負責海岸線 1000 海浬內的防衛任務（如圖 4-4）。這樣的發展反映出，日美兩國間的安保合作進入一個嶄新階段，開始出現「負擔共有」（burden sharing）的安排。隨著日本增加對其本身防衛任務的負擔，美軍軍力也得以將其注意力從日本本土防衛，轉移並分散至太平洋其他地區與國家。²⁵³

²⁵² 楊鈞池，前引書，頁 175-176。

²⁵³ Frank Umbach, "The Future of the US-Japanese Security Alliance," in Jorn Dosch and Manfred Mol,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New Patterns of Interest and Cooperation* (New York: Munster, 2000), p.1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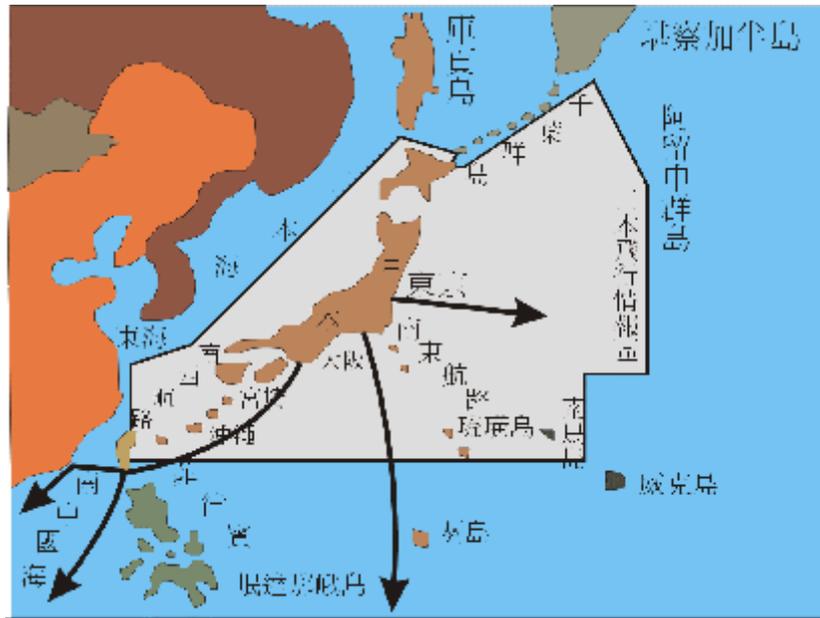


圖 4-4 日本一千哩海運線防衛範圍圖

資料來源：劉榮傳，〈跨世紀美國亞太安全戰略—華府觀點〉，發表於「跨世紀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學術研討會」（台北：三軍大學主辦，1998年12月8日），頁51。

三、1990年代：日美安保體系擴大到區域層級的合作

1980年代的美日兩國的貿易摩擦加劇，影響到日美關係的發展，日本國內亦產生「向美說不」的聲音。美國總統柯林頓上任後，展現出解決美日貿易問題的強硬姿態，美日兩國皆認為必須重新界定美日聯盟。美國首先提出，希望日本能夠超越只作為一個「支票簿強權」（checkbook power）的呼聲，進而引爆日本國內討論「日本做為正常國家」的爭論。²⁵⁴波斯灣戰爭中，日美兩國曾討與日本軍事合作的範圍擴增至區域性緊急事件以外的可能性，不過日本最後依舊決定僅提供財務支援，日本國內政治對自衛隊角色與目的所做的限制，仍然是擴大日美聯合軍事作戰的重要障礙。

（一）同盟漂流

²⁵⁴ 小澤一郎著、陳世昌譯，前引書，頁21-27。

日美安保合作為一雙邊同盟機制，但在結構上卻一直存有不對稱的關係²⁵⁵。美日同盟陷入漂流狀態，其根本原因在於日美兩國的戰略目標出現根本的歧異與衝突。冷戰結束後，由於蘇聯的威脅大為降低，美國內部希望減少美國國防預算，並嚴格限制美國在海外駐軍兵力²⁵⁶；而國際社會主要的安全關切則集中於歐洲地區，美國總統柯林頓全力處理俄國經改、德國統一後問題、北約東擴、以及南斯拉夫分裂後所造成的分裂動亂局面。²⁵⁷美國的亞洲政策，置重點於降低中共對於《日美安保條約》的疑懼，並積極改善與中共自天安門事件以來的惡劣關係。

為因應國際局勢的轉變，部分美國學者提出修正日美同盟的意見。部分日本學者也認為，日本應朝向構築多邊安全保障體系而努力，進而懷疑日美同盟的必要性。日本朝日新聞記者船橋洋一（Yoichi Funabashi）認為，日美同盟進入了「同盟漂流」²⁵⁸，一直到 1994 年北韓危機爆發後，日本才注意到，日本雖然可以參與聯合國的維和活動，卻無法處理自家後院的敵對事件。因此，日本認為有必要與美國重新檢討日美安保體系的相關問題。於是 1994 年 8 月，日本「防衛問題懇談會」，向首相村山富市提出一份名為「桶口報告」的研究報告（Higuchi Report）。報告中強調，後冷戰時期國際環境的威脅並非來自主要強權國家的軍事衝突，而是面對來自許多「不清楚」、「不確定」情勢所衍生的威脅與危險，日本的國家安全政策將面臨比冷戰時期更大的挑戰，日本與其他國家的同盟關係也必須進行調整。²⁵⁹這份報告主張將冷戰性質防衛戰略轉變多邊安全戰略，並強調日本的自主防衛能力與多邊安全合作的要性，因而也引起日美兩國很大的議論，被視為日本追求自主防衛和擺脫對美過度依賴政策的新趨勢。

²⁵⁵ 日美同盟關係中的不對稱因素，包括雙邊政治地位的不對稱、安全承諾的不對稱、雙方義務的不對稱。蔡明彥，前引書，頁 105-106。

²⁵⁶ 戴萬欽，〈冷戰結束後的美國全球戰略〉《美國月刊》，第 6 期第 8 卷，1991 年 8 月，頁 44。

²⁵⁷ Kurt M. Campbell, "Energizing the US-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3:4 (2000), p.127.

²⁵⁸ 船橋洋一，〈同盟漂流〉（東京：岩波書店，1997 年），頁 176。

²⁵⁹ 請參閱 Watanabe, Akio. 2001b. The Past and future of Japan-U.S. Alliance.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5: 171-188.

綜歸上述，我們瞭解到日美同盟動搖和漂流的深層戰略，乃是冷戰期間圍堵蘇聯的戰略轉變為以國家利益為主的經濟貿易戰略。所幸，美日之間的安全關係一度陷入低潮，但終究由谷底向上回升。從美國的觀點來看，日美同盟是美國全球戰略部局的一環，今後必須充實日美安全保障的功能，並且活用此一架構以加強兩國的合作關係。而日本也在經濟泡沫化後重新評估國家新的戰略方向。日本的決策者意識到目前日美同盟仍然是日本實現政治大國的基礎，所以從 1994 年底到 1995 年初，日本重新回到以日美同盟為基礎的方向上。²⁶⁰

（二）強化軍事同盟

日本提出「桶口報告」(Higuchi Report) 後，美國國防大學的國家戰略研究所隨即於提出「日美同盟再定義」的報告，並且主張就日美同盟的作用和任務與日本進行對話。1994 年奈伊出任柯林頓政府的要員後，積極主張美國應借助日本的力量，強化日美同盟以維護共同利益，並於 1995 年 2 月發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保障戰略」(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報告。²⁶¹該報告指出，日美安保體制是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中最重要組成，由美日聯盟所主導的海洋戰略路線即為美國在冷戰後逐鹿亞洲大陸最主要的憑藉。²⁶²該報告對日後美日關係的發展與強化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日美兩國為能因應類似台海危機的事件發生，並使兩國日後在亞太地區安全防衛上能夠有效協調合作，於台海危機結束後正式訪問日本，雙方共同發表《日美安全聯合宣言－面向廿一世紀的同盟》²⁶³ (Japan – U.S. Joint Declaration on

²⁶⁰ 楊鈞池，前引書，頁 176-178。

²⁶¹ 該報告又稱「奈伊報告」。該報告認為，冷戰後美國的東亞安全戰略由三部分組成。（一）進一步強化雙邊同盟關係；（二）維持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三）構築區域性多邊安全機制。

²⁶² 李文志，〈海陸爭霸下亞太戰略形勢發展與台灣的戰略思考〉。「2001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2001 年 5 月 3 日）。

²⁶³ 詳見日本外務省網站，<http://www.mofa.go.jp/region/n-america/us/security/security.html>。

Security—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決定修改 1978 年簽訂的《美日防衛合作指導方針》，加強雙方的防衛合作，期使雙方合作能夠對亞太地區的安定產和平穩定的作用。這可以說是日美兩國擺脫冷戰結束後因政治、經濟與軍事戰略等不均衡發展所衍生的「同盟漂流」與「日美同盟再定義」等爭論後，兩國的軍事同盟關係的轉折點。相較於過去十年來雙方在經濟與貿易問題上的關注，本次會談幾乎全程專注於亞太安全問題上，其目的是為冷戰結束後日美同盟關係重新定位，強調堅持美國與日本之間的同盟關係在冷戰後仍具有重要價值，因而這次的會談被視為二次戰後美日合作關係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會談。

1997 年 9 月，美日兩國以設想朝鮮半島「有事」為前提，確立與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導方針》，強調美日在平時合作方面為加強交換情報與政策協商；亦增加維和、裁軍、軍控、安全對話等方面的協力。²⁶⁴在戰時作方面則首次強調「周邊有事」時，日美採取聯合軍事行動，而所謂的「周邊有事」則強調「事態性」(situational) 而不是「地理性」(geographical)。新指針的各項要點，對於日本防衛政策與和平憲法而言都是一項挑戰，美日軍事同盟從「防衛型」轉變成「進攻型」，軍事戰略由「專守防衛」轉變成「攻勢防衛」。²⁶⁵換句話說，經過 1997 年《日美防衛合作指導方針》的討論與修改後，日美同盟已經具有「區域性合作」的質變，²⁶⁶綜觀上述分析我們觀察到，日本在亞太地區扮演區域安全的角色，逐漸取代日本傳統上對於安全政策採取「專守（自我）防衛」原則，擴大到區域層級上的合作。一直到 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日美安保體制則進一步地擴大至全球層次的合作。

²⁶⁴ 1997 年日美雙方共同簽署《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以取代 1978 年因應冷戰威脅而訂定的《日美防衛合作指針》。請參閱楊志恆，〈美日政權同盟合作的轉變〉《國策專刊》，第 19 卷，2001 年 9 月，頁 8-10。〈http://www.inpr.org.tw/publish/pdf/m19_3.pdf〉

²⁶⁵ 楊志恆，〈日美安保沿革及其對台海安全之影響〉。「跨世界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學術研討會」，1998 年 12 月 8 日。台北：三軍大學主辦。

²⁶⁶ 楊鈞池，前引書，頁 178。

四、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擴大到全球層次的合作

美國總統布希上任後更加重視日美同盟與持續擴大合作範圍，一掃柯林頓總統任內所謂「忽視日本」(Japan-passing)的質疑。2001 年美國爆發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日美同盟朝向全球層次軍事合作的趨勢更加明顯，並且促使日本更進一步朝向軍事大國化，日本自衛隊軍備提升，日本海外派兵次數增多，海外派兵的法制化更趨完備與正常化，日本自二次戰後以來「專守防衛」與「集體自衛權」的基本策略也逐漸調整。²⁶⁷911 恐怖攻擊事件對全球秩序產生重大的影響，美國國務卿阿米塔吉 (Richard L. Armitage) 積極希望日本可以配合美國的反恐作戰，以及日美加強雙邊同盟關係的作為，亦針對如防止這些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2004 年 6 月，日美兩國再次確定雙方合作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可看出日美安保體系在 21 世紀初期已經擴大到全球層次的合作關係，²⁶⁸日本在配合美國反恐作戰上也逐步完成「反恐對策特別措施法」、「有事三法」的立法。

911 事件後小泉政府一連串外交與軍事行動，顯示其試圖透過參與美國在周邊地區與全球範圍的軍事行動，一方面調整日本傳統的安全政策，透過對集團自衛權的彈性解釋，使日本逐步恢復成為一個「普通國家」。另一方面，以更積極的態度參與地區性與全球性安全與政治事務，以提升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2001 年 10 月，日本國會通「反恐對策特別措施法案」、「海上保安廳修正案」、「自衛隊法修正案」等三項時效兩年的特別立法，這三項法案提供自衛隊戰時派兵赴海外行動的法源依據，法條明訂派遣行動必須有國會的追認。「反恐法案」通過後，日本隨即派遣海上自衛隊前往印度洋支援美國。日美同盟的合作範圍已經從日本周邊事態擴展到印度洋。因此，「反恐法案」除賦予日本自衛隊活動的法源外；另一方面，則是進一步地擴大自衛隊活動的空間與範圍。日本為配合美國的反恐戰爭，

²⁶⁷ 楊鈞池，前引書，頁 179。

²⁶⁸ Midford, Paul. 2003. Japan's Response to Terror: Dispatching the SDF to the Arabian Sea. *Asian Survey*,43,2: 329-351.

更進一步在 2003 年 6 月通過「有事三法案」，分別是「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修正法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正案」，以確立日本政府對於針對日本所發動武力攻擊的基本理念與處理態勢，並確保自衛隊行動的順利進行所必要的因應措施等，建立「有事法制」以作為日本應對緊急事態的危機管理機制的法源基礎。²⁶⁹

日本通過「有事法制」，一方面回應美國的壓力，也就是美國副國務卿阿米塔吉所提出的報告建言；另一方面也顯示日本政壇已進入世代交替，這同時象徵著自民黨內部的「和平主義」(Pax American)，逐漸失去其政治與安保的影響力。²⁷⁰ 有事法制的建立也顯示出，日本的自衛隊已經具有採取「先發制人」軍事行動的法源依據，日本自衛隊不再單純地運用「防衛」的力量，而逐漸具有「正常國家」之「軍隊」的職能與力量。再度引發日本國內另一個爭論的議題，亦即「有事法制」是否違憲；對於東亞地區的鄰國而言，他們更擔心日本新興的右派民族主義的未來走向，並且希望美國除了要求日本配合全球性反恐活動外，也應該引導日本民族主義走向適度的建設性方向，避免日本走向當年軍國主義或發動對外侵略行為。

綜歸上述分析，日本的防衛政策透過美日安保體制的調整出現大幅度的轉變，從過去的防衛日本領土、領空、領海的專守防衛到日本周邊「有事」地區，以及現階段為了配合美國反恐的全球性軍事作用。日美兩國不斷地調整與擴大安保體制的合作範圍，這似乎意味著日美兩國將逐漸調整其防衛與安全政策，並且將雙方同盟的關係從「負擔共有」(burden sharing) 轉化為「力量共有」(power

²⁶⁹ 早在 1997 年福田糾夫內閣時即指示防衛廳著手研究「有事法制」，並且以蘇聯入侵北海道為假想前提。不過礙於當時自衛隊法有相當多不完備之處，因而引發諸多爭議。經過 20 多年的努力與研究，日本防衛廳出版的「防衛白皮書」正式提出建立「有事法制」問題，日本政府也終於在 2002 年 4 月召開安全保障會議及臨時內閣會議，正式決定「武力攻擊事態法案」等有事法制三法案。參閱楊鈞池，前引書，頁 180。

²⁷⁰ 吳寄南，〈日本新國防族的崛起及其影響〉《日本學刊》，第 5 期 1996 年 12 月，頁 6-22。

sharing)，進而強化兩國在同盟關係中的對等地位。²⁷¹

第五節 小結

傳統對於國家安全政策的思考，多側重於經濟與軍事國防的相關性；然而，在當前國際政經情勢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下，現代國家所面臨到的安全威脅，已不再僅止於軍事上的考量而已，而更加重視經濟因素，即經濟安全的概念。²⁷²經濟安全概念強調，對依賴經濟力量為國本，但缺乏天然經濟資源的國家，國際資源與原料市場的供應順暢，是國家發展經濟必要的條件，一旦受到干擾或中斷，勢必影響國家經濟的穩定運作。國家欲保障市場機制的穩定運作，必須透過政治軍事與外交途徑的運用。

日本所強調的「經合性安全」是經濟安全概念的最佳代表。二次大戰結束後日美簽訂《日美安保條約》，開始了日美雙邊安全架構，使日本可以將其軍事安全交由美國，因而免於直接面對軍事外力的入侵。日本的國家發展戰略，一方面自我限制其軍備擴張，不介入國際間傳統核子軍事權力平衡的競賽；另一方面選擇以復甦經濟為其戰後國家發展的首要目標。在長期以發展經濟為主的國家安全政策下，日本的經濟地位亦隨著日本商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優勢而提升，但卻與其他經濟強權產生摩擦，成為威脅國家經濟安全的因素之一。冷戰的結束，對日本外交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轉折點，因為日本所面對的國際環境已經發生質的變化，這也使得日本重新思考日本的外交政策，並開始朝向「國際貢獻」努力。

從日美安保體系的形成與演變，不僅反映國際戰略關係與東北亞區域秩序的轉變，也反映日、美兩國同盟關係的調整，以及相關戰略與防衛政策的轉型。日

²⁷¹ Armitage, Richard L. et al., October 11, 2000,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 *INSS Special Report*.

²⁷² 金琮凱，前引書，頁 11-16。

美安保體系原先預設想的「防衛範圍」，漸漸從 1960 年代的日本本土、1980 年代的遠東地區，到 21 世紀初期的全球層次，²⁷³美日安保體系的調整與擴大適用範圍，更顯現日、美兩國愈來愈緊密的合作與同盟關係。這其實也反映了東亞地區，例如朝鮮半島、台海地區等冷戰時期所遺留下來的衝突並沒有和緩下來。日本民眾與政治人士也紛紛意識到，日本應該要有合理與必要的安全保障體制來看，日本堅守的「專守防衛」的基本原則，已經出現以下的質變。²⁷⁴

- 一、日本引進美國的軍事技術，並與美國合作開發軍事科技，這使得日本自衛隊的軍備與作戰能力大幅提升。
- 二、美日安保體制將以「防衛日本」，擴大為因應「周邊地區緊急事態」為重點。一旦亞太地區爆發緊急事態，日本自衛隊必須向美軍提供直接參戰，包括後勤補給、海上護航、海空警戒、情報提供等支援行動。
- 三、針對「集體自衛權」的行使，日本政府已經改變過去「專守防衛」的立場，逐漸解除對自衛隊與軍事發展的法律限制。
- 四、日本開始出現為突破「武器輸出三原則」的試探行為，例如安倍晉三（Shinzo Abe）在擔任副官房長官時曾表示，如果國際情勢發生變化，日本國民也認為可以擁有核武的話，日本「無核三原則」也可隨之改變。

綜合上述，由於國際局勢的變遷、東亞秩序的轉變、911 恐怖攻擊事件，美國也被迫必須重新調整其全球性的軍力部署。其影響所及，美日同盟關係的核心體制一旦美安保體系亦將配合調整，以因應美國全球戰略的轉變，日本也為了因應美國的軍力重整而調整其防衛政策。美國為了推進其在亞洲的安全戰略目標，因此美國極需日本在軍事上給予更大程度的支持、配合與參與，這同時也強化了美日同盟中以日本的戰略地位，並鼓勵日本「在區域和全球事務中發揮領導作用」。

²⁷³ Cossa, Ralph A. 2001.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Alliance-Based" East Asia Policy. *Asia-Pacific Review*, 8, 2: 66-80.

²⁷⁴ 楊鈞池，前引書，頁 182-185。

由此可看出，日美同盟朝向全球層次上的軍事合作的趨勢更加明顯，並且也促使日本更進一步朝「普通國家」的方向邁進。

第五章 結論

歷史學家梅伊（Ernest May）認為，有些國家建立偉大的地位，而美國的偉大則是因為外在環境影響所致。日本正好與美國相反，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時代起，就積極追求國家的現代化以及與其它強國平起平坐的地位。和其它現代革命不同的是，日本並不強調超越的價值觀或普遍的意識形態。明治維新掀起一股追求和西方工業國相等地地位的熱潮。透過日本人的辛勤努力、團結和犧牲來培植國家的實力，因此日本人是被驅策的民族。²⁷⁵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為全力追求經濟成長，傾向於對美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冷戰結束迄今，由於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使得各國對外戰略也開始產生蛻變。在五五體制下，日本奉行吉田路線並採取最小途徑的防衛與安全政策，貝格（Thomas U. Berger）認為，這是因為戰後日本所發展出來的「反軍國主義」深入社會文化，形成對於軍人的不信任有關，在波灣戰爭中更是排除軍方參與決策。在「五五年體制」下，日本政府力促經濟成長的極大化，有效地推動1950年代以及1960年代之後的經濟高速成長。然而隨著冷戰終結，國際體系架構以及「全球化」過程日益加速，日本所面臨到的區域與全球環境正在快速地發生變化，導致日本的經濟遭受到很大的衝擊，間接也影響國內政治制度的變革，進而也使得日本對外政策的改弦更張。在此一挑戰之下，日本對於各項國際議題的「作為」與「不作為」，都必須與國際環境的變化作緊密的配合與互動。

第一節 日本外交政策的傾向

日本是一個海島國家，由於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與脆弱性，再加上其所擁有的

²⁷⁵ Kenneth B. Pyle 著，董更生譯，〈日本：追求權力的機會主義〉《20世紀之旅》（台北：聯經，2003年），頁263。

資源非常有限，70%的物資都仰賴進口，對海上的依賴極深。日本這種高度的對外依賴，迫使日本的外交必須相當謹慎，同時也賦予日本向外謀求發展的「正當性」。日本是一個島國，鮮少受到外力的入侵，再加上二百年的鎖國政策，使得日本絲毫沒有對外交涉的經驗。鑑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經驗，日本更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捲入國際政治的漩渦中。因此，基於島國性格，再加上處理對外關係的缺乏自信，使得日本的外交常處於被動狀態，並且常以狹隘且現實的眼光去看觀察世界的變化。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已達六十年，日本在外交政策的演變過程中出現極大的轉折與變化，筆者將其變化歸結如下：

一、政治與經濟並重的外交政策

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以發達國家的經濟為主，在外交上採取「經濟中心主義」來發展日本的外交政策，在政治或安全議題上，則以採取低姿勢避免捲入國際事務中。然而，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以及日本國內政治結構的變遷，日本自然不願意僅作「經濟大國」，因而有「日本可以說不」的言論出現。自1980年代起，日本開始重視並積極追求「政治大國」的外交路線，同時推展聯合國外交，以發揮日本的國際影響力。

1990年代兩極體系崩解，意識型態的外交政策退居次位，日本國內對於美日安保、憲法與軍備議題的討論趨向於模糊或界線不明；此時期日本的外交政策傾向功利與現實主義，呈現無原則型態的外交特色。另一方面，日本因經濟持續衰退而缺乏自信，除宮澤、橋本首相外，大多都不太重視外交發展。不過，到了1990年代末期，日本基於自身利益以及安全的需求，其外交政策已由單純的經濟援助轉變成政經並重的外交型態。

二、安全保障政策的調整

安全保障政策是外交政策的根基。從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前期，在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之下，日本並未意識到軍事上與經濟上的威脅。冷戰時期，在傳統「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下，日本在外交政策採取的是，在發生戰爭的可能性為前提（重視軍事力）下，持有明確的國家利益（安全保障優於經濟問題），以及推動以外務省為主導的一元性外交。然而，1970 年代以後，隨著美國國力的下降，並且歷經石油危機與糧食危機後，日本體認到經濟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因此，朝野逐漸擺脫政治的對立，使得談論「安全保障」問題成為可能。

冷戰結束後，進入到「複合性相互依存的國際政治」，一方面因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減少而降低了軍事力的心重，反倒增加了國力的多元化以及國家利益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日本的外交政策多了外務省以外的官廳加入，使得外交事務變的更為複雜。1989 年美蘇兩國的馬爾他高峰會議瓦解了東西陣營對決的構造，1990 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日本開始討論安全保障政策的調整，以及對國際秩序的新貢獻。

三、重視日美同盟與聯合國外交

自 1954 年日、美兩國簽訂《日美安保條約》後，日美安保體系成為日美同盟關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於日美兩國在冷戰時期不同的國際地位與國家實力，兩國一直到 2000 年之後才逐漸展開具有對等性質的合作關係。換句話說，儘管日美安保合作關係已經進行近半個世紀，但一直到最近幾年才真正地展現出具有「聯盟」（alliance）的實質意涵與互動的行為。進入 21 世紀美國總統小布希進一步欲與日本共同推動全國飛彈防禦系統，其目的是共同防禦中國與北韓等流氓國家，促使美日同盟從美主日從屬轉變成美日平等型，朝向美日合作的新圍堵時代。

為了推進美國在亞洲的安全戰略目標，美國亟須日本在軍事上給予更大程度的支持、配合與參與，小布希政府強化美日同盟並積極提升日本的戰略地位。²⁷⁶而在日本方面，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立即支援美國的反恐行動，國會亦於10月通過「反恐對策特別措施法案」、「海上保安廳修正案」、「自衛隊法修正案」等三項時效兩年的特別法。2002年2月，美國總統小布希訪問東京時，針對美國列舉伊朗、伊拉克和北韓為「邪惡軸心」，將要發動「第二輪反恐行動」，小泉在日美高峰會上表示將全力支持，並強調日美關係將更趨緊密，同時日本將積極支援阿富汗的復興，小泉在國會答辯中亦再次強調同盟國的責任。²⁷⁷然而，日本反對黨紛紛譴責政府支持美國的立場，²⁷⁸日本媒體的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日本人反對伊拉克戰爭，卻支持將北韓威脅視為日本支持美國，堅持日美同盟的理由。

此外，在聯合國外交上日本也相當地努力，自從1956年日本加入聯合國之後，推行聯合國外交就成為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之一。目前日本仍是聯合國最主要的出資國，日本的專業人員也積極參與聯合國的各種行政與專業功能性機構與組織，這些作為均在累積日本的國際聲望。另一方面，日本已意識到冷戰結束之後的聯合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多國協調作用已有所增強，同時日本亦發覺其在聯合國仍缺乏影響力及發言權。因此，在1992年波灣戰爭、2003年的伊拉克反恐戰爭中，日本積極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同時日本也解除自衛隊海外派兵的限制，並且調整其安全戰略，並且爭取加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以擔負更多的全球性責任及角色。

²⁷⁶ 楊鈞池，前引書，頁 173。

²⁷⁷ 孫國祥，前引書，頁 142-144。

²⁷⁸ 民主黨幹事長岡田認為，美國單獨對伊拉克開戰將破壞維護世界和平的聯合國框架，由此引發人們對未來的不安，進而波及經濟走向。引自孫國祥，前言書，頁 144。

第二節 研究結論

一國參與國際事務的程度，可以表現出該國的外交取向。而所謂的取向，就是一個國家對外界的態度和承諾，以及達成國內外的目標及期待，與克服持久威脅的策略。國家的一般策略或取向，甚少顯示在任何一個決定上，而是為了適應內外環境，不斷調整其目標、價值與利益，經由一連串累積的決策所產生出來的結果。因此，對於任何一項策略的選擇，我們可以透過層次分析去理解，並尋求更深一層的解釋。綜歸上述，筆者將戰後日本外交政策的演變，透過層次分析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個人層次

從決策的角度來看，一國在制定其對外政策時，將會把內外環境變化列入重要的參考依據，俾利在環境變遷時採取最有利於國家的政策。一般而言，國家對於既定的國際情勢多將採取持續而經常的外交政策，一旦主要情勢發生變遷，則政策將隨之轉變。從戰後吉田組閣開始，日本即意識到日本的特殊戰略地位與戰後特殊的國際環境，都不允許日本保持中立，唯有依附美國的軍事保護方能確保戰敗後日本的國土安全。由戰後日本外交戰略的發展觀之，不論是吉田首相主張的「商人國家」，到中曾根首相提出的「國際國家」，乃至民主黨領袖小澤一郎所主張的「普通國家」論；我們不難發現日本的外交戰略，隨著自身國力的增強而作出調整，唯一不變的是，日美關係仍然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因此，未來不論是自民黨或民主黨主政，日本都不會偏離日美基軸的路線。

另一方面，在首相領導權變化，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從1960年至1980年代，日常型的政治議題上，省廳官僚體制扮演決策的核心角色，首相對於官僚體制的決定加以承認或是修正。但是，隨著日本的國際地位提升，「政治議題外交」逐漸

被突顯出來，因此由首相提出目標並領導國民的重要性增加。在911恐怖攻擊事件後，日本設置內閣危機小組，改變首相的領導機制並取代外務省對外政策的功能，大大提升了日本首相的領導權，更能展現出首相個人風格的外交型態。

二、國家層次

戰後的五五體制奠定日本自民黨長期執政的政經基礎，由官僚體系所引導的所得倍增計畫，創造日本經濟的榮景與奇蹟，不過隨著田中首相的上台，日本決策的主導權移至派閥身上，形成黨高政低。隨著1990年代日本國內政治力量的不斷分化與重組，政策的主導權又重回政黨手中（圖5-1）。1990年代迄今，我們發現從國家層次上來看，日本外交政策出現轉折的原因有二：第一，日本政界的戰前世代正逐漸凋零，紛紛退出政治舞台，新保守主義的思潮在日本政界逐步形成主流。再加上1990年代之後，日本經濟持續衰退也形成了社會思潮的向右傾斜。第二，歷經911事件，美國的外交政策傾向採取新保守主義的立場，間接也影響日本政界。因此，日本政界的保守主義與美國在反恐對策上的保守政策相結合後，強化了日美軍事同盟並助長了日本防衛力量。



圖5-1日本政府主導模式的演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國際層次

我們發現日本外交政策的變化，取決於日本「角色選擇」的結果。冷戰期間，

日本憑著地理的優勢，以安保體制增加其力量與美國合作防衛日本本島，日本扮演「追隨著」的角色，因此採取對美一面倒的外交政策，日本也被迫接受「美主日從」的不平等架構。在整個1980年代中，日本自衛隊加強與美軍實施聯合訓練與演習，並進行角色與任務分工，由美軍擔任「矛」，日軍擔任「盾」的角色，有效地圍堵共產勢力的擴張，並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然而，隨著冷戰結束到911恐怖攻擊事件後，我們發現日本繼續與美國強化雙邊關係，其原因可歸納以下幾點：第一，日美同盟使日本與東亞國家進行合作時將獲得較多的信任。第二，加強與美合作，日本將進一步提升其軍事投射能力。第三，日本90%的能源仰賴進口，因此日本亟需美國以維護其海上航線的安全。第四，日美欲藉同盟之力，突破非戰憲法之限制，以提升日本之國際地位。綜觀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戰後日本的外交戰略由「經濟大國」逐漸向「政治大國」靠攏，並企圖修改戰後阻礙日本極深的憲法第九條，積極朝「普通國家」邁進，背後的戰略目的與意涵（表5-1）。

表 5-1 日本外交政策的綜合分析

	冷戰時期	後冷戰時期	911 恐怖攻擊
個人層次	重經濟、輕軍備 日美關係為基軸	普通國家論興起 重視日美關係	保守主義崛起 強化日美關係
國家層次	官僚主導	政黨主導	政黨主導
國際層次	貫徹和平主義	強調國際貢獻	強化日美軍事同盟
轉型原因	國際體系的變遷	亞洲權力的真空	中共、北韓的威脅
結果	經濟巨人、政治株儒	強調綜合性安全保障	防衛政策的轉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三節 後續研議

展望日本外交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不難發現，日本正逐漸擺脫 1990 年代日本經濟衰退以及外交上的混沌不明，並且積極朝「普通國家」的方向前進。然而，礙於研究時間的不足，諸多的議題仍未探討，如修改憲法第九條問題上，目前執政的自民黨已作出修憲之決心，並提出修憲草案並尋求朝野的共識與支持；在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的席次的努力等等，這些都是未來研究日本外交發展時的重要觀察指標，也將是筆者後續研究的重要方向。

附錄一 戰後歷任首相一覽表

年代	就職日期	屆數	姓名
1945	8月17日	第一次組閣	東久彌宮稔彥
	10月9日	第一次組閣	幣原喜重郎
1946	5月22日	第一次組閣	吉田茂
1947	5月24日	第一次組閣	片山哲
1948	3月10日	第一次組閣	蘆田均
	10月15日	第二次組閣	吉田茂
1949	2月16日	第三次組閣	吉田茂
1952	10月30日	第四次組閣	吉田茂
1953	5月21日	第五次組閣	吉田茂
1954	12月10日	第一次組閣	鳩山一郎
1955	3月19日	第二次組閣	鳩山一郎
	11月22日	第三次組閣	鳩山一郎
1956	12月23日	第一次組閣	石橋湛山
1957	2月25日	第一次組閣	岸信介
1960	7月19日	第一次組閣	池田勇人
	12月8日	第二次組閣	池田勇人
1963	12月9日	第三次組閣	池田勇人
1964	11月9日	第一次組閣	佐藤榮作
1967	2月17日	第二次組閣	佐藤榮作
1970	1月14日	第三次組閣	佐藤榮作
1972	7月7日	第一次組閣	田中角榮
	12月22日	第二次組閣	田中角榮
1974	12月9日	第一次組閣	三木武夫
1976	12月24日	第一次組閣	福中糾夫
1978	12月7日	第一次組閣	大平正芳
1979	11月8日	第二次組閣	大平正芳
1980	12月7日	第一次組閣	鈴木善幸
1982	11月27日	第一次組閣	中曾根康弘
1983	12月27日	第二次組閣	中曾根康弘
1986	7月22日	第三次組閣	中曾根康弘
1987	11月6日	第一次組閣	竹下登
1989	6月3日	第一次組閣	宇田宗佑
1990	2月28日	第二次組閣	海部俊樹

1991	11月5日	第一次組閣	宮澤喜一
1993	8月6日	第一次組閣	細川護熙
1994	4月28日	第一次組閣	羽田孜
	7月4日	第一次組閣	村山富市
1995	8月8日	第二次組閣	村山富市
1996	1月11日	第一次組閣	橋本龍太郎
	11月7日	第二次組閣	橋本龍太郎
1997	9月11日	第三次組閣	橋本龍太郎
1998	7月30日	第一次組閣	小淵惠三
1999	1月14日	第二次組閣	小淵惠三
2000	4月4日	第一次組閣	森喜朗
2001	4月27日	第一次組閣	小泉純一郎
2002	4月21日	第二次組閣	小泉純一郎
2003	1月14日	第三次組閣	小泉純一郎
2004	1月1日	第四次組閣	小泉純一郎
2005	10月17日	第五次組閣	小泉純一郎

參考文獻

一、 中文書籍

(一) 專書

小澤一郎著、陳世昌譯《日本的改造計畫》。台北：聯經出版社。1994年。

丘宏達。《現代國際法》。台北：三民書局。2002年。

布里辛斯基著、林添貴譯。《大棋盤》。台北：立緒。1998年。

包霞琴，臧志軍主編。《變革中的日本政治與外交》。北京：時事出版社。2004年。

金熙德。《日美基軸與經濟外交－日本外交的轉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84年。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圖書。1999年。

林明德。《日本近代史》。台北：三民書局。1996年。

卓南生。《大國夢與盟主論》。台北：聯經出版社。1995年。

松村岐夫、伊藤光利、辻中豐著，吳明上譯。《日本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圖書。2005年。

何思慎。1999年。《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 1945-1997》。台北：東大圖書。

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80年。

許介麟。《日本現代史》。台北：五南圖書。1991年。

許介麟、楊鈞池。《日本政治制度》。台北：三民書局。2006年。

耿曙。〈分析層次與國際體系〉。《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2003年。

施嘉明。《戰後日本外交簡史-戰敗至越戰》。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趙建民、劉予葦主編。《日本通史》。台北：五南圖書。1991年。

馮昭奎。《戰後日本外交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馮昭奎、劉世龍等著。《戰後日本外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

孫向明、張輝燦編。《中外軍事戰略概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年。

蔡東杰。《西洋外交史》。台北：風雲論壇。2001年。

----- 《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臺北：左岸文化。2002年。

蔡增家。《日本轉型：九〇年之後政治經濟體制的轉變》。台北：五南圖書。2004年。

蔡增家著，邱稔壤主編。〈911 之後日本防衛政策的轉變〉。《國際反恐與亞太情勢》。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4年。

劉江永主編。《跨世紀的日本－政治、經濟、外交新趨勢》。北京：時事出版社。1995年。

趙瑾。《全球化與經濟摩擦》。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

福田和也著、林思敏譯。《日本歷代首相評價》。台北：商務印書館。2005年。

蔣立峰、高洪著。《日本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2002年。

豬口孝著，賴郁君譯。《日本：經濟大國的政治運作》。台北：月旦出版社。
1995年。

Bruce Russett & Harvey Starr 著，王玉珍譯。《世界政治》。北京：華夏出版社。
2001年。

Johuas S. Goldstein 著，歐信宏、胡祖慶合譯。《國際關係》。台北：雙葉書廊。
2003年。

Kenneth G. Henshall 著、李忠晉譯。《日本史》。台北：巨流出版社。2003年

Samuel P. 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臺北：
聯經出版社。1998年

（二） 期刊論文

石原忠浩。〈戰後中日經濟與政治〉。《問題與研究》，第36卷第5期，1997年
5月，頁36。

金榮勇。〈日本「橋本主義」下的東亞情勢與互動〉。《問題與研究》，第36卷
第9期，1997年9月，頁6。

-----。〈一九九〇年代日本的亞太政策〉。《問題與研究》，第32卷第6
期，1993年6月，頁34-36。

林正義。〈亞太安全保障的新體系〉。《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12 期，1996 年 12 月，頁 13。

林風佑。〈冷戰後影響中共與日本安全關係的國內因素〉。《問題與研究》，第 24 卷第 1 期，1998 年 1 月，頁 29。

李文志。〈海陸爭霸下亞太戰略形勢發展與台灣的安全戰略〉。《東吳政治學報》第 13 期，2001 年 9 月，頁 134。

明居正。〈國際格局之變遷極其對中國之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 22 卷第 6 期，1996 年 6 月，頁 2。

吳寄南。〈日本新國防族的崛起及其影響〉。《日本學刊》。第 5 期 1996 年 12 月，頁 6-22。

邵玉銘。〈馬歇爾使華再評估〉。《近代中國》。第 46 期，1985 年 4 月，頁 87-88。

柯玉枝。〈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外交：從『內向經濟』至『政經並行』〉。《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5 期，2000 年 5 月，頁 80。

-----〈當前日本對外援助政策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0 卷第 6 期，2001 年 1 月，頁 31-51。

楊永明。〈冷戰時期日本之防衛與安全保障政策：1945-1990〉。《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2002 年 9 月，頁 13-15。

楊志恆。〈美日政權同盟合作的轉變〉。《國策專刊》，第 19 卷，2001 年 9 月，頁 8-10。

楊鈞池。〈美日同盟關係的演變—美日安保條約為例〉。《復興崗學報》，2005 年 9 月，頁 165-184。

張隆義。〈日本擴軍與亞太局勢〉。《問題與研究》，第 25 卷第 9 期，1986 年 9 月，頁 33。

----- 〈日本自衛隊與海外派兵問題〉。《問題與研究》，31 卷第 12 期，1993 年 1 月，頁 17。

----- 〈日本的對外開發援助〉。《問題與研究》。第 27 卷第 11 期，1988 年 2 月，頁 2-6。

曹異美。〈日本與聯合國安全保障體制〉。《問題與研究》，第 32 卷第 9 期，1993 年 9 月，頁 30。

蔡增家。〈垂直－整合與脆弱－衝突：論九〇年代日本金融政治的轉變〉。《問題與研究》，第 39 卷第 2 期，2000 年 2 月，頁 33-35。

----- 〈如何達到最適匯率制度：美國與日本匯率政策選擇的政治分析（1985-2001）〉。《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2003 年 2 月，頁 139-164。

----- 〈2005 年日本眾議院改選的政經意涵〉。《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2 期，2005 年 3 月，頁 4-5。

----- 〈資本管制與金融自由化：以日本為例〉。《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3 期，1999 年 3 月，頁 71-84。

----- 〈日本金融改革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7 期，1998 年 7 月，頁 31-48。

蔡明彥。〈日美同盟之發展與抉擇：兼論台灣因應策略〉。《全球政治評論》，第 4 期，2003 年 10 月，頁 100。

趙建民、何思慎。〈日本外交中有關中國或美國優先之爭議〉。《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1 期，2004 年 1 月，頁 86-87。

劉冠效。〈轉變中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反恐特別措施法的探討〉。《問題與研究》，第 41 卷第 5 期，2002 年 2 月，頁 41-43。

曉光。〈冷戰後日美安保體制的調整對亞太地區中日關係影響〉。《東亞季刊》，30 卷 4 期，2003 年 9 月，頁 74。

戴萬欽。〈冷戰結束後的美國全球戰略〉。《美國月刊》，第 6 期第 8 卷，1991 年 8 月，頁 44。

(三) 學位論文

王長河。《當代中共空軍戰略演變及其對台海地緣政治之影響》。台北：政治大學外交系戰略與國際事務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3 年。

尹懷哲。《日本族議員在行政改革過程中的角色分析》。高雄：佛光山人文社會學院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年。

林雍凱。《冷戰後日本對東協經濟戰略之轉變》。台北：政治大學外交所碩士論文。2001。

金琮凱。〈後冷戰時期日本之經濟力量與國際角色〉。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張志孝。《毛澤東對中共與美國關係認知轉變之研究：1969—1972》。台北：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沈仕晏。《日本國家戰略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1999年。

陳世傑。《戰後美日安保之政經分析：1952—2000》。台北：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莊國平。《柯林頓政府對中共外交戰略（1993—1998）》。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

黃金湯。《後冷戰時期中日外交關係》。台北：淡大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

董世榮。《冷戰後美日安保沿革及其地緣戰略意涵》。台中：中興大學國政所碩士論文。2004年。

盛仰正。《從九一一事件前後來看日本的亞太安全戰略》。嘉義：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鄭舜元。《跨世紀日本防衛武力整建戰略涵義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外交在職專班碩士論 2002年。

（四）研討會論文

林佳龍，〈國際反恐下的台灣安全戰略〉，發表於「台日論壇 2002 年台北會議」（台北：中華歐亞基金會，2002年7月16日）。

李文志。〈海陸爭霸下亞太戰略形勢發展與台灣的戰略思考〉。發表於「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主辦。2001年5月3日。

何思慎。〈日本政界世代交替對新世紀的日本對華政策的影響〉。發表於「全

球化.民主化下日本與東亞關係」學術研討會。台北：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2005年10月28日。

劉榮傳。〈跨世紀美國亞太安全戰略－華府觀點〉。發表於「跨世紀國家安全與軍事戰略學術研討會」。台北：三軍大學主辦。1998年12月8日。

蔡增家。〈2000年之後日本對東協經貿關係的轉變〉。發表於「日本與亞太地區」學術研討會。嘉義：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2006年11月25日。

（五）網路資料

李文志，「『中國威脅』與美國的對策：介入？圍堵？」

網址：http://www.inpr.org.tw/inprc/pub/journals/120-9/m129_4.htm.

丁永寧，〈日本會成為軍事大國嗎？〉，《新華網》，2002年9月29日，

網址：<http://ijs.cass.cn/files/xszl/dingyongning.htm>.

日本の FTA 戰略

網址：<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fta/senryaku.html>.

（六）報紙與雜誌

陳娜。〈自隊衛升級自衛軍的意涵〉。《中國評論》。2006年1月。

----- 〈小澤一郎：新黨魁老政客〉。《中國評論》。2006年6月。

張智新。〈日本對華政策中的意識形態因素〉。《中國評論》2006年6月。

二、 西文書籍

(一) 專書

Allison, Graham T., “Conceptual Model and Cuban Missile Crisis ” in Phil Williams, et al. ed. *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8.

Beck, Ulrich, *Risikogesellschaft: Auf dem Weg in eine andere Modern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e. 1986.

Curtis, Gerald L., 1993. *Japan's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Coping with Change*, M. E. Sharpe. New York.

Curtis, Gerald, *The logic of Japan politics: Leaders, Insitutions, and the Limits of Ch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ristensen, Ray, *Ending the LDP Hegemony: Party Cooperation in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Dougherty, James E., &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Inc. 1997.

Fukuyama Francis & Kongdan Oh, *The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hip after the Cold War* . Santa Monica: RAND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 1993.

Gao, Bai, *Japan's Economic Dilemma: the Institution Origin of Prosperity and Stagnation*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 Politics”, in James N. Rosenau,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9.
- Hartcher, Peter, *The Ministry: How Japan’s Most Powerful Institution Endangers Markets*. Boston Mas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8.
- Waltz, Kenneth N., *Man ,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 Keddell, Joseph P., *The Politics of Defense in Japan*. New York: M.E. Sharpe. 1993.
- Kennan, George F.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
- Kohno Masaru, *Japan’s Postwar Party Politic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Lonny Carlie and Mark C. Tilton, *Is Japan Really Changing Its Ways ? Regulatory Reform and the Japanese Economy*, Washington D.C.: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1998.
- Mulgan, George Aurelia, *The Politics of Agriculture in Japan*.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Nuechterlein, Donald 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rests in a Changing World*. Kentuc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3.
- Orr, Robert M., *The Emergence of Japan’s Foreign Aid Power*. New York : University Press. 1990.

Ole, Holsti R., "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A Case Stud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 1962.

Pempel. T J., *Regime Shift: Comparative Dynamics of the Japanese Politics Today: Beyond Karaoke Democracy*. New Jersey: St. Martin Press. 1997.

Reed, Steven, "The 1993 Election and the End of LDP One-Party Dominance," in Steven Reed, ed., *Japan Election politics: Creating a New Party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 Curtzon. 2003.

----- "Realignment Between the 1993 and the 1996 Elections," in Reed, Steven, ed., *Japanese Election politics: Creating a New Party System* , New York: Routledge Curtzon. 2003.

Sutter, Robert G., 1991.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anging East Asia Order: Implication for Taiwan's Ability to Deter Possible Treats from the Mainland*.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nyder Richard C., 1969. H. W. Bruck and Burton Sapin, "The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a reader in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Free Press.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mes N. 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Umbach, Frank, "The Future of the US-Japanese Security Alliance," in Jorn Dosch

and Manfred Mol,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New Patterns of Interest and Cooperation* . New York: Munster. 2000.

----- “The Future of the US-Japanese Security Alliance,” in Jorn Dosch and Manfred Mol,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New Patterns of Interest and Cooperation* . New York: Munster. 2000.

White B. P., “Decision-Making Analysis” in Phil Williams, et al. ed. *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二) 期刊論文

Busse, Nikolas, “Constructivism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1, 1999, pp.50-53.

Campell, Kurt M., “Energizing the US-Japan Security Partner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3:4. 2000.

Huntington Samuel P.,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Vol.18, No.1. 1991.

Joseph Nye, Jr., “ East Asian Security: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74:4. 1995.

Krauthammer, Charles,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1, Winter 1990/1991, PP.23-33.

Layne, Christopher,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 Will Rise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 No.4. 1993.

三、 日文書籍

加藤秀治郎、渡邊啓貴。《國際政治の基礎知識》。東京：蘆書房。1997年。

安藤良雄編。《近代日本經濟史要覽》。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

北岡伸一。《自民黨政權の38年》。東京：讀賣新聞社。1995年。

金子貞吉。《戰後日本經濟總檢點》。東京：文學社。2000年。

藤原彰著。《日本軍事史：下卷戰後篇》。東京：日本評論社。1987年。

船橋洋一。《同盟漂流》。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

矢部洋一、古賀義弘、渡邊廣明、飯島正義編著。《日本經濟年史》。東京：
日本經濟評論社。2002年。

劍持一己。《PKO派兵》。東京：綠風出版社。1992年。

小林正雄編。《宰相中曾根康弘－內閣總理大臣への足跡》。東京：日本伊勢
新聞社。1985年。

塚崎公義。《よくわかる構造改革》。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2001年。

吉田康彦。〈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費用與效果〉。《文藝春秋月刊》，1993
年2月號，頁310。